

通



我等了五年，弄到回國有人公事以

事，办一个公團的，正頂的好話。但是我嫌錢太少了。

政府不准我不服，我更不幹不出了。要什麼吃想在于他的

他的言語多麼柔軟。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

是我的言語的衝動。

晚間最寂寞，連他的

也憐了他。

十一、二、八。(四)

上課。作文，第二三年，不為此文長。

晚間在屋裏的，也看他的







適

之



7

胡適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目 录

书 信

致胡近仁(1907年)	3
致胡近仁(1907年)	4
致母亲(1908年7月31日)	5
致母亲(1910年6月30日)	8
致母亲(1911年1月30日)	9
致江冬秀(1911年4月22日)	11
致母亲(1912年6月22日)	12
致母亲(1912年8月31日)	13
致母亲(1914年5月12日)	15
致江冬秀(1914年7月8日)	16
致母亲(1914年9月8日)	17
致母亲(1914年9月12日)	19
致江冬秀(1914年12月12日)	21
致《甲寅》编者(1915年7月)	21
致任鸿隽(1916年2月2日)	23
致钱玄同(1917年10月26日)	25
致钱玄同(1918年1月12日)	26
致陶孟和(1918年5月8日)	28

致母亲(1918年9月)·····	29
致钱玄同(1918年)·····	30
致黄觉僧(1919年5月)·····	31
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1919年10月8日)·····	32
致钱玄同(1920年1月28日)·····	34
致王子直(1920年5月18日)·····	35
致萧宜森(1920年6月22日)·····	36
致吴虞(1920年9月3日)·····	37
致钱玄同(1920年11月3日)·····	39
致胡近仁(1920年11月6日)·····	40
复青木正儿(1920年11月11日)·····	41
致青木正儿(1920年11月18日)·····	43
致青木正儿(1920年12月14日)·····	44
答陈独秀(1920年12月间)·····	47
致陈独秀(1920年底)·····	48
致青木正儿(1921年1月24日)·····	49
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1921年1月26日)·····	51
致青木正儿(1921年2月8日)·····	54
致周作人(1921年2月14日)·····	56
致钱玄同(1921年3月5日)·····	58
致青木正儿(1921年5月19日)·····	59
致周作人(1921年8月30日)·····	61
致钱玄同(1921年12月10日)·····	62
致钱玄同(1922年5月24日)·····	63
致郭沫若、郁达夫(1923年5月15日)·····	64

致胡近仁(1924年6月4日)·····	66
致高一涵(1924年9月8日)·····	67
致王正廷(1924年11月5日)·····	70
致李书华、李宗侗(1924年11月28日)·····	71
致王国维(1925年2月13日)·····	72
致钱玄同(1925年4月12日)·····	73
致王国维(1925年10月9日)·····	74
致陈独秀(1925年12月)·····	75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	77
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	79
致江冬秀(1927年2月5日)·····	81
致钱玄同(1927年8月11日)·····	84
致太虚(1927年10月8日)·····	87
致张元济(1927年11月9日)·····	89
致张元济(1927年12月10日)·····	90
致张元济(1927年12月14日)·····	91
致吴敬恒(1928年2月28日)·····	92
致钱玄同(1928年3月29日)·····	94
致《京报》社(1928年4月25日)·····	95
致吴敬恒(1928年6月16日)·····	96
致蔡元培(1928年6月16日)·····	97
致蔡元培(1928年6月27日)·····	97
致胡近仁(1928年7月24日)·····	98
致罗家伦(1928年)·····	100
致张元济(1929年6月2日)·····	101

致李璜、常燕生(1929年7月1日)	102
致刘公任(1929年8月8日)	103
致胡祖望(1929年8月26日)	104
致周作人(1929年9月4日)	106
致任鸿隽(1929年)	108
致张元济(1930年1月26日)	109
致白薇(1930年4月14日)	110
致杨杏佛(1930年4月30日)	111
致夏蕴兰(1930年9月26日)	112
致胡汉民(1930年11月25日)	113
致钱玄同(1930年12月20日)	114
致吴晗(1931年5月6日)	117
致翁文灏、张子高(1931年8月19日)	118
复吴晗(1931年9月12日)	119
致周作人(1931年9月26日)	120
致凌叔华(1931年12月28日)	121
致沈从文(1934年3月13日)	122
致吴奔星(1934年3月13日)	123
致雍剑秋(1934年3月28日)	124
致钱玄同(1934年4月18日)	125
致梁实秋(1934年4月26日)	126
致郑中田(1934年5月2日)	127
致陈企霞(1934年9月11日)	128
致黄秋岳(1935年5月5日)	129
致陶希圣(1935年6月10日)	130

致陶希圣(1935年6月12日)	132
致陈英斌(1935年7月24日)	134
致任访秋(1935年7月26日)	135
致陈博生(1935年7月30日)	136
致陈博生(1935年8月17日)	139
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2日)	142
致周作人(1936年1月9日)	144
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1936年1月26日)	148
致叶英(1936年3月21日)	149
致吴健雄(1936年10月30日)	151
致苏雪林(1936年12月14日)	153
致周作人(1937年1月12日)	156
致孙伏园(1937年5月9日)	158
致江冬秀(1938年11月24日)	159
致江冬秀(1939年3月14日)	161
致胡思杜(1939年7月23日)	163
致江冬秀(1939年11月14日)	164
致胡思杜(1940年3月21日)	166
答关仲豪(1941年3月31日)	167
致江冬秀(1941年4月10日)	168
致赵元任(1942年2月17日)	171
致傅斯年(1942年5月17日)	174
致王世杰、傅斯年等(1942年9月10日)	175
致王重民(1943年3月31日)	177
致王重民(1943年5月25日)	178

致王重民(1943年5月31日)	182
致王重民(1943年10月18日)	184
致刘修业(1946年3月2日)	185
致刘修业(1946年3月7日)	188
致邓世华(1947年6月2日)	190
致陈之藩(1948年3月3日)	192
致赵元任夫妇(1950年10月2日)	194
致黄纯青(1951年1月21日)	195
答朱文长(1953年6月16日)	196
致沈怡(1954年12月17日)	202
致沈怡(1955年1月3日)	203
致张爱玲(1955年1月25日)	204
致赵元任(1955年10月23日)	206
复胡光熙(1955年11月26日)	207
复赵元任(1955年12月19日)	208
致杨联陞(1956年4月10日)	209
致杨联陞(1956年4月中旬)	212
致赵元任夫妇(1956年11月18日)	217
致李济(1956年11月)	218
复陈之藩(1957年4月9日)	219
复赵元任夫妇(1957年4月29日)	221
复陈之藩(1957年5月2日)	223
复陈之藩(1957年10月15日)	226
复柳无忌(1957年11月3日)	227
复苏雪林(1958年5月12日)	229

答某先生(1958年12月13日)·····	230
复潘恂(1958年12月20日)·····	231
复徐文珊(1958年12月22日)·····	232
复杨云萍(1959年1月8日)·····	232
致李霖灿(1959年1月12日)·····	233
致唐富言等(1959年2月5日)·····	234
复吴祖坪、王绍桢(1959年1月21日)·····	234
复某君(1959年1月27日)·····	235
复韩石泉(1959年2月17日)·····	235
复桂裕(1959年2月28日)·····	237
致吴相湘(1959年3月4日)·····	238
致陈诚、王云五(1959年3月11日)·····	239
致程沧波(1959年3月13日)·····	241
复郑清茂(1959年5月23日)·····	243
复杨力行(1959年6月4日)·····	244
致王云五(1959年6月10日)·····	245
复苏雪林(1959年6月19日)·····	246
复罗锦堂(1959年6月23日)·····	247
复拙哉(1959年6月26日)·····	247
复彭君(1959年10月25日)·····	248
致赵元任(1959年11月5日)·····	250
复何勇仁(1959年11月17日)·····	251
复陈谡(1959年11月20日)·····	252
致周法高(1959年11月30日)·····	253
致刘宗怡(1960年1月12日)·····	254

复梅贻琦(1960年1月29日)	254
复张圣述(1960年2月2日)	255
复张圣述(1960年2月15日)	256
复王世杰(1960年4月3日)	258
复黄应良(1960年4月27日)	259
复入矢义高(1960年5月26日)	259
致沈亦云(1960年10月9日)	263
致梁实秋(1960年11月18日)	266
致毛子水、姚从吾(1960年11月19日)	267
复王姜贵(1960年11月23日)	269
复陈君(1960年12月12日)	270
致胡天猎(1961年1月24日)	271
致沈裕民(1961年2月1日)	272
致杨亮功(1961年2月15日)	273
致胡天猎(1961年2月17日)	274
复赵聪(1961年2月24日)	275
致林中行、邵幼轩夫妇(1961年2月24日)	277
致齐如山(1961年4月16日)	278
致杨白衣(1961年5月19日)	279
复李祖法(1961年5月31日)	280
复李孤帆(1961年6月5日)	281
复苏雪林(1961年7月24日)	283
复赵聪(1961年7月24日)	284
致李孤帆(1961年8月28日)	285
复王某(1961年9月3日)	287

致李先闻夫妇(1961年9月27日)	288
复苏雪林(1961年10月4日)	289
致罗家伦(1961年10月6日)	291
致罗家伦(1961年10月7日)	292
复苏雪林(1961年10月10日)	293
复高宗武夫妇(1961年10月25日)	297
复翁燕娟(1961年10月25日)	299
复赵聪(1961年10月25日)	300

附 录

胡适简明年谱	胡明 编撰 305
--------------	-----------

书信

致 胡 近 仁*

近仁先生大人鉴：

别后于九月初八日始克抵申，明日即重阳矣。七夕尚与足下携手共观巧云，今日何日，乃不能得与足下共赏黄花令节矣！念之能无黯然魂销耶？小诗数章，附函寄呈，待足下评鹭甚殷，匠石之斧，断断不可不挥也。今夕即有人返里，匆此布达。即询
进境

族侄驊顿首（一九〇七年）

英雄得自由，丈夫贵独立。
历尽诸险艰，妙理闲中得。

集随园句奉赠

（附诗）

挽 王 汇 川

今年岁正始，揽胜到苏州。下榻劳贤主，先驱导远游。

凄凉闻噩耗，儿女有遗忧（君有子未周岁，有女未嫁）。何日苏台畔，携尊奠故邱。

十月九夜，离群索居，俯仰身世，率成右律。此诗和

者甚多，先生肯赐和一、二章否？

生今年十六，所事竟何成！苦虑忧如沸，愁颜酒易赧。伤心增马齿，起舞感鸡声。努力完天职，荣名非所营。

题秋女士瑾遗影

生前曾卜邻，相去仅咫尺，
云何咫尺间，彼此不相识。
身后见君影，倭刀光熠熠。

秋雨复秋风（秋女士口供止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一句），斯人不可作。

毅斋主人未定草

（附言）途中寄怀一诗，本未入流之流，不足记忆。如先生能为我点铁成金，则尤当九叩首以谢。驛又白。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家书手稿》，1989年8月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

致 胡 近 仁^{**}

近仁先生赐鉴：

前书成，以无便故未发。今复得诗若干首，录下，即求惠我斧削为荷。驛前曾言：此后必守“戒诗”之约。今乃自食其言，可愧也！然以别后景况日趋衰飒，故聊借此用自排遣。友

人任君赠骅诗有“雕虫宁素志，歌哭感当时”之语，骅感谢之至于极地，先生闻此，当知我心也。

侄骅白（1907年）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家书手稿》。

致 母 亲^{*}

慈亲大人膝下：

谨稟者，今日接得大人训示及近仁叔手札，均为儿婚事致劳大人焦烦。此事男去岁在里时大人亦曾提及，彼时儿仅承认赶早一二年，并未承认于今年举行也。此事今年万不可行。一则男实系今年十二月毕业，大哥及诸人所云均误耳。此言男可誓之鬼神，大人纵不信儿言，乃不信二哥言耶？二则下半年万不能请假。盖本校定章若此学期有一月中请假一小时者，于毕业分数上扣去廿分；有二月中均有请假者扣四十分，余以次递加。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奈何欲儿以此儿女之私，抑儿使居人后乎！（一小时且不敢，何况二三礼拜乎？）三则吾家今年断无力及此。大人在家万不料男有此言，实则二哥所以迟迟不归者，正欲竭力经营，以图恢复旧业。现方办一大事，拮据已甚，此事若成，吾家将有中兴之望（此事亦不必先行稟知，以里中皆非善口，传之反贻人猜疑，贻人啧啧烦言也）。若大人今年先为男办此事，是又以一重担加之二哥之身

也。且男完婚，二哥必归，而此间之事将成画饼矣。大人湏念儿言句句可以对上帝，儿断不敢欺吾母。儿今年尤知二哥苦衷，望大人深信儿言，并以此意语二嫂知之。四则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则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儿近方以伦理勗人，安敢忤逆如是，大人尽可放心也。儿书至此，儿欲哭矣，嗟夫吾母，儿此举正为吾家计，正为吾二哥计，亦正为吾一身计，不得不如此耳。若此事必行，则吾家四分五裂矣，大人不可不知也。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忧成痼，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五则大人所言惟恐江氏处不便，今儿自作一书申说此中情形，大人可请禹臣师或近仁叔读之，不识可能中肯，以儿思之，除此以外别无良法矣。大人务必请舅父再为男一行，期于必成，期于必达儿之目的而后已。六则合婚择日儿所最痛恶深绝者，前此在家曾屡屡为家人申说此义。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此办法，但儿既极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以儿思之，此瞎畜生拣此日子，使儿忤逆吾所最亲敬之母亲，其大不利一；使儿费许多笔墨许多脑力宛转陈辞以费去多少光阴，其大不利二；使吾家家人不睦，其大不利三；使母亲伤心，其大不利四；使江氏白忙一场，其不利五；使舅父奔走往来，两面难为情，其不利六，有大不利者六，而犹曰今年大利，吾恨不得火其庐、牛马其人而后甘心也。儿言尽于此矣，大人务必体谅儿子之心，善为调停，万不可待至临时贻无穷之忧。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

矣。戊申七月初四日不孝儿子嗣糜百拜谨禀。

男现在不时回店，有信不如由泾县转寄之速也。此用红圈皆极紧之言，用作标识耳。

尤有一事，男不敢不告于大人者，男自得此消息至今消瘦甚矣。昨日拍有一照他日寄归，大人当亦伤心，儿何憔悴至此耶！

前寄余川汪上宾兄（即宅坦三老表嫂之义女婿）带有二哥及儿之信已收到未？儿已将致江村之信写好，因大人既以八月毕业为辞，故男信中亦以此为辞，庶不使大人失信于江氏。儿思儿之岳氏既有意与吾家为姻眷，今得儿书，当念二姓他日尚须来往，女婿他日尚须登堂相见，断不肯使儿为难，以阻二姓之好。则大人所言一切为难情形皆儿一身当之。望大人垂念儿子一片为吾家为吾母之苦心，助儿一臂，请舅父亲自为儿一行。有儿此信，大人及舅父均有可措词之道，事无不成之理。儿以昨日作两书，今日又作致江氏书，天气太热，作字太多，致背脊酸痛，今不能多作书矣。今并万言为一句曰：“儿万不_レ归也”。

儿子嗣糜饮泣书（7月31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1994年安徽黄山书社出版。

致 母 亲^{* *}

慈亲大人膝下：

敬稟者，本月曾托方庆寿兄带上胡开文借票一纸，并嘱其向开文取款带家，不知已收到若干。儿今年本在华童公学教授国文。后，二兄自京中来函，言此次六月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被取者留在京中肄业馆预备半年或一年，即行送至美国留学。儿思此次机会甚好，不可错过。后又承许多友人极力相劝，甚且有人允为儿担任养家之费。儿前此所以不读书而为糊口之计者，实为养亲之故。而比年以来，穷年所得，无论儿不敢妄费一钱，终不能上供甘旨，下蓄妻孥，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不我与，儿亦髡髡老矣。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瞻身家，此真所谓“肚皮跌筋斗，两头皆落空”者是也。且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则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既决此策，遂将华童之事辞去，一面将各种科学温习，以为入京之计。儿于四月中即已将此事始末作书禀告大人。

此书交弼臣姊丈带上，不意弼臣逗留上海不即归去，及儿知之已隔廿余日。事隔多日，遂将此信索回。今儿于廿二夜与二哥同趁“新铭轮”北上，舟中蜷伏斗室不能读书，因作此书

奉禀。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儿此行如幸而被取则赶紧归至上海，搬取箱篋入京留馆肄业，年假无事当可归来一行。如不能被取，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年假中亦必回家一行，望大人放心可也。儿此行舟中风平浪静，又有二兄同行，尤可无虑。抵京之后二哥往东三省，儿则留京预备，考期定于六月中，惟尚无定期，当俟抵京后再行报告也。儿有一照片托弼臣姊丈（即樟林）带上，大人已见之否？弼臣此次来沪带病而归，所患病乃系极危险之症，家中万不能医治，此次以资斧乏绝不能在沪诊治。如抵里后尚未痊愈或更利害，望大人转述儿意，令其再筹款来上海或杭州就西医诊治，千万不可再延，以误终身也。儿抵京后一切情形及考试之事，均俟入京后再行禀告。谨此，叩请金安。

糜儿百拜 五月廿四日（6月30日）

家中诸长老均此。

作于“新铭”舟中，时舟行黑水洋，水皆作黑色也。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四号 元旦

糜儿百拜，遥祝吾母大人新禧百福。儿今日有大考一次，考毕无事，因执笔追记入学以来之事，以告吾母。想吾母新春无事，家人团聚之时，得此书以为家人笑谈之资，当是一乐也。

(一)体育 外国大学有体育院，中有种种游戏，如杠子、木马、跳高、爬绳、云梯、赛跑、铁环、棍棒之类，皆为习体育之用。大学定章，每人每星期须入此院练习三次。儿初一无所能，颇以为耻。因竭力练习，三月以来，竟能赛跑十围，爬绳至顶，云梯过尽，铁环亦能上去，棍棒能操四磅重者，舞动如飞。现两臂气力增加，儿前此手腕细如小儿，今虽未加粗，然全是筋肉，不复前此之皮包骨头矣。此事于体力上大有关系，如能照常习练，必可大见功效。现儿身体重一百十磅(脱去衣服时称得之重)，每磅约中国十二两零，一年之后，必可至一百五十磅矣。

(二)交际 美国男女平权，无甚界限。此间大学学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惟美国敬女子，男女非得友人介绍，不得与女子交言。(此种界限较之中国男女之分别尤严，且尤有理。)此间有上等缙绅人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坐谈。美俗每有客来，皆由主妇招待，主人不过陪侍相助而已。又时延女客与吾辈相见。美国女子较之男子尤为大方，对客侃侃谈论，令人生敬。此亦中西俗尚之不同者也。

(三)饮食 此间食宿分为二事，如儿居此室，主人不为具食，须另觅餐馆。每日早餐有大麦饭(和牛乳)、烘面包(涂牛油)、玉蜀黍衣(和牛乳)之类。中晚两餐，始有肉食，大概是牛羊猪之类。至礼拜日，始有鸡肉。美国烹调之法，殊不佳，各

种肉食，皆枯淡无味，中国人皆不喜食之。儿所喜食者，为一种面包，中夹鸡蛋，或鸡蛋火腿，既省事，又省钱，又合口味。有时有烤牛肉，亦极佳，惟不常有耳。儿所居之屋，房东是一老嫗，其夫为南美洲人。南美洲地本产米，故土人皆吃饭，其烹肉烧饭之法，颇与中国相同。十一月中，主妇用一女厨子，亦是南美洲人，遂为同居之房客设食。同居者，有中国人七人，皆久不尝中国饭菜之味，今得日日吃饭食肉，其快意可想，儿亦极喜，以为从此不致食膾酪饮矣。不意主妇忽得大病，卧床数日，遂致死去。死后其所用之厨子亦去。如是此种中国风味之饮食，又不可得矣。此一事实，颇有趣味。吾母闻之，亦必为之大笑不已也。

右举三事，拉杂书之，即以奉禀。顺叩
金安

糜儿百拜 辛亥元旦(1月30日)

家中长幼均此。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江冬秀**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

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吾于十四岁时，曾见令堂一次，且同居数日，彼时似甚康健。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何如？吾在此极平安，但颇思归耳。草此奉闻。即祝无恙。

胡适手书 四月廿二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四号上

吾母膝下：

作第三号书未发，而有北田之行，昨日抵北田。此地居美国之东北部，山水清秀，林木郁茂，甚可爱玩，可称避暑乐地。拟于此作十日之游，然后归去。

昨日来时，坐火车终日始达，计程三百余英里，约吾国千一百里。途中山皆秀丽无比，有清溪浅水，似吾国乡间，对之

有故乡之思焉。车中思作一诗，但成二句如下：“出山活水磷磷浅，扑面群峰兀兀青。”

儿前屡次作书，欲令冬秀勉作一短书寄儿，实非出于好奇之思，不过欲藉此销我客怀，又可令冬秀知读书识字之要耳，并无他意。冬秀能作，则数行亦可，数字亦可，虽不能佳，亦复何妨。以今日新礼俗论之，冬秀作书寄我，亦不为越礼，何必避嫌也。

儿居此甚乐，有暇当寄此间风景图画数张来。匆匆，即祝吾母康健

适儿拜 六月廿二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九号上
吾母大人膝下：

在维廉市时曾作第八号书，想已收到。儿现已归来，开学之期，尚在月之下旬，故日来颇有暇晷，可以读书、写字、下棋、游山。大忙之后，忽得数日之闲，其乐可知也。因无所事，故将此间风景略记一二如下：

此城名绮色佳，倚山临湖，山下为市镇，有一万五千人，街市亦甚热闹，有电车、报馆之类。山上则为大学校舍，及附近

人家，山下除店肆之外，一无可观。山上则风景幽逸雅秀，树木葱郁，与山下尘嚣之气相去远矣。

山高约四百尺，山腰有石筑牌楼，为校之大门。自此入，则道旁绿荫夹径，有小桥亦石筑，为入学必由之道。桥下水声澎湃者，则飞瀑在焉。飞泉迤逦自山中来，至此，乃冲石壁而下，遂成此瀑。过此桥不数武，即见红屋一所，为体育之室。过此，道歧为二，循左手行为中街，道旁皆古槐参天。行数百步，有钟楼巍然矗立者，为大学藏书之楼。楼之前为法律学院。左为校长办事之室。更左则为地学院、博物院、算学院，毗连接壤。其前为一大草地，草绿无际，名之曰方原。方原之西北角有大屋二：一为化学院，一为电学院。方原之北为机械工程学院，方原之东为文艺学院（儿每日上课皆在此院）与建土工科院及医学院。文艺院之背为物理学院及兽医学院。兽医学院之背即为更高之山，山上为农学院。此校舍之大概也。

在方原之东北角，有小径，循此行百步，可达一大桥，跨大壑而立。桥之右为一飞瀑，为此间最大之瀑泉，急湍下泻，澎湃涌溢，如闻千军万马之声。飞沫溅起，皆冉冉成云，遥望之，气象极壮观。

去山下约二里许，有小湖，名凯约嘉湖。湖面阔仅五里许，而长百余里，故又名曰指湖，以其长而狭如指也。湖上水波平静时，可荡舟，两岸青山如画，每当夏日，荡舟者无算，儿时亦往焉。

此间风景大略也，惜不能得全套之图寄归，亦是憾事。附呈图两张，以见一斑而已。

匆匆作此，即祝

合家平安，吾母康健。

适儿百拜 八月卅一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七号上

吾母大人膝下：

前日发第六号信想已收到。儿昨日得大学奖赏美金五十元，知吾母闻之必甚喜，故急作此书。此项奖赏名“卜朗吟奖赏”。卜朗吟为英国近代大诗人，大学中每年悬赏，凡学生作文论卜朗吟之诗文最佳者得之。儿所作之文约三千字，题为“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竟得此赏。儿以外国人得此赏，故校中群皆以为格外荣誉云。儿近来苦贫，得此意外之五十金，亦不无小补，因不独虚名之足喜也。草此奉禀，即祝

吾母万福

合家均此

适儿（5月12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江冬秀*

冬秀贤姊如见：

前由家母转交照片三种(一大二小,小者乃六月内所寄),想皆已收到。适留此邦已四载,已于去秋毕业。今已决计再留二年,俟得博士学位时始归,约归期当在民国五年之夏矣。适去家十载,半生作客他乡,归期一再延展,遂至今日,吾二人之婚期,亦因此延误,殊负贤姊。惟是学问之道,无有涯涘。适数年之功,才得门径。尚未敢自信为已升堂入室,故不敢中道而止。且万里游学,官费之机会殊不易得,尤不敢坐失此好机会。凡此种不能即归之原因,尚乞贤姊及岳母曲为原谅,则远人受赐多矣。适去家日久,家慈倚闾之思,自不容已。幸贤姊肯时时往来吾家,少慰家慈思子之怀,寂寞之况。此适所感谢不尽者也。前曾得手书,字迹清好,在家时尚有工夫读书写字否?如有暇日,望稍稍读书识字。今世妇女能多读书识字,有许多利益,不可不图也。前得家母来信,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大,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不久终当禁绝。贤姊为胡适之之妇,正宜为一乡首倡。望勿恤人言,毅然行之。适日夜望之矣。适在此起居如意,名誉亦好,可慰远念。姊归江村时,望代问岳母起居,及令兄嫂、令叔暨诸人安好。

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无恙。

适手书 三年七月八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廿二号上

吾母：

儿作第廿号书后，即离去绮色佳，初三日至安谋司，赴“东美中国学生年会”，到会者凡一百十七人，中有女子二十余人。今年女学生赴会者人数之多，为历年所未有云，在会遇故人相识甚多，顷谈极欢。

初三日，“选举职员会”，儿被举为明年《留美学生月报》（英文）主笔之一，辞之不获，只可听之。初四日在会，为会之末日。

初五日，会毕，与同学数人同游波士顿，道经唐山，有楼可望见数十里外村市，风景绝佳。初五夜抵波士顿，居一人家。

初六日，为星期，往游波城公家藏书楼，中藏书一百余万册。

下午往游美术院，中藏古今东西雕刻之像、石器、铜器、金石、古玩、名画无数。中有中国古画数十幅，皆极佳。有“宋徽宗缣丝图”真迹，为希世之宝云。

初七日，以车往游立克信敦，此地多历史古迹。初北美洲本英国属地，百三十余年前，英王乔治第三重税此地，居人人心大愤，久之遂至决裂，故有独立之战。此战事凡历数年之久始定。美国遂脱英之羁绊，而成独立之国。此战之第一战，即在此地，是为立克信敦之战。今其地犹多铭功之碑，战死者之铜像云。

过此十里许，至康可，亦当日战场，古迹尤多。此地不独以历史古迹著也，美洲最有名之文人，如爱麦生，如霍桑，如阿尔格夫人诸大文豪，生时皆居此，死即葬于是。儿等往游，徘徊凭吊于其墓上，思历史之遗烈，念文人之逸事，感慨之情，何能自己。

初八日，游哈佛大学校舍。哈佛大学开创于二百年前，至于今日，为此邦第一有名大学。校舍凡六十余所，皆高屋大厦，其最著者，为大学博物院。院中有玻璃花数百种，其花为德国植物学家伯纳楷所造，以玻璃为之，其花卉彩色须瓣枝叶，一一如生，为天下驰名之奇观云。世界能造此花者，仅有此君父子二人而已。

下午遇友人，请同往，坐汽车周行公园中，甚快。归来无事，因作此书。

儿拟稍留一二日，即当归去。

余当续寄。

适儿 初八日(9月8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母 亲^{*}

第廿三号上

吾母：

前日发廿二号信，写波士顿游记，至初八日止。今续记如下：

初九日，上午访友稍谈。

下午往游邦克山，亦美国独立时血战之所。其地今建一塔表之。其塔与中国之层塔异。此塔但有一层，高二百二十一尺，有螺旋形之石级，直至塔巅，凡二百九十四级。上塔时颇费力也。

登塔顶可望见波士顿全市，又可见波士顿海湾，及造船之坞。塔上所见，盖前后左右各数十里云。

次游造船坞，此坞由美国海军部管理。坞长三里许，占地九十亩，有大小屋舍二百所。所造船只，以兵舰、巡洋舰为多。儿等登两舰游览。一舰为一百十七年前所造，其时尚未用蒸汽，但用大帆，船身虽大，然较之今日之战舰远矣。一舰为今日之巡洋舰，可容千余人。船身皆以铁裹之。外国海行之船，无论商船、兵船，皆极大，其大过于吾村之祠堂也。

是夜在一中国饭店吃饭。

饭后往访皖人李氏昆季及殷君，倾谈甚欢。

初十日上午稍作书阅报。

下午以船出波士顿港。四年不见海矣，今复在海上，如见故人。至巴点上岸，以电车行至里维尔海滨。此地为游人聚游之所。夏日天热时，海滨多浴者。今日天寒，但见一二人游泳水上耳。时值下午潮来，澎湃涌上。日光自云隙射下，照海上远岛。海鸥数数掠水而过，风景极佳。天将暮，以电车归。

十一日，本拟往更北之朴兰一游。以天气骤寒，不果。

更往游藏书楼。

下午往访此间诸友。

夜十一时十五分趁睡车归。睡车者，火车之夜中行长途者，其壁上及座下，皆暗藏床褥。日间但见座，夜则去座。下榻有厚褥、净被、高枕、深帐，车行虽震动，而因褥厚，不觉其苦，故能安睡不惊也。

昨睡甚酣，今日八时半始起。约今午可回绮色佳矣。

波士顿记止此。

波士顿为美国第三大城，有居民六十余万人，街五千余，船坞二百所，教堂三百五十所，报纸（日报月报周报之类）三百种。

此书乃火车中所作。

即祝

吾母康健。

适儿 12 日晨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江冬秀**

冬秀贤姊如见：

夏间得家慈寄来小影一幅。得之如晤对一室，欢喜感谢之至。适去国四载又半，今尚须再留此一年半，约民国五年之秋，可以归国。每念去国日久，归娶之约一再延误，何以对卿。然适今年恰满廿三岁（以足年计），卿大于适约一岁。再过二年，卿廿六岁，而适廿五岁，于婚嫁之期未为晚也。西方男女嫁娶都迟，男子三十四十始婚者甚多。以彼例此，则吾二人尚为早婚耳。岳母大人近想康健如常，乞时代适问安为盼。令兄嫂处亦乞致意问好。适前有书，嘱卿放足。不知已放大否。如未实行，望速放之。勿畏人言。胡适之之妇，不当畏旁人之言也。

适 之 十二月十二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甲寅》编者*

记者足下：

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适在此邦，所专治者伦理、哲学，稍稍旁及政治、文学、历史及国际法，以广胸襟而已。学生生涯颇需日力，未能时时作有用文字，正坐此故。前寄小说一种，乃暑假中消遣之作，又以随笔迻译，不费时力，亦不费思力故耳。更有暇晷，当译小说及戏剧一二种。近五十年来欧洲文学之最有势力者，厥惟戏剧，而诗与小说皆退居第二流。名家如挪威之 Ibsen、德之 Hauptmann、法之 Brieux、瑞典之 Strindbury、英之 Bernard Shaw 及 Galsworthy、比之 Maeterlinck，皆以戏剧声闻全世界。今吾国剧界正在过渡时期，需世界名著为范本，颇思译 Ibsen 之 *Dall's Family* 或 *An Enemy of the People*，惟何时脱稿，尚未可料。

适去岁著有《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观览焉。适以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即有意通问讯，适国内扰攘，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今寄此文，亦以了结此未了之缘耳。

胡适白自纽约（7月）

* 本函最初见于 1968 年 1 月台北《传记文学》第 12 卷第 1 期。

致任鸿隽*

叔永足下：

得书甚喜。除夕诗杏佛、肇黄拟删“回首望纽约”四句是也。如此，则“众客”诸句直接上文“楼船”二句，而无间断之病矣。

“谁知何夕今”，殊不足以表尊意“谓彼辈如此，不似过除夕”云云。足下安知彼之“一弹再三鼓”非适以过除夕耶？文法不顺，固是小节。今再读之，觉此句诚如来书所云，饶有别致。惟终觉其不能达意耳。此意即足下所自述之意，非徒“今夕何夕”之意而“尺素愿寄君”已也诸句，觉原稿稍胜改定之作。惟“君”字宜改易耳。适所拟“之”字，自谓极有古诗风味。且引号内诸句为一韵，似胜合上二句为一韵也。若删“回首望纽约”四句，则全诗前部皆四句一转韵，寄书之言，独八句为韵，似极整严，胜改定之稿，以“兄”韵属上，“如”韵属下者矣。尊意以为何如？

题像诗第一章之“欲”字，有愿望之意。觐庄或不喜之，足下能为我更易何字，乞示知。第二章之“奇劲”殊不惬意，而不知何以易之。足下与杏佛或能为我点铁成金也。

“书来道所似”，甚佳。“善自儆”乃未得足下前片时所改，不敢不告也。

足下仍以觐庄前说为不谬，故不得不在赘一二语于此。觐庄对足下所言，不知尽与其所致适书相同否。若其相同则

其言不可不辨也。

觀庄之意以为适所谓“作诗如作文”者，仅移“文之文字”以为“诗之文字”而已耳。此大误也。适以为，今日欲救旧文学之弊，须先从涤除“文胜”之弊入手。今日之诗（南社之诗即其一例）徒有铿锵之韵，貌似之辞耳。其中实无物可言。其病根在于重形式而去精神，在于以文 form 胜质 matter。诗界革命，与文界革命正复相同，皆当从三事入手：第一、须言之有物，第二、须讲求文法（大家之诗无论古诗、律诗皆有文法可言），第三、当用“文之文字”时，不可故意避之。三者皆以质救文之弊也。

觀庄不解吾命意所在，遽以为诗界革命若仅仅移文之文字入诗，则不可，以其太易也。此岂适所持论乎？即其所论“诗之文字”与“文之文字”之别（文字谓 Diction），其言亦不尽当。即如韩退之诗，“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白香山诗“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无矮奴。”李义山诗“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黄山谷诗“狂卒猝起金坑西，胁从数百马百蹄，所过州县不敢谁，肩輿虜载三十妻。侂生有胆无智略，谓河可凭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乡父老至今怜。”（题莲花寺）此诸例皆千古名作，试问其所用“文字”，是“诗之文字”乎？抑“文之文字”乎？又如适赠足下诗：“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觀庄所谓“文之文字”，然岂可谓非佳句耶？可知“诗之文字”，原不异“文之文字”，正如诗之文法，原不异文之文法也。正如诗之取材，原不异文之取材也。适以欲救文胜之弊，或持之过当，趋于极端，亦未可知。然此志颇不无

一得之可取。公等皆有心人，所见虽未必尽与适同，然区区之私，当亦公等所许也。

匆匆奉白，即祝无恙。

杏佛均此。

适白 五年二月二日

* 本函最初见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有关胡适提倡新文学的几则史料》。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久不打官司了。今天忽然想起先生的“文字学说”的“六书进化论”。先生以为“象形”该在“指事”之前。我当时听了，也以为然。后来一想，以为许君的次序似乎不错。我所以怀疑的理由，颇有几条：

第一，我想八卦（及六十四卦）乃是仓颉造字以前的一种文字。许君《自叙》中，也如此说法（段氏注似不明此意）。《易乾凿度》也说八卦名皆系古字。若八卦为象形文字（仓颉派）以前的文字，那么，“指事”似乎实在象形之前了。因为八卦不过是一种“指事”的符号，和“上”“下”相同。

第二，“结绳”不但中国古代有之，别种民族，依人类学者所说，也曾有过。结绳也是一种“指事”的符号。

第三,“象形”实比“指事”更难些。必须先有了一种美术的本领,才可画出象形的文字。文字之作,既是应用而生,似乎应该先有简单的应用符号,再渐渐变为繁复的象形。

第四,欧洲文字,人多说是从埃及的“象形字”进化来的。究竟“象形字”之前有无“指事”的符号,却不可知。再者,印度的“字母的”文字起得很早。虽有许多字与欧洲语根相同,究竟没有人能的确证明他也从埃及的文字变出来的。所以埃及的象形字虽在欧洲各种字母之先,这个证据恐怕不能就证明各国的文字都必须先有“象形”。

以上所说,不过是偶然想到的一个“别解”。不肯就吞了下去,且拿来请教先生罢。望先生狠狠的驳他一番!

胡适 竹杆巷四号十月廿六日

* * 本函最初见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致钱玄同*

玄同先生:

得十二月三十日手书,感谢感谢!曾有小诗一首奉寄,想已收到了。此次新婚,曾做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罢!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你老先生的《〈尝试集〉序》想早已脱稿，可惜我还没有读过。我大概能于一月廿日左右（老实说个“后”字罢！）动身来京，所以，你若不曾把序稿寄下，请你就不必寄吧！

《新婚诗》还没有做完，便又要做《新婚别》了！你想我那里还有工夫做什么“钓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的文章？

然而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与《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请喜酒！你老别见笑罢！

昨日同一班朋友去游一个明末遗民叫做“采薇子”的坟墓，^①人家要我做诗，我便做了二十个字：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这首诗有点旧派习气，先生定笑我又“掉文”了。

如今没有工夫了，有个俗客来会，只好不写了。

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均此不一一。

适 绩溪，上川，七年一月十二日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79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① 作者原注：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致陶孟和*

今天病中把 Tess 看完了,此书写 Clare 名为“开通”而实未能免俗,与 Jude 之写 Sue 虽久经“释放”而实不能脱去旧日陋想同一用意。……

前日老兄说 Tess 的事迹有点像《老洛伯》中之锦妮,果然果然。但锦妮是十八世纪中人,故仅“让他亲了一个嘴,便打发他走路”,又“不敢想着他”,还能“努力做一个好家婆”。Tess 是十九世纪下半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间接感化,故敢杀了他所嫁而不爱的男子,以图那空屋几日夜的团圆快乐。这个区别,可以观世变。十八世纪的人决不能作 Tess,正如十九世纪自 Ibsen 至 Hardy 一般人也决不肯用锦妮的解决方法。这两种人生观的是非得失,最难决定。……

中国的我,可怜锦妮,原谅锦妮;西洋廿世纪的我,可怜 Tess,原谅 Tess。这是过渡时代的现象,也可以观世变了。

七年五月八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 母 亲^{*}

吾母：

我昨天出京，午间到香山，寓在静宜园里。此地有教员两人在此养病，还有大学学生两人在此歇夏。我昨天到了此地吃过饭，便去玩碧云寺。此寺乃是乾隆时重建的，今虽倒坏，还有很壮大的规模。有一座塔，工程极伟大。

昨天傍晚去游静宜园。此园很大，一时走不完。我们走到一座很高的茅亭上，月亮刚出来，那时的景致真好。

今天早晨骑驴去游“八大处”。八大处乃是八个有名的寺院、庙宇，离此地约有三十多里路。我骑驴到山下，独自上山。从上午十点多钟起，爬山过岭，直到下午三点钟，方才回到山下，寻着骑来的驴子，又骑着回来。我十几年不曾骑驴子，今回颇有点痛苦。我们瘦的人骑驴骑马都要吃亏的。

山上吃的水颇好，远胜城里的水。

回来之后吃了三个生鸡子，到了晚上又吃了很多的饭。饭是此地几个人公用的厨子包做的，每日每人出二角八分钱。

我想我在此住几天，身体一定要得许多益处。

适儿（9月）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先生：

我写的信是胡适之与钱玄同赔不是的，你们偏要说是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这是“古典主义”，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把老兄当作林妹妹呢？

宋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入我们的一派，故我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

至于张謇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

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①（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

言，恕不驳回了。

适

朱梅荪的附件还不曾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979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① [原注]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

致 黄 觉 僧^{*}

觉僧先生：

今天收到来信，承先生许我“邀集同志，为我们后盾”。我看了非常感激。但是先生所痛骂的“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其实并不在北京，乃在休宁安徽第二师范学校。北京还没有人敢禁止《新青年》，也还没有人禁止学生看《新青年》。我梦里也想不到子承先生和先生等竟做出这种手段来，甚至于有因此开除学生的事。我这里收到许多信说第二师范“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事实，我至今不曾发表，因为我总希望子承先生和先生等不至如此。现在先生来信也自认贵处不读《新青年》了。先生等既不读《新青年》，又怎么能够作我们的后盾？这种后盾又有什么价值？先生等既不曾看见我的《贞操问题》原文（先生所见，不过是《时事新报》的一段讨论），又如何能知道我的论点是“从消极方面破坏女

子贞操”？

总而言之，如果先生们认《新青年》为“洪水猛兽”，也该实地研究一番，看看究竟《新青年》何以是“洪水猛兽”。如果不看《新青年》，又不准学生看《新青年》，一意把“洪水猛兽”四个字抹煞我们一片至诚救世的苦心，那就是“取言论自由之原则而残之”的“黑暗手段”了。

胡 适（5月）

请把这信请子承先生一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高一涵、张慰慈、章洛声**

一涵，慰慈，洛声诸兄：

别后我们就睡觉了。七日早到石家庄，在吴禄贞墓侧的一间屋子内休息，吃了一点面包当早饭。吴墓选得狠好，有石台，台上有碑铭，是阎督军做的。我在这墓上颇有点感想，狠想做一首吊古的诗，但是一时竟不曾做好，就走了。吴禄贞的死总算是一件狠可纪念的事。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

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这两天威尔逊病重，也许会死。倘他死在去年十一月，他便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伟人了！威尔逊真倒霉！

七时后，我们上了正太铁路。这条路走过的都是山地，风景极好。路上终日没有饭吃。我们带得有面包，黄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狠觉不便。

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客卿远来，狠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画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决不够用。现在本省曾招了一大班直隶的中学毕业生来太原，另设“二部师范”，预备一年之后出去做高等小学的教师。但是高级机关中，外省人才太少，故狠有狭隘的现象。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解决。

到太原后，本地官署招呼极周到。因杜威夫人女士同来，故设备颇不易。我们看他们设备得如此周到，心里狠不安。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狠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

今天没有讲演，明天开讲。今天我出去走了几处，观察狠浅，不敢就下评判。下午见着李泰菜君，谈了半点钟，得益不少。

街上今天（中秋）到处是穿蓝布衣的学生，气象狠好。中国旧日的蓝布衣服现在渐渐绝迹，改为浅色的长衫，——以至

于白衣。这是狠坏的趋势。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山西学生的深蓝布衣服使我狠欢喜。

街上路灯柱上都贴着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公道森严驾富强而上之”，“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适时之思想言行，愈觉得好，其害愈大”，“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等。有许多条都剥落模糊了。我希望剥落之后不要再贴了。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这个意思，我将来当作文详细说明。

今天所说止此。可与仲甫，守常诸位同看。

适 [一九一九年]十月八日

冬秀来了没有？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兄：

国语文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你讨“救兵”的希望。我狠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文法写成，未教的

也写成。简单一点,就叫做“语法大纲”。

所选文,也没有付印。目录略如下:

太 炎 论六书(节)

论假借(节)

论学校不能注重德育(节)

吴敬梓 王冕传

虞华轩与成老爹。

张静斋与汤知县。

曹雪芹 刘姥姥初入大观园。

其他尚未抄出

《金瓶梅》“含酸”(节)

此书恐不能选入。

《水浒》“生辰纲”

其他未及抄

其余为近人的文章。总之,议论文非选我们的文章不可。演
生与仲甫现选一本,已在抄写,可与演生一谈。

适 (1月28日)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198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致王子直**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

的友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相称为弟兄，——“吾兄”，“仁兄”，“弟”，“小弟”，——又称朋友的父母为“老伯”，“老伯母”，都是这个道理。朋友结拜为弟兄，更是这个道理的极端。

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天伦”。把朋友认作弟兄，并不能加上什么友谊。自己弟兄尽有不和睦的，还有争财产相谋害的。朋友也有比弟兄更亲热，更可靠的。所以我主张朋友不应该结拜为弟兄。不但新时代不应有，其实古人并无此礼。汉人始有“结交为弟兄”的话，但古人通信，仍不称弟兄。

胡 适 九，五，十八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萧 宜 森^{*}

(1) 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弱。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

(2) 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平心而论，他损失了什么？

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

(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

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九，六，二二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吴 虞**

前接 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 先生的女儿辟疆女士的事竟攻击 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 先生。春间辟疆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他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狠敬重他。他临行时，我给他几封介绍信，都狠带有期望他的意思。后来忽然听见他和潘力山君结婚之事，我心里着实失望。我所以失望，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系——那另是一个问题，——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气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甘心做一个人的妻子；将来家庭的担负，儿女的牵挂，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后来任叔永回国，告诉我

他过卜克利见辟疆时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妇了。此事使我心里不能不怨潘君。潘君爱辟疆，亦是人情之常，本不可怪。但他果真爱辟疆，当设法使他先达到求学的志愿，使他充分发展他的天才，不当中道拦截他的进程。我曾与叔永言，我终不愿意不管此事，我若有机会，我总要设法使辟疆继续求学。此虽是一时私愿，确是狠诚恳的，但此时尚无法下手耳。

先生对于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间纷纷的议论，定已使先生心里不快。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乡间有人出来提倡毁寺观庙宇，改为学堂；过了几年，那人得暴病死了，乡下人都拍手称快，大家造出谣言，说那人是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去了！这是狠平常的事。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儿女的将来，正如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房子不被“天火”烧，我们的“灵魂”不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

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从前英国的高德温(Godwin)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后来他的女儿爱了诗人薛莱(Shelley)，跟他跑了。社会

的守旧党遂借此攻击他老人家。但高德温的价值并不因此减损。当时那班借刀报复的人，现在谁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此时我若再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

九，九，三

*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

你的序很好，已寄去了。

前人论小说文学的文章，好像没有。金圣叹的《水浒诸序》要算“凤毛麟角”了！近人如梁任公好像有过这类文字。

《袁中郎全集》中有许多“尺牍”，很有文学革新的精神。如卷二十三，答张幼于，与江进之，答张东阿，答冯琢师（一二），答李元善，……等，皆是大胆的文论。他的答冯琢师第二书云：“谬谓古人诗文各出己见，决不肯随人脚跟转，以故宁令宁俗，不肯拾人一字。”读此可想见他的精神。

你问我要“值得买的诗集”的书目，那不是容易事。这两天我又病了，——因为上星期略略劳动。故向你“告假”。近

来看郑珍(道光时人)的《巢经巢诗钞》,确有好诗。

适 九,十一,三

顾亭林,黄黎洲两传似都以全祖望的为佳。

* 本函录自《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1980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致 胡 近 仁**

老近:

谢谢你的信。

我的病好些了。

龟甲文字的研究,要算罗振玉先生为第一,故我把他的一本《殷商占卜文字考》另挂号寄给你,省得我写长信了。

文字学须从字音一方面入手,此乃清儒的一大贡献;从前那些从“形”下手的人(如王荆公)大半都是荒谬。自从清代学者注重音声假借、声类通转以后,始有“科学的文字学”可言。章太炎的《国故论衡》上卷最宜先看,然后看他的《文始》。若有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钱大昕诸人之书,亦可参看(沈兼士之说没有什么意思)。

石鹤舫的诗词我都有了,请不必抄寄。新近又向曹尚友先生处借得一部刻本。你的传何时可成?渴望渴望。做传

时,请处处注明材料的来源,但求确实,不务繁多。绩溪做传的人,只有胡培系所作诸传是真有价值的。胡培翬作的次之。程秉钊先生的著作,不知邑中尚可搜求否?乞为留意之。此事比修志更重大。

你的诗——《尝试》——犯了一个大病,就是抽象的议论太多。你曾见我的一篇谈新诗吗?可惜我病中不能细谈诗。

我的女儿名素菲,身体还好。

你们修县志,修的怎么样了?

适 九,十一,六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录》,1989年2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复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承先生寄赠《支那学》二号、《金冬心之艺术》一册、《品梅记》一册,都已收到了。我很诚恳的感谢先生。

我的病还不曾全好,故久没有写信答你的两次长信,请先生原谅我。

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日本的批评家向来很看重明、清两代的艺术,以为“文人画”,远不如宋、元。此种议论影响欧、美收藏家甚不少。我不料先生的“巨眼”竟能赏识到金冬心一流的艺术。我看《古拙论》及先生画

的《品梅记》封面，知道先生确是有心得的。但不知先生此种论调在今日日本艺术评论界能得多少同调？

我对于音乐，完全是外行。雕刻图画，我能领会一点，但自己全无所能。惭愧惭愧！

先生希望我们“把中国的长处越越发达，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艺的优所拿来，渐渐冀补，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艺”；这真是我们一班同志的愿望。但我们的能力太薄弱，恐怕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

两册《支那学》都借给周作人先生兄弟看去了（他的哥哥周豫才，假名“鲁迅”，也是深知日本文艺的人）。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杂志。

我曾寄《尝试集》再版一本给先生，不知先生收到了没有？

先生叙述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取材很确当，见解也很平允，——只是有许多过奖我个人之处——周先生想译成汉文，但因此文尚未完了，故不曾动手。

病中不能多谈，先表我感谢的诚意，并祝先生安好。

胡 适 九，十一，十一

* 本函最初发表于1977年8月香港《明报月刊》《胡适写给青木王儿的信》。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前几天我曾有一封信给先生。今天我的病略好些，看完了先生的《金冬心之艺术》。先生这部书很好，我很佩服。附录的“诗画一致”与“古拙论”都是很有独见的文章。我曾有《谈新诗》一篇（曾刊入《星期评论》），中间主张“具体的写法”，大旨说“做诗须要使读者脑中呈现浓厚明了逼人而来的影象”。例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是。此意与先生的议论有相同处。近代西洋诗人提倡的“Imagism”（影象主义），其实只是这个道理。

《金冬心》页49有《双禽曲》一诗，刻本的句读大误，望先生于再版时改正。此诗当读：

白练雀，一双林中啼。
其性不叛不妄飞，
不拣别家枝上栖。
别家树虽好，——
密叶蔽空根合抱，——
虞人祸机卒难保。
饥时且食山果红，
莫啄地下叩头虫，
彼方乞怜求天公。

先生以为何如？又页 51 末行“草堂尘扫，树团团围抱，蔬饭好，此间无热恼”，句读也被排错了。次页(52)首行也应读“六六水窗通，扇底微风”。

周作人先生读《品梅记》，最赞成滨田先生的一篇的议论。我以为周先生的见解很不错。

今夜收到《支那学》三号，多谢多谢。此期佳作甚多，我已匆匆看过一遍。

余话容后谈。

胡 适 九，十一，十八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刊》第 1 辑，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九，十一，二八的信使我很欢喜。因为先生不但不怪我狂妄，反因此提出日本“支那学者”应改用中国音读法的论文。这种态度是我所深佩服的。

先生论金冬心的诗，使我起一种新兴趣。我近来重读他的《三体诗》与《自度曲》，觉得先生所说尚有未尽。我此时尚不能作用脑力之文，等到我病全好时，我定要做一篇“一百七十年前的新体诗”，专论金冬心的诗。他的诗如

月竟长圆，
花全不落，
便日日醉倒月窟花丛，
也无些趣。

如

置身天际，
目不识三皇五帝，——
那有工夫替人拭涕！

如

无人问，
国香零落抱香愁。
岂肯同葱同蒜
去卖街头！

不但声调是“革命的”；即以思想论，也可算是新诗了。将来此文若做成，我应该感谢先生给我的 inspiration！

你的白话信，我全看得懂。偶有一两处很微细的错误，——例如“还没有遑实行”的“遑”字太文了，——但都无妨碍。我若能把日本文学到这样通顺的地步，我就真要高兴极了。

《支那学》四期已到了，谢谢。

我有几件关于支那学的事要请先生和先生的同志帮忙，不知可以吗？

第一，清康熙时，有一位怪特的学者，名姚际恒，是一位极

大胆的疑古家。他的遗书只有一种《古今伪书考》和一部书画录是容易寻得的。此外,他尚有《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和《庸言录》一种,我遍求不得,诸家书目亦不著录(《庸言录》曾入四库存目中)。不知日本有此二书否?日本之支那学者有论及此人的著作的吗?先生若能替我访问,或竟能替我寻到此人的书(我愿出资购买),我就非常的感激了。

第二,《支那学》第三号上有内藤先生作的《章实斋年谱》一篇。我也是爱读章氏的书的人,但《章氏遗书》此时很不易得。《文史通义》之外的遗文,我仅搜得四五十篇。内藤先生说 he 去年得抄本章氏遗书十八册。这一句话引起我的“读书馋涎”不少!内藤先生是否有意刊布此项遗书?若一时不刊布,他能许我借观此书的目录吗?章实斋一生最讲究史法,不料他死后竟没有人好好的为他作一篇传!内藤先生的《年谱》确是极有用的材料。他若能把他所得的遗书刊布出来,岂非支那学上一件大快事!请先生替我问一问内藤先生,好吗?

第三,先生前函曾提及令师狩野先生的《水浒考》,又蒙先生许我搜求登载此文的《艺文》杂志。此文我极想拜读一遍。若蒙先生代觅得那一号《艺文》,千万寄我一看!君山先生的住址,也请先生告我,我想寄一部《水浒》给他。

另寄上《儒林外史》一部,奉赠先生。我本想为此书作一篇考证,不幸我病了,故只能用一篇旧传塞责,惭愧惭愧!

胡适 九,十二,十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

答 陈 独 秀^{*}

仲甫：

十六夜你给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

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

适（12月间）

* 本函最初见于《陈独秀书信集》，1987年新华出版社出版。

致 陈 独 秀^{**}

独秀：

你给孟和的信与给北京同人（答我）的信，我都见了。

你真是一个卤莽的人！我实在有点怪你。你在北京的日子也狠久了，何以竟深信外间那种绝对无稽的谣言！何以竟写出那封给孟和的决绝信！（你信上有“言尽于此”的话！）你难道不知我们在北京也时时刻刻在敌人包围之中？你难道不知他们办共学社是在《世界丛书》之后，他们改造《改造》是有意的？他们拉出他们的领袖来“讲学”——讲中国哲学史——是专对我们的？（他在清华的讲义无处不是寻我的瑕疵的。他用我的书之处，从不说一声；他有可以驳我的地方，决不放过！但此事我倒狠欢迎。因为他这样做去，于我无害而且总有点进益的。）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

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狠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你难道不知延聘罗素，倭铿等人的历史？（我曾宣言，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但是我究竟不深怪你，因为你是一个心直口快的好朋友。不过我要你知道，北京也有“徐树铮陆军总长，陈独秀教育总长”的话，但我们决不会写信来劝你“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事，我以后不再辨了！

* * 本函选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约写于1920年底（或1921年初）。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九，十二，二十五的信，我至今未答，请你恕我。

冈鸣璞（按：青木原函作岡嶋璞，应为冈鸣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

先生说冈鸣的著作中有“《忠义水浒传》二卷，自第一回至第十回，附训点刊布”。此本是否圣叹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我极想得着一部。不知能求得着吗？

明代之《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购买吗？如能购得，我极愿买一部。我近来买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是

一种六十六回本与《征四寇》合并起来的。

《艺文》第一年第五号，倘蒙借观，我定谨慎收藏，阅毕即寄还你。

《章氏遗书》事，我近来有很好的消息可以报告。我得到你的信的时候，我查得浙江图书馆（杭州）有一部钞本的《章氏遗书》。我托人去访问并要钞目录，不意回信来时，信上说此书已用铅印排印，已由邮寄上一部了！此书共十二册，三十四卷，为中国最完全的《章氏遗书》。可惜此书校对不精，错误甚多。我现在正校读此书，不久将可完毕。若内藤先生未见此书，我可以寄一部赠送给他，因为寄刻本比寄钞本更容易些，他也可以用此本校他的钞本，把校对的结果发表出来，给我们公用。

先生要做一部用扬州作背景的小说——这是我们极欢迎的事！

《吴敬梓传》乃是旧稿，成于一夜之功，故甚不满我的意。我现已搜得吴敬梓的《文木山房集》刻本，故将来我定有一篇《吴敬梓新传》出来。（《扬州画舫录》卷十，有一段提到吴敬梓父子。但寥寥三四行之中，却有三四处大错误！）

我曾寄了一部《水浒》去赠给狩野先生，不知他收到没有？

适 十，一，二四

我今年又复病一次，现已好些，但还不曾上课。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

致李大钊等《新青年》编委*

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年底的时候，独秀有信寄给一涵与我，信中有云：“《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似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此信日子为十六夜，但至十二月二十七夜始到。）我因答此信，曾提出两条办法。（原信附上）我自信此两条皆无足以引起独秀误会之处，不料独秀答书颇多误解。守常兄已将此书传观，我至今日始知之，未及加以解释，恐误会更深，故附加一函并附独秀与孟和书一份，再请你们各位一看。

第一，原函的第三条“停办”办法，我本已声明不用，可不必谈。

第二，第二条办法，豫才兄与启明兄皆主张不必声明不谈政治，孟和兄亦有此意。我于第二次与独秀信中曾补叙入。此条含两层：1. 移回北京。2. 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大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迫北京同人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

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岂非与独秀临行时的希望——“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相背吗？

第三，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 Soviet Russia 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辟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总之，我并不反对独秀，——你们看他给孟和的信，便知他动了一个感情，故轻信一种极可笑的谣言。——我也不反对《新青年》，我盼望《新青年》“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独秀函中语）。我为了这个希望，现在提出一条办法，就是和独秀商量，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

这个提议，我认为有解决的必要。因为我仔细一想，若不先解决此问题，我们决不便另起炉灶，另创一杂志。若此问题不先解决，我们便办起新杂志来了，表面上与事实上确是都很像与独秀反对。表面上外人定如此揣测。事实上，老实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独秀虽说“此事与《新青年》无关”，然岂真无关吗？故我希望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若京、沪、粤三处的编辑部同人的多数主张把编辑部的事移归北京，则“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皆独秀函中语），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

诸位意见如何？千万请老实批评我的意见，并请对于

此议下一个表决。

胡适上 十,一,廿二

慰慈赞成此议。 适。

一涵赞成此议。 适。

赞成移回北京。如实不能则停刊,万不可分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陶孟和。

赞成孟和兄的意见。 王抚五。

我还是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但如果不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我对于改归北京编辑之议亦不反对。而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办比分裂还不好。 守常。

后来守常也取消此议,改主移京编辑之说。 适注。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趋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 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 树。

玄同的意见,和周氏兄弟差不多,觉得还是分裂为两个杂志的好。一定要这边拉过来,那边拉过去,拉到结果,两败俱伤,不但无谓,且使外人误会,以为《新青年》同人主张“统一思想”,这是最丢脸的事。孟和兄主张停办,我却和守常兄一样,也是绝对的不赞成。我以为我们对于仲甫兄的友谊,今昔一样,本未丝毫受伤。但《新青年》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的,即使其中有人彼此意见相

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极而言之,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我们也不能要他停办。至于《新青年》精神之能团结与否,这是要看各人的实际思想如何来断定,断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玄同附注。一九二一、一、廿六。

* 本函最初见于《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张静庐辑注),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谢谢你的十,二,三,的信,与你寄赠的《忠义水浒传》二册!

这两本《水浒传》使我非常欢喜。我拿他与现行金圣叹本及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对照着读了几回。我的观察是:

(1)此本的底本,确如你说,是明李卓吾评百回本。

(2)此本的文字言语与金本相差甚微,所不同者只在金本减少许多骈偶的累赘句——例如“但见祥云迷凤阁,瑞气罩龙楼;含烟御柳拂旌旗,带露宫花迎剑戟……”——及许多庸劣的韵语——例如“腰长臂瘦力堪夸,到处刀锋乱撒花;鼎立华山真好汉,江湖名播白花蛇”。前人多说金圣叹多所改擢,此

本可证其诬枉(此又可证我说的“新百回本的前七十回,与今本七十回没有什么大不同的地方”)。

(3)此本与百十五回本大不同。凡金本删去了的部分——即上文说的骈句与韵语二项——此两本皆有,又皆相同;有数处,此本之骈句与韵语反比百十五回本更繁多。但凡金本与此本相同的文字与语法,百十五回本却显出删节的痕迹。——此似可助证我说“百回的《水浒》善本大概是用七十回本来修改原百回本的”一个假设。

我新得的百十五回本《水浒传》,颇像你来书说的某氏所藏《二刻英雄谱》,也是一部《三国水浒合传》:上栏为《忠义水浒传》,下栏为《三国演义》。这书又名《汉宋奇书》。此间没有此书的好版本,但颇可供我的参考。倘蒙你替我访得一部百回本的《忠义水浒传》,我就真要欢喜欲狂了。百十五回本的,我不久当寄一部赠送你。

你许我抄录京都府立图书馆的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书》的目录凡例等,感谢感谢!此事不必急急,且等你有闲暇时再做。但我盼望你托你相熟的书店去替我访求一部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书》。此书既然内阁文库与京都府立图书馆皆有收藏,大概尚不难寻访。此本(百二十回本)虽不如百回本之重要,但必是很有用的参考材料。(书价若干,务请你告我,当即寄。《水浒》的时代的考定,乃是中国近世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故我不惜多费时力与精力,务期做一个可靠的考证。

《章氏遗书》我已寄上一部。此书印本不好,错误颇多,我已托人转告浙江图书馆,请他们用钞本校对一遍,做一个详细的勘误表。你来信要我寄五部,我因此书印的不甚好,故想请

你先略翻一过，如不嫌他印的不好，我当即日买了寄上。

冈鸣璞的书，钱玄同先生因新近死了一个儿子，又病了一个儿子，心境不佳，故至今还不曾研究完毕，请你原谅他。我现在病好了，不久即可上课。

今天是旧历的元旦。我案头丸善书店赠送的日历上也印着“酉年一月一日”，难道日本也有守旧的人家仍用旧历吗？北京的大多数市民依旧庆贺旧元旦。门口儿童燃放花炮，兴高采烈的很！我想起上月曾接到《支那学》同人贺年醉后的“狂笔”，我至今还不曾答谢，真是失礼之至！可惜我戒了半年酒了，不能满斟一杯北京土产的“莲花白”，遥祝《支那学》诸位先生的新年大吉祥！

胡 适 十，二，八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

致 周 作 人^{*}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 Dr. Stuart(司徒博士)及教务长 Porter(博晨光)都是狠开通的人，他们狠想把燕京大学办成一个于中国有贡献的学校。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

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我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以为你是最适当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很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狠诚恳的托我，我也狠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望你给我一个回信。

适 十，二，十四

附启：你们两位对于我的诗的选择去取，我都极赞成。只有“礼”一首，我觉得他虽是发议论而不陷于抽象说理，且言语也还干净，似尚有可存的价值。其余的我都依了你们的去取。

适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

“大世兄”的书目颇不是容易拟的。我草一个单子“请教”：

《东周列国志》

《三国志》

《两汉演义》(商务)商务似还有几种演义。

《隋唐演义》(没有有圈点的本子。)(但有洋装本,较可用。)

《侠隐记》

《续侠隐记》

《法宫秘史》前、后编

此三部为一套,连贯的。可向上海商务买。

《点滴》(校本!)

《新文学评论》(?)(中华翻印山东王祝晨选的我们一班人的东西。)

《白话书信》(我送上一本。)

《西游记》

《镜花缘》

《恨海》(吴趼人)

《九命奇冤》(吴趼人)

《上下古今谈》(吴稚晖)

此外

可给他定阅

《小说月报》一份,

《实话报》一份。

这些看完了,他大概可以读中华书局新出的“白话注解的《古文观止》”了!哈哈!

适 十,三,五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

致青木正儿^{**}

青木先生:

你的信与百十回本的《水浒传》校记,都已收到了。今天又接到你惠赐的《忠义水浒传》译本,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

我想先把现有的各本《水浒传》序例与回目,排列作一个比较表,然后寻出各本的先后与来历。这篇“新考证”若做得成,差不多全是你的帮助的结果。

浙江图书馆的书籍真不贵。你寄来的日币,换得一百〇四元,前次所买的《章氏遗书》七部,共计洋二十八元六角一分,连寄费邮费都在内了。尚余七十五元三角九分。你以后要买书,请开

单告我，我当将款汇去，由馆中直寄给你。《红楼梦》已出版，我已叫亚东图书馆寄两部送你，不知已收到否？《红楼梦考证》是匆匆做的。我很盼望你与《支那学》同人切实批评。

你考定百十回（《英雄谱》）本为明末刻本，我觉得大概不错。可惜铃木先生所藏本已缺前面的序文与回目了。我悬揣此本之序必与我寄赠你的百十五回本的序相同。此序中有“东望而三经略之魄尚震，西望而两开府之魂未招”两句，可证此本初刻成时必在明崇祯时，满洲已很成边患，熊廷弼、袁崇焕等已死，流贼已很横行。你以为如何？

译本《忠义水浒传》第142回有李逵反对招安，宋江大怒欲斩李逵一大段，为百十五回本所无。此段可以考见“忠义”二字的性质。怪不得圣叹看不起此本。

北京大学教授沈尹默先生现在京都大学研究文学。他是我的朋友，是“新诗”的一个先锋。你若有便，我盼望你见见他。他住在京都，冈崎，真如堂前町，九番地，盐田方。

《东壁遗书》的事，我盼望你不要过于急急寻找。你的热心与厚意是我十分感谢的。

《章氏遗书》错误太多，我已劝浙江图书馆的主任托人细校一遍，作一个详细的正误表。此表已付印，出版时，我当寄几份给你。

胡 适 十，五，十九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

致周作人*

启明兄：

今天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君。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你病后，千万不要太劳。我看见你又已动手大译小说了，故作此忠告。

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点滴》排印错误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

此两事，确系我替你的身体计的。此两事皆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

千万回我一信。

适 十，八，卅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先生：

你的大札，已拜读过了。钦佩之衷，匪可言喻。

我躲了一点懒，你偏不许我躲懒，真是岂有此理！

《诗经》确应该收进去。但此一篇狠不容易做。等此书写定付印时，我一定加上一篇，也许不止一篇，或须三四篇。大旨是：

(1) 《诗经》的白话文学。

(2) 这种白话的区域——东到山东，北到秦晋，南到江汉流域。

(3) 这个区域内各地方言的同异。最要紧的是求出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语来。

(4) 拿这个普通语来比较战国时的文章。考定：战国时的文章与《国风》时代的白话相差若干？例如《孟子》是否白话？《庄子》是否白话？《楚辞》的那一部分是白话？

(5) 白话究竟何时始与文言大分离？分离的原因如何？

你看，这一篇是不是难做？

你出了这一个难题，怕要耽误此书出版的年月了！

我也出个小题目给你。请你火速做一篇《西游记序》，

七日内必须交卷。亚东敬备“润笔”之资，或可少补教书先生的“吃饭”之费。你务必要做的。

适 十、十二、十

* 本函录自《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

致钱玄同**

玄同兄：

我的《三国序》已付排了。他们渴望你的序。请你即动手一挥，如何？

我的序大意是：

- (1) 三国时代何以为演义家的最好题目？
- (2) 《三国》的略史。明本与今本的异同。
- (3) 《三国》何以没有多大的文学价值？
- (4) 《三国》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教本。

我因为你要谈文言白话的问题，故我不曾题及此一层。

适 (5月24日)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5辑。

致郭沫若、郁达夫*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我最注意的是达夫在一五二页上说的：“因为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旧作的文字，淘了许多无聊的闲气。更有些忌刻我的恶劣分子，就想以此来作我的葬歌，纷纷的攻击我起来。”

我狠诚恳地希望达夫的第二句话里不含有与我有关的意义。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作他们的盲徒。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

“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后来达夫做了一篇短文，内中全不提译文，而说我所以强出头，是因为原文有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的话，而我是曾跟杜威做翻译的，所以借题雪恨。这篇文章，他寄给北京《晨报》社，社中记者给我看了，我劝他不要登。他说，他因为要表示作者的人格之堕落，所以主张登出；我说：“正因为我爱惜作者的人格，所以不愿你登出。”后来他回信赞成我的态度，所以不登了。——然而此文终于在别处发表了。——我追叙这一段故事，只是要你们知道我对于你们，只有爱惜，而无恶意。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狠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狠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狠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如果你们不见怪，我狠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例如译 Omar〔莪默·伽亚谟 (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

帮助本文的了解。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胡 适 十二，五，十五

此信能不发表最好，倘有赐复，请寄亚东图书馆转。
适。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胡 近 仁**

近仁叔：

前不多时，曾寄一信，谈宗武事，想已达览了。

二月二十二日手书已收到。

福保的问题，我以为可先进二师。现在真没有好中学堂！那里不是你说的“机械教育”！二师的危险是很明白的，所以不足怕。易卜生的儿子少时，易卜生送他到俄国去留学。人问，“你是爱自由的人，为什么不送他到美国去？”易卜生说：“美国人得着了自由，故不知道自由的真价值。俄国人没有自由，故反能认识自由的意义。”二师虽专制，却是制造革命党的好地方。胡子承不但替胡适之造了许多信徒，还替陈独秀造

了无数党员！（但这个消息，你千万不可让子承先生知道！！）福保不妨先去二师，等到他被子承先生开除出来时，他已是自由的忠心的信徒了。

如果将来福保的经济有不足时，我定可以帮助你一点。

福保的白话诗，都通顺了，“月”一首最好。做诗先要文理通顺，将来总有进步。

绩溪一班少年诗人，无论如何，总还当得起一个“通”字。大概将来绩溪要出不少的诗人！我记得你曾集山谷句送我，中有一句是“少年有功翰墨林”。但将来的少年如果都去学胡适之做白话诗，那么，我也许遗害他们不浅，将来我也许得着“少年流毒翰墨林”的墓铭呢！

素斐又大病，恐不易好了。余都平安。

适 十三，六，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录》。

致 高 一 涵^{*}

一涵：

久不看报，前日检得你在《晨报副刊》上《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我仔细读了，实在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要表示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什么道德？

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三块钱至五块钱，不算是可耻的事。献寿文，作瞒心昧己的谀墓文，那是文丐。借文字敲竹杠，那是文丐。用抄窃敷衍的文字骗钱，那是文丐。迎合社会的恶劣心理，制造下流读物，那是文丐。但拿不苟且而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我们如果有一点忠恕之心，不应该这样嘲骂他们。如吴稚晖先生在极穷困之中，作文亦不受酬，那是超人待己之严，是可佩服的。但不以此自律，而以此骂人，那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尤其不希望你干的。

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报》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月刊》应该格外注重文字的质量；既要朋友白帮忙，又要挑剔文字的好坏，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

但我们既不要军阀的钱，又不愿把自己卖给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笔钱打那儿来呢？

“商务”同“亚东”承办《努力月刊》时，我们即提出这笔编辑费作为一个条件。“亚东”情愿借贷来承办此报，但独秀劝他们不必竞争，只要求几个条件，内中有一条是独秀和我的文字不受酬，保留版权（独秀当日也是担任《月刊》撰文的人）。“商务”承办的杂志本无担任编辑费的先例；但对一切杂志皆有“销数满二千部后，其二千部以外销出之数，发行人应以版税二成交付著作人”的规定。《努力月刊》因有《周刊》八千份

的底子，故“商务”肯以六千部的销数作为计算的基础，决定即以此项预支的版税作为编辑费。此是“商务”承办此报的事实，并无如你说，“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的情形。这样说话，但求一时的快意，而不顾事实的不符，也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

至于“商务”对《努力》的关系，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周刊》出版后，“商务”即破例愿为代售，并为代定。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挣红利”的表示吗？《月刊》之非挣钱营业，人皆知之。“商务”所办杂志，至今能挣钱者，有几个呢？他们这一次不恤冒险而担任《努力月刊》的编辑费，我们自己计算，姑以每年五千四百元编辑费而论，加上印刷、发行、广告的费用，须真有八千份的销数方可够本，而月刊不比周刊，周刊能有八千份而月刊不易至此数。“商务”契约上并声明，“以三年为限，限满清算；如著作人应得版税及广告费总数超过三年内预支之总数，应由发行人照数补送。”但如三年内销数不满八千，我们却不须赔偿他的损失。这种单方的条件，我们能说他们是谋红利吗？这种资本家有何威可畏？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何况我深知“商务”此番全出于好意的友谊，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使我觉得很对“商务”不住。我又不愿把我们的契约无故披露在报纸上，以博一班神经过敏的人的谅解。所以我写这封信

给你,请你替我想我处此境地,应该怎样办法。

我说的话有不免太直切之处,但我对朋友的通信是从来不会作伪的,对你尤其不敢矫饰,想你能谅解。

适 十三,九,八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王正廷**

儒堂先生: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贍之资。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倘见着膺白先生，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

胡适敬上 十三，十一，五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李书华、李宗侗*

书华，玄伯两先生：

谢谢你们的信。

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隘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我要“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的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你们既

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意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弟 胡适 十三，十一，廿八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王 国 维^{**}

静庵先生：

手示敬悉。顷已打电话给曹君，转达尊意了。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遵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日内稍忙，明日或能来奉访。匆匆，即颂
起居佳胜。

适敬上 一四，二，十三

** 本函最初见于《文献》第15辑，1983年3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致钱玄同*

玄同：

谢谢你的长信。我从公园回来后，也坐下来作工，写成了《凌廷堪》一章，大有老实不客气的神气，做成也颇得意，大概是良宵风月之赐也乎？

《今文家书目》，真应该磕头道谢的。我一定依这个指南针去寻求；但我近来觉得今文家之中，有陋气的居多，有奇气的颇少，恐怕搜求的结果是粪土之多远过于香水呵。昨晚偶翻《古微堂集》，第一卷名“默觚”，其中都是“气禀物欲皆为性分所本无；去本无以还其固有”。“鬼神之说，其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一类的话，使人大失望。魏源是今文家之佼佼者，尚且如此之陋！大概龚、康、崔要算最少陋气的了。

“挤香水”的话是仲甫的误解。我们说整理国故，并不存挤香水之念；挤香水即是保存国粹了。我们整理国故，只是要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只是直叙事实而已，粪土与香土皆是事实，皆在被整理之列。如叙述公羊家言，指出他们有何陋处，有何奇特处，有何影响，有何贡献，——如斯而已，更不想求得什么国粹来夸炫于世界也。你说是吗？

《华国》、《学衡》都已读过。读了我实在忍不住要大笑。近来思想界昏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我也想出点力来打他们，但我不大愿意做零星的谩骂文章。这种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呵。“法宜补泻兼用”：补者何？尽量输

入科学的知识,方法,思想。泻者何?整理国故,使人明了古文化不过如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虽似迂远,实为要图。老兄不要怪我的忍耐性太高,我见了这些糊涂东西,心里的难受也决不下于你。不过我有点爱惜子弹,将来你总会见我开炮时,别性急呵。你信上也曾提起我的《评东西文化……》及《科学与人生观序》。我觉得这两炮不算不响。只是这种炮很费劲,我实在忙不过来,如何是好?

这封信写了两天,时作时辍;若今晚不寄出,怕又要搁起来了,因为明天我有五点钟的课。

适 十四,四,十二

寄上一篇演稿。以文章论,你看如何?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致王国维**

静庵先生:

夏间出京,归后又以脚疾不能出门,故久不得请教的机会。顷作所编《词选》序,已成一节;其中论长短句不起于盛唐,及长短句不由于“泛声填实”,二事皆与传说为异,不知有当否,甚欲乞先生一观,指正其谬误。千万勿以其不知而作,遂不屑教诲之也。

匆匆即祝

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十月九日

* * 本函最初见于《文献》第15辑。

致 陈 独 秀^{*}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本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1925, 12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豫才，启明，通伯三位先生：

昨天在天津旅馆里读鲁迅的《热风》，在页三三——三四上读到这一段：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我很感动。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半农同我谈的话。今

天再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作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些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

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适 之 十五，五，廿四，天津裕中饭店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傅 斯 年^{**}

孟真：

前天发一信，已接到否？我决计住到九月三号，甚盼你能早来。今天细读你的长信，格外高兴。相别几年，各自寻觅途径，结果却很接近，如古话所谓“条条路可以到罗马”，又可以因互相印证而知道各人所得的得或失。

你最得意的三件事，我却也有点相像。1. 近来每用庞居士临死的遗训劝人：“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庞居士也许注重在上半句，我却重在下半句。你的“几句中国书”还不曾忘的“干干净净”，但这不关紧要，只要把那些捆死人的绳索挣断几条，——越断的多越好，——就行了。2. 捆人最利害的是那些蜘蛛肚里吐出来自己捆自己的蛛丝网，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很痛快。例如 Descartes，我只记得他“善疑”，只教人学他“善疑”，其余的他的信条，我早已忘了。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的吃饭家伙丢了。3. 我很佩服你的“野蛮主义”；我近来发表一文论西洋近代文明，你见著了没有？（《现代评论》七月初）你若见了此文，定有许多地方能表示同意。我在那文里说，“西洋近代文明不从宗教出发，而结果成一新宗教，不管道德，而结果自成一新道德”。此言与你的“一学得其野蛮，其文明自来”，同一见解，但没有你说的痛快。

你赞许我的两件事，也使我很高兴。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很惹一些人笑话。关于第二层，——小说的考证——我也很高兴。老实说，这十年来，没有一篇文字费去的时间与精力有《〈水浒传〉考》、《〈红楼梦〉考证》那样多

的。我那次病倒，也就是从第一篇《〈水浒传〉考证》得来的。但我的辛苦已得了过望的酬报了。几部第一流小说的作者的事实都次第发现了，这差不多是一种“生死人而肉白骨”的功德！最大的报酬却是一些“副产物”（by-products）。我的本意本想提倡一种方法，做学问的方法。颉刚在他的《古史辨》自序里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里得著他的治史学方法。这是我生平最高兴的一件事。

关于你说的“古代思想集叙”的大计划，我此时不能多谈，只好留作我们谈话的资料罢。

适 之 August, 24, 1926,

* * 本函据原件录入（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致 江 冬 秀^{*}

冬秀：

我今天哭了女儿一场，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这几天睡少了，今天下午无事，睡了半点钟。梦里忽然看见素斐，脸上都是面[病]容。一会儿就醒了。醒来时，我很难过，眼泪流了一枕头；起来写了一首诗，一面写，一面哭。忍了一年半，今天才得哭她一场，真想不到。

我想我很对不住她。如果我早点请好的医生给她医治，也许不会死。我把她糟掉了，真有点罪过。我太不疼孩子了，

太不留心他们的事，所以有这样的事。今天我哭她，也只是怪我自己对她不住。

我把这首诗写给你看看。

见通伯、叔华时，把此诗给他们看看。整整一年不作诗了，谁知却是死了的女儿来破我的诗戒！

我昨天第一次在哥伦比亚开讲，很有意思。

礼拜三晚上(二月二)，一个旧同学请我吃饭；他们有一男一女。他夫人说起，他们的女孩子病了两年多，现在好了，一年之中添了十六磅重。但她身体还不很强壮，只送她在私立学堂里去，每天只做半天的工课，就回来休息。后来我们吃饭时，两个孩子都醒了。女孩子在床上喊妈妈去，说“要看看胡适”。我去见她，她不过八岁，坐起来喊我。我心里很感动。大概今天梦里见着女儿，也是那天留下的影象。

我两星期后到哈佛去，行止还不能十分决定。大概四月的船期不能改了，四月十二开船，月底可到家。

祝你们好。

适 之 纽约，十六，二，五

眼泪也是奇怪的东西。你记得，我母亲死后，我接到电报，手直抖，但没有眼泪。后来走到路上，在饭店里，忽然哭了。到中屯，进外婆家的门，方才大哭。

前年在上海，读法国科学家柏斯德的传，忽然掉了不少的泪，手绢都湿了。

素 斐

梦中见你的面，
一忽儿就惊觉了。
觉来终不忍开眼，——
明知梦境不会重到了。

睁开眼来，
双眼迸堕。
一半想你，
一半怪我。
想你可怜，
想我罪过。

“留这只鸡等爸爸来，
爸爸今天要上山来了。”……
那天晚上我赶到时，
你已死去两三回了。

……

病院里，那天晚上，
我刚说出“大夫”两个字，
你那一声怪叫，
至今还在我耳朵边直刺！

……

今天梦里的病容，

那晚上的一声怪叫，
素斐，不要叫我忘了，
永永留作人们苦痛的记号！

（十六年二月五日，梦中见女儿素斐，醒来悲痛，含泪作此诗。忍了一年半的眼泪，想不到却在三万里外哭她一场。）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钱玄同**

玄同：

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

该死的钱玄同，怎会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能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做“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挖下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处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生天，免在地狱捣乱。

《醒世姻缘》的序，如旭生与芝生肯做，那是再好没有的了，请您代问一声。旭生不在京，请先问芝生。能早日回我一信，最好。

小说考证，我真干不了了。此事本应该由一般朋友大家分任，人任一部书，则轻而易举。我做了几部最容易做（因为材料多）的小说的考证。材料没有了，考证也做不出了。如《醒世姻缘》便是一例。

《封神传》，我请颉刚作序，他也没做成。此时我在客中，手头没有书，成了缴械之兵，更没有法子做考证的文字了，只好胡乱“望文生义”，做几篇评论内容与技术的序罢。

近日收到一部乾隆甲戌抄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只剩十六回，却是奇遇！批者为曹雪芹的本家，与雪芹是好朋友。其中墨评作于雪芹生时，朱批作于他死后。有许多处可以供史料。有一条说雪芹死于壬子除夕。此可以改正我的甲申说。敦诚的挽诗作于甲申（或编在甲申），在壬子除夕之后一年多。（也许是“成仁周年”作的！）又第十三回可卿之死，久成疑案。此本上可以考见原回目本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后来全删去“天香楼”一节，约占全回三之一。今本尚留“又在

天香楼上另设一坛〔醺〕”一句，其“天香楼”三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今始知为删削剩余之语。此外尚有许多可贵的材料，可以证明我与平伯、颉刚的主张。此为近来一大喜事，故远道奉告。

《国语文学史》的事，新月书店误用您的姓名，却并无恶意，不过是借重大名来登广告而已。（若说“北京文化书社印了一千本”，就没有味儿了。）广告不是我做的，但我总得代为负责向您请罪。（广告全文附呈。）

国语文学史

胡 适 著

胡适之先生的著作还用得着广告吗？……

这是国语文学史的上卷，曾经钱玄同先生在北京印行过一千部。现在胡先生又重加修订，由本店出版。

要研究文学史的，
要研究国语文学的——
不可不读这本书。

《国语文学史》原稿，我本不很看得起。去年检查敦煌写本，检得许多文件，可以证实唐代实有很多的平民文学，——比我推想的还要多的多，——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修正我的原稿，先出上卷。但此时尚未修改，大约须俟我把参考书收齐，方能下手。

因此，我要请你帮我一点忙：①请代我买一部《沙洲文录》及《敦煌零拾》；②请代买一部半农的《敦煌掇琐(?)》，或者请

他送我一部。③如半农此书尚未出版，请代检他的自序与目录，赐我一份。此二事乞即一办，不胜感谢之至。

最后要提到你的信的末段了。这一段大有“可杀”的气味。所以说四十以上人有该死之道者，正因为他要“回思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耳。实则大可不必忏悔，也无可忏悔。所谓“种种从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是也。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昔日陆子静的门人有毁朱元晦者，子静正色说道，“且道世间多个朱元晦、陆子静，是甚么样子；少个朱元晦、陆子静，又成个甚样子”。（原文记不得了。）如今只好说，“世间添个钱玄同，成个甚么样子！少了个钱玄同，又成甚么样子！”此中一点一滴都在人间，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担当而已。你说不是吗？

祝你好。并望常常写信来。

适 之 十六，八，十一

*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致 太 虚*

太虚先生：

功德林席上，太匆匆了，不及细谈。别后又因事忙，不曾得机会写信。千万请 恕罪。鄙意以为 先生到欧美，不如

到日本；去讲演，不如去考察；去宣传教育，不如去做学生。此三层意思，说来甚长，现在只能略引申之。

先生能读日本书籍，若能住日本多读一点基础科学及梵文、巴利文，三五年之后进益当不浅。往欧美则有语言上的困难，虽有译人，终觉相隔几层，用力多而成功少，且费用又很大。故我说，到欧美不如到日本。

传闻 先生之行带有讲演与宣传教育之意。此意在今日夸大狂的中国，定有人劝驾。然鄙意则甚不赞成。佛教在中国已成强弩之末，仪式或尚存千万分之一二，而精神已完全没有了。先生是有志复兴佛教的一个人，我虽不热心于此事，然未尝不赞叹先生的热心。倘先生与座下的一班信徒能用全副精力做佛教中兴的运动，灌输一点新信心到这已死的宗教里去，这自然是可敬的事。然此事去成功尚太远太远，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候。西洋民族文化之高，精神生活之注重，道德之进步，远非东方那班吃素念佛妄想“往生”的佛教徒所能梦见。先生此次若决计去西方，我很盼望先生先打消一切“精神文明”的我执，存一个虚怀求学的宗旨，打定主意，不但要观察教堂教会中的组织与社会服务，还要考察各国家庭，社会，法律，政治里的道德生活。昔日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于印度僧徒的毛厕上用的拭秽土块，尚且琐琐详述，如今看了，似觉好笑，然古人虚怀求学的精神，殊不可及。先生此行，无论在欧美，在日本，若能处处扫除我执，作一个虚怀的学生，则玄奘，义净的遗风有嗣人了。如为一班夸大狂的盲人所误，存一个宣传东方文化的使命出去，则非我所敢附和的

了。

因为 先生曾征求鄙见，不敢随便应酬，故贡其狂言，千万请原谅。

胡适敬上 十六，十，八日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张 元 济**

菊生先生：

小诗乃辱和作，高兴之至。

志希住处，我不知道。馆中李伯嘉定知之，送礼可托他转去，必不误。

王梵志事，《太平广记》八十二说他是隋唐之间的人。前日晤董绶经先生，他也有考证，引证甚多，许我借抄。不久《梵志诗集》与考证定可成小册子了。

适上 十六，十一，九夜

附原诗：

盗窟归来一述奇，
塞翁失马未应悲。
已看六夜绳床味，

换得清新十首诗。

菊生先生脱险归来，作诗自遣，皆温柔慈祥之言，无一句怨毒之语。因占一绝句奉和，并乞教正。

胡适 十六，十一，九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书信集》上册，1996年9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久不相见，甚盼走访承教，今日下午已出门了，又为来客所阻，仍复折回。

承赐借《旧唐书》，先生的校注极有用处。如李白一传，殿本脱二十六字，正是极重要之文；少此二十六字，此传遂不可读。今人论李白，多据《新书》，其实《新唐书》远不如旧书之可靠。倘非得先生用宋本校补之本，我竟不知此传的本来面目了。故草此书道谢，并盼先生早日将校本全史付印，以惠学者。不知曾有意于此否？

又顷读顾况的诗，颇喜其诗多白话。《旧书》说他是苏州人，《全唐诗》说他是海盐人。此人当日因作白话诗多嘲讽，竟致得罪贬谪，此冤似不可不为一伸。先生习于海盐掌故，不知顾况的文集二十卷有传本或辑本否？便中幸见示为感。

匆匆即祝
起居佳胜。

适上 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书信集》上册。

致 张 元 济**

菊生先生：

来示敬悉。《华阳集》已读过，稍迟当奉还。此集中所收文有几篇尾有年月，可以考其人生卒年代之大概。

《苕溪渔隐丛话》已送来，甚有用处。此为绩溪人著书中最流行的一部书，虽无甚精义，然颇便检查。王梵志有二条，已录出。

先生校全史之功作，真可敬佩，令我神往。鄙意以为先生宜倩一二助手，先将已校各书过录一二副本。岫庐近作《千种丛书》计划，中有廿四史均拟加点读。点读之际似可即将先生已校改各本改正。先生以为如何？

整理全史，今日已不容缓。清代学者已有之成绩似亦应有一总结集，如王益吾《两汉书补注》之例。若不结集，则此种勤苦之功力只有裨于极少数之学者，于多数读者仍无关系，殊可惜也。

连日在同文书院作四次讲演，殊忙迫，故不及走访。稍迟

当趋谒承教。匆匆即颂
近安。

适 敬上 十六,十二,十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书信集》上册。

致 吴 敬 恒^{*}

自从大华饭店一见之后,又多时不见了。那天我曾谈起同文书院的四个演讲,现在这四讲的稿子都给孙伏园发表了。其中前半只存大意,戴氏一讲略有增改,稍近讲演时的全文;惟关于先生的一讲则系今年旧历新年里所改作,比原稿多出不止一信。伏园说,他已把全篇寄给先生了,今寄上末讲校改稿,请先生切实指正。

作此文之意起于几年之前,当时《现代评论》诸君,特别是通伯,都怂恿我早日动手,但终以不得清闲时间,不敢潦草着笔,唐突先生。去年在东京见梁君所编先生学术论著续集,始得读《杭育》全份(我竟没见过一篇,《民国日报》久不到北京),其中第五篇最使我高兴,因为我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中作《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其见解差不多全同于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中发表的论调。那时便又有作文“述吴稚晖”的意思。直到七、八月后,此意方才能实现。所以又迟迟如许之久者,一则先生当日身当政争之冲、述学之文或不免被人认作

有意拍马屁；二则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

作此文的大意，先生是明眼人，定能看出此中总不免有点“借刀杀人”的动机。承先生说“我于先生的新信仰‘虽无具体的相同，却也不曾寻出他的异点来’”，这几年来我和先生的主张渐多“具体的相同”，故述先生的信仰都是抬出老将军去打头阵，好让我们腾出功夫来多预备一点子弹来给先生助战。此意与先生所谓“浇块垒”者大不同，或不为先生所痛斥罢？

我的立脚点是历史，故此文把先生排作“反理学”运动的最近一幕（不是最后一幕），又特别看中了先生的文化史观，把它从附注里提出来作为正文，这一点不知先生能同意否？（我那年在塘[唐]山住在先生处，亲见先生壁上的五千年历史图表，故私心总把先生归在国内少数治历史的人里面，只怕先生不愿意受我的“高攀”呵！）

先生当日作《新信仰》一文，先叙宇宙观，次叙三个人生观；这个大纲目之外要说的话，便都放在附注里。我两次试述此文（一九二四在大连满铁暑期大学，用英文作的；一九二七同文原稿），皆依此纲目，总觉不能惬意，而不解所以不能惬意之故。今年改稿，始放胆抛弃原文的纲目，把附注之文提作正文，而不复述人生观的三大段。稿成后，觉得这办法比前两次满意多了，试令别人读过，他们也都容易明白了解。不知先生自己对于这个大搬动有何意见？

以上各点，均望先生有空闲时见教。

此外还有一个请求。我在此文开端，竟不曾叙述先生的历史，其实是因为我全不知道先生一生思想变迁的历史，故不敢瞎说。我想请先生腾出一点时间来赐我一篇简单的“自传”，粗枝大叶地谈谈那位常州吴老头子的故事，给我这个朱朝奉的同乡后辈添点史料，使他将来作“朱注”时不致于劈空瞎嚼蛆。否则将来徽州胡朝奉冤枉了常州吴老先，先生也得负几分吝教之罪呵！

十七，二，廿八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钱玄同**

玄同老哥：

我的《白话文学史》上册快要出版了，上册只写到白居易，已有十九万字，只好暂告一结束，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

千万请您赏一纸题签，并且希望你即日付邮，十分感谢！

祝您好！

适上 十七，三，廿九

极司非而路 49A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致《京报》社*

京报社编辑主任先生：

承贵社赠阅《京报》，十分感谢。但每回发行处误寄两份——一份的住址是排印好的，一份是油印的，——未免可惜。请停寄一份，以省糜费。□□请改寄上海极司非而路 49 号甲。

还有一件事奉告。昨读四月廿二日 贵报附刊的□虹周刊第六期中的小说《燃犀》，其中引有我的诗句，我才知道此书的人物有我和蔡子民、林琴南等。何识时即胡适之，凌近阗即林琴南，来河清即蔡鹤顾，即蔡子民先生。

我不认得作者“园丁”先生，但我想托先生转达一点意思。

我只见了这一期登出的《燃犀》，其中已有许多地方是完全错误的。如：

(1) 我结婚时，先母尚未死，此书中所说完全错了。

(2) 林琴南并不曾有在路上拾起红女鞋的事。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诬蔑他的人格。

(3) 当陈独秀先生作北大文科学长时，当蔡先生长北大时，林琴南并不在北大当教员。

(4) 他给蔡子民先生的长信，并不是辞职的信。

(5) 作者引我的新婚杂诗，其中多割裂讹误。

本来这种用活人做材料的小说是很不易做的，做的好也

不过成一种闲话的资料(gossip),做的不好便成了造谣言的乱谈了。“园丁”先生有志作文学,似宜向真材料中去努力,不宜用这种不可靠的传说材料。质之作者,以为何如?

匆匆道谢,即祝

贵报发达。

胡适 敬上 十七,四,廿五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7册,1989年至1990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致 吴 敬 恒^{**}

稚晖先生:

令郎病状如何?深盼他已见好了。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

这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胡 适 十七，六，十六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7册。

致 蔡 元 培^{*}

子民先生院长：

大学委员会委员的事，当初我曾向先生坚辞两次，终以先生苦留，故不敢坚持。现在我已决心摆脱一切，闭户读书著述，故请先生准我辞去大学委员之职。此意十分坚决，绝无可挽回，千万望先生允许。倘先生不允许，我也只好自己在报纸上登启事声明已辞职了。千万请先生鉴察并原谅。

胡适敬上 十七，六，十六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7册。

致 蔡 元 培^{***}

子民先生：

发信后收到两函，谢谢。致基金会一函已加封寄去了。

先生不许我辞大学委员会，殊使我失望。去年我第一次辞此事时，曾说我的脾气不好，必至破坏院中和平雍穆的空气。十五日之会果然证明此言。当时我已十分忍耐，故虽被稚晖先生直指为“反革命”，亦不与计较。但日后我决不会再列席这种会，因为列席亦毫无益处，于己于人，都是有损无益。吴先生口口声声说最大危险是蜀洛党争，然而他说的话无一句不是党派的话，这岂是消弭意见的办法吗？我虽没有党派，却不能不分个是非。我看不惯这种只认朋友，不问是非的行为，故决计避去了。既已决心不出席，留此名义何用？此为最后陈述，亦不劳先生赐复，我也不登报声明，望先生体谅此意。

前书戇直，不蒙罪责，甚感！甚感！

匆匆，即祝

先生安好

适敬上 十七，六，廿七夜

*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胡 近 仁^{*}

近仁老叔：

你昨天说起要进广慈医院去戒烟，我听了十分高兴。希望此事能成功。鸦片之害确可以破家灭族，此不待远求例证，

即看本族大分二分的许多人家，便可明白。即如尊府，如我家，都是明例。你是一族之才士，一乡之领袖，岂可终于暴弃自己，沉迷不返？你现在身遭惨痛，正是一个人生转头反省的时候。若任此深刻的惨痛轻轻过去，不能使他在行为上、人格上，发生一点良好影响，岂不辜负了这一个惨痛的境地？

人生如梦，过去甚快，等闲白了少年的头，糊涂断送了一个可以有为之身，乃是最深重的罪孽也！王荆公诗云：

知世如梦无所求，
无所求心普空寂。
还似梦中随梦境，
成就河沙梦功德。

知世如梦，却要在梦里随时随地做下恒河沙的梦功德，此真有得于佛教之言。若糊糊涂涂过去，世间有我不加多，无我不减少，这才是睁开眼睛做梦，上无以对先人，中无以对自己的天才，下无以对子女也。

我们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什么话不可说？到今日才说，已是过迟，罪已不轻。若今日仍不说，那才是死罪了。

千万望怂恿同志早日入院戒烟。若无人同去，可移来吾家，我请医生来给你戒烟，冬秀一定能伏侍你。

适 之 十七，七，廿四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研究丛录》。

致 罗 家 伦^{*}

志希兄：

（这几次的畅谈，使我很感觉愉快。稍有余憾的只是意气稍盛，稍欠临事而惧的态度。勇气不可没有，而客气却不可有。如那回我偶举《民国日报》的社论来证国民党今日尚没有公认的中心思想，你便说《民国日报》不是党报。此是以辩胜为贵，非虚心论事的态度。你说是吗？）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要请你尽力主张，但不必说是我的建议。

前天听说你把泉币司改为钱币司，我很高兴。我因此想，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

稚晖、子民、介石、展堂诸公当能赞助此事，此亦是新国规模之大者，千万勿以为迂远而不为。

（1928 年）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张 元 济^{*}

菊生先生：

今天第一次得读先生的白话信，欢喜极了。

我的那一篇文字，承先生赞许，又蒙恳切警告，使我十分感激。我也很想缄默，但有时终觉有点忍不住，终觉得社会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地位，若不说点公道话，未免对不住社会。况且我有一种信仰：“天下无白白地糟塌的努力”，种豆种瓜终有相当的收获。不种而获，则为不可能的事。自由是争出来的，“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似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老虎乱扑人，不甚可怕；所苦者，十年来为烂纸堆的生活所诱，已深入迷阵，不易摆脱，心挂两头，既想争自由，又舍不得钻故纸，真是憾事。

素知先生富于积极精神，故敢发狂论，千万请鉴察。

胡适敬上 十八，六，二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书信集》上册。

致李璜、常燕生*

幼椿、燕生先生：

……国家主义所出报章，《醒狮》、《长风》都是很有身分的。但其余的小杂记，如《探海灯》，如《黑旋风》，……等，态度实在不好，风格实在不高。这种态度并不足以作战，只足以养成一种卑污的心理习惯：凡足以污辱反对党的，便不必考问证据，不必揣度情理，皆信以为真，皆乐为宣传。更下一步，则必至于故意捏造故实了。如《探海灯》诗中说蔡子民“多金”便是轻信无稽之言；如说“蒋蔡联宗”，便是捏造故实了。

我以为，这种懒惰下流不思想的心理习惯，我们应该认为最大敌人。宁可宽恕几个政治上的敌人，万不可容纵这个思想上的敌人。因为在这种恶劣根性之上，决不会有好政治出来，决不会有高文明起来。……

十八，七，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刘公任*

公任同学：

谢谢你的两信，你的卷子很好，我很高兴。

你的失望，我很能了解，但我要对你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同其他生活有同样的命运：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当得起成功，更要耐得住失败；凡耐不住失败的，什么大事都不能做。

你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爱她，被弃而不怒，被骗而不怨。本不求报，何怨？何怒？爱情岂是做买卖吗？一是不再爱她，朋友仍是朋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若宣布于世，以谋报复，那是悻悻小人之所为，不是君子做的事。

何况你这一次恋爱的人，依你所说是值得你的爱情的。若果如此，则你的失败，只是盲目的爱的失败，失败正是幸福。

况且你既然尊重女子的人格，便应该承认她的自由。她自有自由，自有不爱你的自由，——无论你怎么爱她。

真爱情是不一定求报答的。她不喜欢你，你不能勉强她，不应该勉强她。

你最好走开去玩玩，跑十天八天的山水，再回来努力做一件有趣味的工作，叫工作赶跑你的烦闷。回来之时，请来寻我谈谈。

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

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m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

适 之 十八，八，八夜

* 本函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册，1994年黄山书社出版。

致 胡 祖 望* *

祖望：

你这么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庭，你妈和我都很难过。但我们为你想，离开家庭是最好办法。第一使你操练独立的生活；第二使你操练合群的生活；第三使你自己感觉用功的必要。

自己能照应自己，服事自己，这是独立的生活。饮食要自己照管，冷暖要自己知道。最要紧的是做事要自己负责任。你工课做的好，是你自己的光荣；你做错了事，学堂记你的过，惩罚你，是你自己的羞耻。做的好，是你自己负责任。做的不好，也是你自己负责任。这是你自己独立做人的第一天，你要凡事小心。

你现在要和几百人同学了，不能不想想怎么样才可以同别人合得来。人同人相处，这是合群的生活。你要做自己的事，但不可妨害别人的事。你要爱护自己，但不可妨害别人。

能帮助别人，须要尽力帮助别人，但不可帮助别人做坏事。如帮人作弊，帮人犯规则，都是帮人作坏事，千万不可做。

合群有一条基本规则，就是时时要替别人想想，时时要想想“假使我做了他，我应该怎样？”“我受不了的，他受得了吗？我不愿意的，他愿意吗？”你能这样想，便是好孩子。

你不是笨人，工课应该做得好。但你要知道世上比你聪明的人多的很。你若不用功，成绩一定落后。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的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的最高一排。工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但志气要放在心里，要放在工夫里，千万不可放在嘴上，千万不可摆在脸上。无论你志气怎样高，对人切不可骄傲。无论你成绩怎么好，待人总要谦虚和气。你越谦虚和气，人家越敬你爱你。你越骄傲，人家越恨你，越瞧不起你。

儿子，你不在家中，我们时时想念你，你自己要保重身体。你是徽州人，要记得“徽州朝奉，自己保重”。

你要记得下面的几件事：

- (1) 不要买摊头上的食物，微生物可怕！
- (2) 不要喝生水冷饮，微生物可怕！
- (3) 不要贪凉。身体受了寒冷，如同水冰了不流，如同汽车上汽油冻住了汽车便开不动。许多病是这样来的。
- (4) 有病赶快寻医生。头痛是发热的表示，赶快试验温度表（寒暑表），看看有无热度。
- (5) 两脚走路觉得吃力时，赶快请医生验看，怕是脚气病。脚气病是学堂里常有的，最可怕，最危险。

(6) 学校饮食里的滋养料不够,故每日早起须吃麦精一匙。可试用麦精代替糖浆,涂在面包上吃吃看。

这几条都是很要紧的,千万不要忘记。

你寄信给我们,也须编号数,用一本簿子记上,如下式:

家信 苏州第一号 0 月 00 日寄

苏州第二号 0 月 00 日寄

你收的家信,也记在簿上:

爸爸 苏州第一号 八月廿七日收

爸爸 苏州第二号 0 月 00 日收

妈妈 第三号 0 月 00 日收

儿子,不要忘记我们,我们不会忘记你。努力做一个好孩子。

爸爸 十八年八月廿六夜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21 册。

致 周 作 人*

启明兄:

谢谢你的长信。更谢谢你的厚意。

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因为怕“搬穷”,我此刻的经济状况,真禁不起再搬家了。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因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

前几天百年兄来邀我回北京去，正是上海市党部二次决议要严办我的议案发表的一天，我请他看，说明此时不愿回去的理由，他也能谅解。俟将来局面稍稍安定，我大概总还是回来的。

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的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染。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溃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

近来因为一班朋友的劝告——大致和你的忠告相同——我也有悔意，很想发愤理故业。如果能如尊论所料，“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了。但事实上也许不能如此乐观，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那就更糟了。但我一定时时翻读你的来信，常记着 Rabelais[拉伯雷]的名言，也许免得下油锅的危险。

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你的“老朽”之感，我也很有同情。向来自负少年，以为十年著一部书，算不得迟缓。去年去赴任公的大敛，忽然堕泪，深觉人生只有这几个十年，不可不趁精力未衰时做点能做而又爱做的事。这一学年，已决计谢绝一切酬应及一切教课，专力把《哲学史》做起来。秋后北来，或可报告一点成绩。

匆匆即祝珍重，并问

各位老朋友安好。

适 十八,九,四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致 任 鸿 隽^{**}

叔永兄：

我看了沧白先生的信，很感谢他的指教。这个问题，诚如你说的，有两个要点须先决定：第一是“此瓶是否康熙瓶？”第二是，“瓶上画的是否《红楼梦》的故事？”沧白先生已力辨此瓶是康熙瓶无疑；我和你都是外行，只能承认他的判断。但第二点实尚可讨论。“金钗十二”并不始于《红楼梦》，此瓶既无题咏，何能骤定为《红楼梦》中之十二金钗？

沧白先生似未见我前年发现脂砚斋钞本《石头记》以后所作文字。他也未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沧白先生误信程伟元序，以为《石头记》早已有全本。脂砚斋与雪芹很亲密，批本中明说“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又明说雪芹死于壬午除夕。

(1929 年)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9 册。

致张元济*

菊生先生：

承赠高大立《绩溪杂感诗》，感谢之至。此书五六年前，我曾得一本，但远不如此本之精印。此中诸诗颇能写实，饶有历史价值。原注六，“七八都西接大会山，土沃民勤，稍称繁庶。”八都即是敝族所在，诗中所写新岭，即是我们家门口所望见的岭。诗中说，“宣、歙多商贾，独怜此间民所恃惟稼穡，地狭苦粟少，人满堪心恻，”可见其时绩溪人尚不重商业。近百年来，亦多经商者，家有二子，必送一子出门习商。高君诗所记，“俗更好为僧”，今日也没有此俗了。

胡适道谢 十九，一，廿六

汪氏注语太略，其实音韵不须注，而地理风俗不可不注也。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书信集》上册。

致 白 薇*

白薇女士：

你四月十三日的信颇使我失望。我对于你的四条质问，答复如下：

（一）学校不希望有教授私人“激迫”其他教授辞职的事。私人的激迫，即有其事，也决无效。但以我所知，你的辞职是时时提出的；四月六日一品香席后，你已说辞职，丁、凌诸君都坚留你，后来我知道了，也劝丁、凌诸君留你，在此次以前，你也辞过许多次。也许侃如信你辞职是真为了现代书局的事，故他屡次留你的。此次不曾坚决留你则有之；若说侃如夫妇“激迫”你辞职，则未免太离奇了。

（二）教授不应“用授课时间，造谣毁坏其他教授的名誉”。但上星期学校已经坚决挽留你之后，你却用上课时间对学生说你如何受“激迫”而要辞职。学生代表来对我说你在课堂上说的事，我听了真如读一部离奇小说。无论此事有无（这是另一问题），至少是你先在授课时间说一件关于两个教授名誉的事。这一点我认为大错。如真有此事，你应该对学校负责任的人说，不应该先煽动学生，以至于学生开会几乎决议要请学校赶走两个教授（这是学生代表姚残石君对我和丁先生说的）。你已诉之于学生了，却不许被诉的人有一个答辩的机会，这也不算平允。

(三) 陆先生对学生说的什么话,我还未得到学生代表正式报告。现在我知道的只有(1)学生代表说你报告陆先生怎样“激迫”你辞职的事,(2)丁先生报告你对他说的话,(3)你报告陆先生“真该地杀天诛”的话,(4)陆先生绝对否认有激迫你的事,并且正式来信说,无论怎样误会,“我(他)是始终希望她(你)教下去的”。

(四) 我的前信并不是“讲和”,只是报告我听了学生代表的报告的时候对于此事的观察和我对于中国文学一门的主张。我极希望我的朋友同事都能从黑暗中出来,做光明的人。

最后我要说一句我个人的信仰。我常说:“做学问要于无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若不如此,必致视朋友为仇讎,视世界为荆天棘地。你以为如何?

胡 适 十九,四,十四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杨 杏 佛^{**}

杏佛兄:

昨日孑民先生交来吾兄手示,谢谢。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

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问，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报纸记载讲演，非有训练，每多谬误；我也常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故决不会因此介意于你。

适 十九，四，三十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夏 蕴 兰*

蕴兰女士：

谢谢你的信。

你问的问题都是很大的，我无法回答。如“人格的修养”岂是一封短信所能解答的？如“学术的选择”也不是别人所能代答，大要需以“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章实斋语）为选

择的标准。但“性之所近”也不易发现，当先充分发展各种兴趣。如向不习科学者，当多学科学，然后可知究竟性情是否近于科学。“力之所能勉”，也不是指眼前的能力，当充分培养自己的能力；今日所不能，明年也许能够做了。故人在青年时代，当尽力做“增加求学的能力”和“发展向来不曾发现的兴趣”两项工作。能力增加了，兴趣博大浓厚了，再加上良好习惯的养成，这便是人格的养成，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进境而已。你信上似乎轻视英文的工课，这是错的。我劝你借这机会努力学一种外国文，要学到看书作文全有乐无苦的境界。这便是打开一条求知识学问的生路。故纸堆里翻觔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应该走的。

胡 适 十九，九，廿六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胡 汉 民^{**}

展堂先生：

在十一月廿二日的上海《民国日报》上，我见着先生在立法院纪念周的讲演，题目是《谈所谓言论自由》。其中有一段说：

最近见到中国有一位切求自由的所谓哲学博士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一篇长长的论文，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不是中国急切的要求。……在他个人无论是想借此取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和荣宠，或发

挥他“遇见溥仪称皇上”的自由，然而影响所及，究竟又如何呢？此其居心之险恶，行为之卑劣，真可以“不与共中国”了。

这一段文字很象是暗指着我说的。我知道先生自己不会看《泰晤士报》，必定有人对先生这样说。我盼望先生请这个人指出我在那一天的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过何种长长的文章或短短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居心险恶，行为卑劣”的话。倘蒙这个人把原来的报纸剪下寄给我看看，我格外感谢。

我本月廿八日搭津浦快车搬家到北平居住，倘蒙先生赐答，请寄北平后门内米粮库四号。匆匆过南京，不能入城一谈，甚怅怅。

胡 适 十九，十一，廿五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兄：

你可考倒我了。我这几年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春秋》的性质的问题，所以对于你的质问，我几乎要交白卷。但你的信却使我不能不想这个问题，想想的结果，略如下云，写出请你指教。

第一，孟轲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我

想，“其文则史”一句似乎是说，以文字体裁而论，《春秋》是一部史，与别国的史正是“一也”。试看齐国史官记“崔杼弑其君”，晋国史官记“赵盾弑其君”，其文字体裁正与《春秋》相同。况且“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一句，从文法上严格说来，应译作，“至于这里面的意义，可是我偷了他们的了。”旧注以“窃取”为谦辞，我却不肯放过这句话。我以为董狐、齐史，都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威权已经成立了，故孔子自认窃取史官“书法”的意义，而建立正名的思想。

第二，所谓“孔子作《春秋》”者，至多不过是说，孔子始开私家学者作历史的风气。创业不易，故孔子的《春秋》（即使不全是今所传本）也不见得比“断烂朝报”高明多少。但私家可以记史事，确有可以使跋扈权臣担忧之处。故有“乱臣贼子惧”的话。此事正不须有什么“微言大义”，只要敢说老实话，敢记真实事，便可使人注意（惧）了。今之烂污报馆，尚且有高官贵人肯出大捧银子去收买，何况那位有点傻气的孔二先生呢？我的英国朋友佗音比（Arnold Toynbec）每年编一册《国际关系调查》，颇能据事直书。这几年中，每年都有列国外交当局对他的记事表示很关切的注意。这便是“惧”字的“今谊”了。（崔浩修史的故事更可借来印证。）

第三，孔门的后人不能继续孔子以私家学者作史的遗风，却去向那部比断烂朝报高明不多的《春秋》里寻求他老人家的微言大义。于是越钻越有可怪的议论发现。其实都是象禅宗和尚说的“某甲只将花插香炉上，是和尚自疑别有什么事。”（作《左氏春秋》的那位先生似是例外。）

第四，我们在今日无法可以证实或否证今本《春秋》是孔

子作的；也不能证明此书是否荀子一派人作的。因为简短，故颇象“断烂”；其实我们看惯了殷虚卜辞更见了董狐、齐史所记，似可以假定今本《春秋》不是晚出的书，也许真是孔子仿古史书法而作的。我从前（《哲学史》一〇三）曾疑《春秋》有“后来被权门干涉，方才改了的。”现在看来，在那种时代，私家记载不能不有所忌讳，也是很平常的事。即使胡适之、钱玄同在今日秉笔作国史，能真正铁面不避忌吗？

毛子水兄恰好在我家中，见了你的原书和我的答书的前半，他写出了三条意见，如下：

（1）《春秋》的底子可以是孔子以前史官所记录的。

（a）书法是可有的事。

（b）断烂朝报的性质是古初的著作体裁使然，详细的必是口传而非文字。

（2）孔子可以得到这样的纪录，并且利用他。

（3）孔子也许公布古代史官的纪录，并接续记载当时的事。

子水的意见和我相差不远。

以上所说，不知能算是交卷了吗？

谢谢你为我的生日费了那么多的工夫写那篇长文。裱成时，还要请你签字盖章，使千百年后人可以省去考证的工夫。

适 之 十九，十二，廿

* 本函最初见于《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

致 吴 晗^{*}

春晗同学：

我记得你，并且知道你的工作。

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很高兴。

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见我的《文存》三集页六三〇），但我的根据还很少，不过是一个假定而已。今得你寻出吴之器所作传，考定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五十二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

但你信上在万历三十年下注“一五六二”是大错。不知何以有此误。此年是一六〇二。生年应是一五五一。

你的分段也甚好，写定时我很想看看。星期有暇请来谈。罗尔纲君住我家中。

胡 适 一九三一，五，六

^{*} 本函最初见于1980年8月（台湾）《传记文学》第三十七卷第二期《从胡适与吴晗来往函件中看他们的师生关系》（汤晏著）。

致翁文灏、张子高*

咏霓、子高两兄：

清华今年取了的转学之中，有一个吴春晗，是中国公学转来的，他是一个很有成绩的学生，中国旧文史的根柢很好。他有几种研究，都很可观，今年他在燕大图书馆做工，自己编成《胡应麟年谱》一部，功力判断都不弱。此人家境甚贫，本想半工半读，但他在清华无熟人，恐难急切得工作的机会。所以我写这信恳求两兄特别留意此人，给他一个工读的机会，他若没有工作的机会，就不能入学了。我劝他决定入学，并许他代求两兄帮忙。此事倘蒙

两兄大力相助，我真感激不尽。附上他的《胡应麟年谱》一册，或可觐他的学力。稿请便中仍赐还。匆匆奉求，即乞便中示复为感。

弟胡适 二十，八，十九

他的稿本可否请
史学系
清华中国文学系的教授一阅？也许他们用得着这样的人
作“助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1984年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

复 吴 晗*

春晗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高兴。蒋(廷黻)、张(子高)诸公之厚意最可感谢，甚盼你见他们时为我道谢。

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所能整理，可让成熟的学者去工作。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

晚代历史，材料较多，初看去似甚难，其实较易整理，因为处处脚踏实地，但肯勤劳，自然有功。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以训练方法。

你问的几项，大致可以解答如下：

① 应先细细点读《明史》；同时读《明史纪事本末》一遍或两遍，《实录》可在读《明史》后用来对勘，此是初步工作。于史传中之重要人的姓名、字、号、籍贯、谥法，随笔记出，列一表备查，将来读文集杂记等书便不感觉困难。读文集中之碑传，亦须用此法。

② 满洲未入关以前的历史，有人专门研究，可先看孟森(心史)《清开国史》(商务)一类的书。你此时暂不必关心。此是另一专门之学。谢国桢君有此时期史料考，已由北平图书

馆出版。(孟心史现在北大。)

③ 已读得一代史之后,可以试作“专题研究”之小论文(Mono graphs),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

④ 札记最有用。逐条必须注明卷册页数,引用时可以复检。许多好“专题研究”,皆是札记的结果。

⑤ 明代外人记载尚少,但如“倭寇问题”,西洋通商问题,南洋问题,耶稣会教士东来问题,皆有日本及西洋著述,可资参考。蒋廷黻先生必能指导你,我是全外行。

以上匆匆答复定不能满意。

胡 适 二十,九,十二

请你记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你不要误会蒋先生劝告的意思。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

致周作人**

启明兄:

谢谢你的信。

王维做梵志体,可见梵志时代确很早,又可见他的影响很

大。今天遍检《四部丛刊》，只不见《右丞集》，稍暇当寻出这两首诗看看。

说到“没落”，我更一日千丈。十九那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翻开寅恪要我题的唐景崧（他的夫人的祖父）遗墨，见那位台湾民主国伯里玺天德说什么“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我也写了一首律诗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胡适之做律诗，没落可想！

胡 适 廿九，廿六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凌 叔 华^{*}

昨始知你送在徽音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

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

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音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

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我知道你能谅解我的直言的用意，所以不会怪我。祝你好。

廿，十二，廿八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沈 从 文**

从文兄：

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如果你认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匆匆,问

双安

适 之 廿三,三,十三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吴 奔 星*

吴先生:

此种问题,你若没有新证据,最好不要参加。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韩君所说,文理都不通,其中所举事实也不近情理。如说:

“我(转蓬)有一篇文章先拿给从文修改,改了狠多,而发表出来则变了何家槐的名字。”

谁“拿给从文”呢?谁“发表”呢?难道从文帮家槐“偷”吗?又如:“也有先投给《现代》和《新月》的文章,写着是我的名字,而既经拿回来,在另外杂志上发表,又变了名。”这又是谁“拿回来”,谁“在另外杂志上发表”呢?

你若要“烛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访案”的工夫。若随口乱说，诬蔑阮元，张之洞，丁福保诸人，你自己就犯了“道听途说”的毛病，那配“烛照奸邪”？

胡 适 廿三，三，十三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雍 剑 秋**

剑秋先生：

承先生把大著《革心篇》寄给我看，要我表示一点意见。我匆匆看了，觉得先生之志是很可佩服的，但先生的论理却大有可商量之处。天并不曾将世界交与人掌管，这掌管世界的权利是人（聪明才智的人）自己用两只手一个脑袋奋斗出来的。天理也只是聪明才智的人从经验里寻出来的一些行为的规矩，并不是上帝诏示人们的。

先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好人。我觉得先生教人节制情欲，节省精力，尽可以从生理卫生的常识上去立论，大可不必从那些神学或玄学的大前提上去求根据。神学与玄学的立场，上不能使识者心服，下不能使一般民众了解，徒然引起无谓的论争而已。若从生理卫生与经济生活上劝人做一点最低限度的“人的生活”，则一切争论都可以避免了，大家都可以站在常识上同做一点生活改善的工作。生活改善是可能的，革

心是很渺茫的。鄙意如此，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胡 适 廿三，三，廿八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 钱 玄 同*

玄同兄：

谢谢你那封值得装裱的信。

那个“外”字，怕是吴君的笔误，大概送出去的原稿是没有的。尊见两点极是，将来若收入《文存》，一定要依尊论改正，或将尊函附在后面。

前日有短信与杨遇夫先生，附呈抄稿，不知所说有大误否？此稿请阅后赐还为感。

孙蜀丞先生所藏庄徵君集，有续编，为李莼客所未见，《金陵丛书》本也无有。我总观全集，可证成三事：

(1) 此公与《儒林外史》的关系。

(2) 此公的确知道“吾乡戴东原”，可证我前几年的假设不误。

(3) 此公虽不敢公然“以颜李之书示人”，虽不免留情传注诗文，稍背颜李之学风，然而他的确还是一个颜李学信徒。续编中有《与袁蕙纘书》，最可表现他的心事。

前拟作长文写此三事，匆匆只写了一小半，不知何日能成。写成后当呈教。

我常觉得吴敬梓也是颜李学信徒，《儒林外史》是颜李学的一部宣传品。绵庄之后，戴子高之前，文木先生应占一个不低的位置。你看此意如何？

续编中有关于沈琼枝的事，也有迟衡山，也有那位因藏禁书被捕的卢信侯。

适 之 廿三，四，十八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 梁 实 秋^{**}

实秋兄：

我有一个要紧问题想请你答我。

北大文学院现在又要我回去，我也想费一年工夫来整顿一番，最苦的是一时不容易寻得相当的帮忙的人。我常想到你，但我不愿拆山大的台，不愿叫太侔为难。现在山大已入安定状态了，你能不能离开山大，来北大做一个外国文学系的研究教授？研究教授月薪五百元，教课六点钟，待遇方面总算过得去，但我所希望者是希望你和朱光潜君一班兼通中西文学的人能在北大养成一个健全的文学中心。最好是你们都要在中国文学系担任一点功课。

北大旧人中，如周岂明先生和我，这几年都有点放弃文学运动的事业了，若能有你来做一个生力军的中心，逐渐为中国计划文学的改进，逐渐吸收一些人才，我想我们这几个老朽也许还有可以返老还童的希望，也许还可以跟着你们做一点摇旗呐喊的“新生活”。

你有意思来吗？请你回我一信。

适 之 廿三，四，廿六

* * 本函最初见于《看云集》（梁实秋著），1984年8月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致 郑 中 田*

君禾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信。

我劝你不要把你的职业看作“市廛俗气坑”。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职业，同时也应该有一个业余的嗜好。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是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但业余的嗜好的高下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发展。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赌博，他就是一个无益的人。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读书，或是学画，或是做慈善事业，或是研究无线电，或是学算学，……他也许可以发展他的天才，把他自己造成一个更有用的人。等到他的业余有了成绩，他的业余就可以变成

他的主要职业了。

如果你能把你的职业不仅仅当做吃饭的苦工,如果你把他看作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你就不会嫌他俗气可厌了。你若有文学天才,你一定可以从那个“俗气坑”里发现许多小说材料。你若肯多读书,你一定可以设法改良他,发展他。

我从来没有福气用一个“随从”,所以我不能请你来。因为你的好意可感,所以我写这封很诚恳的信劝告你。

如果你在你的职业里没有长进,你跟着我也不会有长进。

胡 适 廿三,五,二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陈 企 霞**

企霞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给《独立》,我很感激。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 unreal(不真实)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

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适 之 廿三,九,十一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黄 秋 岳*

秋岳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摭忆》稿子。

周春的笔记弁首,所谈《红楼梦》故事,无甚价值。他不知道曹家的历史,故说林如海是曹棟亭;他又不知道雪芹不是曹棟亭之子,乃是其孙子。此等猜想,实无根据。我的三篇考证,对于此书是曹雪芹自写其家故事一点,似已无问题。周松霭所记,有一点可助我的版本考据。他说:

乾隆庚戌秋,……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荅贾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

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记

此一段有误记,也有对的地方。一百二十回本是北京活字本,其书初出在乾隆辛亥,是为程伟元排本第一本;次年壬子,始有校改重排活字本,是为程伟元第二本。周氏记中说乾隆庚戌已有一百二十回钞本,似不足信。雁隅所得,当是八十回钞

本，与百廿回活字本。其时当在辛亥，周氏误记为庚戌。壬子冬，吴中贾人所开雕，系据程氏第一本，其中错误皆沿此本。程氏第二本校改凡二万余字，但吴中刻本已风行，此第二本就湮没不为人所注意。至近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始用我的藏本排印，于是人间始有“程乙本”的《红楼梦》。

周氏甲寅所得刻本，乃是南方刻本，未见北京活字本，故误认壬子吴中刻本为最早刻本，所以误记雁隅所得百廿回本为钞本了。

胡适上 廿四，五，五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陶希圣**

希圣兄：

连日心绪太恶劣，忘了把《独立》早寄给你，乞恕疏忽之罪。

此次我借用尊文作例子，实无丝毫恶意，至多只有“春秋责备贤者”之微意，因余人实不足引征也。

领导一国的思想，是百年大计，必须以哀矜之态度出之，不可稍存草率。自误是小事，误人误国都是大罪。思想必须从力求明白清楚(Clear and distinct)入手，笛卡儿所以能开近世哲学的先路，正因为他教人力求清楚明白。从洛克以至杜

威、詹姆士，都教人如此。我们承两千年的笼统思想习惯之后，若想思想革新，也必须从这条路入手。此意我怀抱已久，七年前写“名教”一文，即拟继续鼓吹此意，终以人事匆匆，不能如愿。上月读你答我之文——《否认现在的中国》——我深感觉你受病太深，而处此浇薄之社会，中，绝少诤友肯为你医病解缚。因此，我忍不住作《思想弊病》一文，略指此种方法的缺陷。

六三之夜，已快天明了，三点已敲过，我细读你新答我之文，仍觉你迷误未醒，意气甚盛，故又略答几句。

你此次来信有“将来如发见自己的确是错的，也不避承认”之语，我很感动。此在今日，是一种奇迹，非可望之于人人。此时你气尚未平，未必能如此觉悟。但我极盼望你能暂时抛开那一套。试想为什么动物学者把鱼狗人都叫做“脊椎动物”而人无异词，为什么你把清末新政混称为“来一个资本主义”而不能得人的承认，为什么你把骈文古文叫做“封建主义”而使我抗议。这一个“公案”想通了，你还可望有“桶底脱”的一日。禅宗大师所谓“桶底脱也”即是奇迹的来临也。

此次尊文甚多不检点之处，如云“西洋文化等于科学，中国文化等于小脚，建设中国文化就是裹小脚”，你在何处曾见我如此说过？

今夜百忙中又来晓舌，罪过，罪过。但平日实相敬爱，不思终日自外，终望得宽宥也。

适 之 二十四，六，十夜二时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2册。

致陶希圣*

希圣兄：

今天得手书，十分感动。十几天之中，我很感受刺激，头发白了许多，今天得来信，可说是近日的最大安慰。

民族抬头，我岂不想？来信所说的吾辈负的教育责任，我岂不明白？但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依古人的说法，修辞立其诚，未有不诚而能使人信从的。如来书说的，“自责”在学术界是应当的，但在教育上则又不应当“自责”而应当自吹：这是一个两面标准(double standard)，我不能认为最妥当的办法。至少我的训练使我不能接受这样一个两面标准。

我不信这样违心的“教育”手段能使这个民族抬头。我们今日所以不能抬头，当然是因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忏悔，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拔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朱子说的：“知道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真是我们今日应该深刻思想的。若妄自夸大，本无可夸而偏要违心的自夸，那岂不是讳疾而忌医的笨法子吗？结果只能使这个民族格外抬不起头来，也许永永抬不起头来。

一个民族的思想领袖者没有承认事实的勇气，而公然提倡他们自己良心上或“学术”上不信仰的假话，——即此一端，至少使我个人抬不起头来看世界。

“只有真理可以使你自由”(Only the truth can make you free)，这是西洋人常说的话。我也可以说：只有真话可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大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

我并不否认文化在过去确有“国界”。小脚、八股、骈文、律诗等等，是全世界人类所无而为吾国所独有。“国界”之义不过如此，其余礼义廉耻云云，绝无“国界”可言，乃是文明人所共有，乃是一切宗教典籍所共有。而我们的礼义廉耻等等所以特别不发达者，其原因也正是由于祖宗的罪孽太深重了。

请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

这个问题比思想方法的问题有同样的重要。这是一个思想家立身行己的人格问题：说真话乎？不说真话乎？

因你提出此双重标准，故我诚恳的写此长信。说话仍有过火之处，千万请你原谅。

匆匆问安。

适 之 二十四，六，十二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

致 陈 英 斌*

英斌先生：

我真对不住你，到今天才能回你的信。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不懂得日本最近的留学情形，我怕不能对于你的问题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是反对留学的，也不反对青年人出国留学。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只要你认定你的使命是求学，你就可以明白求学是愈早愈好，愈年青愈有成就的希望。“和本国文化离开”也无大害处，因为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空气，是福不是祸。

既要求学，必须要埋头先学那求学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必须要将语言文字学到十分纯熟的地步。

其次，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若在庆应，就应该研究庆应六十年的历史，并应该研究创办人的人格。若在早稻田，就应该研究大隈的传记。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們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国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

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拚命模仿人家。

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益处。

胡 适 廿四，七，廿四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任 访 秋^{**}

访秋先生：

谢谢你寄赠两篇文字。

《论文学中思想与形式关系》，太芜杂了，多有未成熟的见解。此种太大的题目，千万不可轻作。即如严又陵先生所受民主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影响与我有何区别？又如我们同时人中同具某种思想而文体大不相同者甚多，你又如何解释？

论词一文，使我很感觉兴趣。静庵先生的《人间词话》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见过此书。他晚年和我住的相近，见面时颇多，但他从未提起此书。今读你的比较研究，我很觉得我们的见解确有一些相同之点，所以我很高兴。

但你的比较，太着重相同之点，其实静庵先生的见解与我的不很相同。我的看法是历史的，他的看法是艺术的，我们分时期的不同在此。

他的“境界”说，也不很清楚。如他的定义，境界只是真实的内容而已。我所谓“意境”只是一个作家对于题材的见解

(看法)。我称它为“意境”，显然着重在作者个人的看法。你的解释，完全错了。我把“意境”与“情感”等并举，是要人明白“意境”不是“情感”等，而是作家对于某种情感或某种景物作怎样的观察，取怎样的态度，抓住了那一点，从那一种观点出发。

《花间》时期的词，除韦庄外，意境都不高。李后主远在《花间集》(广政十年)之后了。他的意境之高当是由于天才和晚年的遭遇。但自《花间集》到东坡，绝大多数的词仍是为歌者作的，故意境终不能高超。韦庄与后主只是这个时代的杰出天才而已。

静庵先生说的“隔与不隔”，其实也说不清楚。我平常说“意境”，只是“深入而浅出”五个字。观察要深刻，见解要深刻，而表现要浅近明白。凡静庵先生所谓“隔”，只是不能浅出而已。

因读你的文章，偶然写此信，或可供参考。

胡 适 廿四，七，廿六

* * 本函录自《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十九册。

致 陈 博 生*

博生先生：

近来报纸上时常发现有抄袭别人的文字送到报馆骗钱

的。但昨今两日(七月廿九,卅)《北晨艺圃》内发表署名“履道”的一篇《蒲松龄死年辨》,则尤为荒谬诈欺的怪例。我不能不责备编辑先生太疏忽了,竟使这种冒充考证的诈欺文字得占贵报两天的篇幅!

这篇文字是指名驳我的,所以我要求先生把我这封信登在《艺圃》栏内。

“履道”的文字,谬误百出,错谬尚可恕,捏造证据而诈欺取财,是不可恕的。

先指出一个最荒谬的诈欺行为。此文冒充要驳正我的“辨伪举例”的蒲松龄死时七十六岁之说,他要证明“八十六岁”之说。但此文中说:

蒲松龄既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为八十六年。

先生,这位投稿的“履道”未免太瞧不起贵报编辑先生和读者们的历史常识了!崇祯十三年(西历一六四〇)到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可不是恰恰七十六岁吗?那里来的八十六呢?编辑室里也许没有中西合历的年表可查,但崇祯只有十七年,减去十三年,还有四年(中国习惯算五岁),加上顺治十八年(元年即崇祯十七年),再加上康熙五十四年,

$$5 + 17 + 54 = 76$$

是不是七十六岁呢?这是中学生应有的近代历史常识。“履道”先生简直是欺编辑先生和读者连这点常识也没有,所以他大胆来骗贵报的稿费了!

此外的诈欺行为,最大的是:

(1) 他捏造出淄川汤望撰的《蒲松龄先生墓表》的名目。何以知其捏造呢？因为他引了此文末段七十七个字，而这七十七字全是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之文。“汤望”之名是捏造的。

(2) 他捏造出一部“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树堂板”的《聊斋文集》的名目。我敢断言天地间没有这部书。聊斋志异小说是乾隆三十一年始有刻本的。他的文集到近年始有排印本。

(3) 他捏造出一部《严西仲淄川蒲松龄先生年谱》的名目。因为他“引”此谱的文句都是捏造的。

(4) 他捏造出一部《恩荣轩蒲松龄别集》的名目，因为他“引”所谓《别集》的诗题都是石印本《聊斋诗集》里的诗，都在我已证明全属伪造的二百六十二首歪诗之内。

(5) 他又捏造出一部“清代詹纯甫所著之聊斋外集”的名目，因为天下没有人能“著”一部聊斋外集！

最后，我可以报告，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至今还在淄川，全碑完整。我已得着两份拓本，碑文中正作“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七十六”。八十六岁是错的，现在已毫无可疑了。

胡适 廿四，七，卅

再启者：我的《辨伪举例》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篇考证学的小品文字。最初登在《新月》第四卷一号，现在已不易得；后来改题为《蒲松龄的生年考》，收在亚东图书馆本《醒世姻缘》的附录里。今送呈一册。此文最可作初学

考证者的教科书读。贵报登此诈欺文字,毁坏我的考证名誉,可否重登我此文,以赎此失察之罪?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 陈 博 生^{**}

博生先生:

闲人先生肯把我寄与先生的信登出,并自己认错,我当时很佩服他的服善改过的态度。但这几天,他又登出“履道”的答辩长文,我看了真有点替贵报难为情,也替闲人先生难为情。因为“文责自负”四字是不能完全为主编的人脱卸责任的。

我本不屑和这种自己声明“要大胆的再诈欺胡先生一下”的人辩论,不过我要向先生指出几点常识:

第一,我原信问:蒲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是不是七十六岁?“履道”文中不答此问,他究竟“答辩”的是什么?

第二,我原信指出那位诈欺的履道捏造了五件假文件的名目:

- ① 淄川汤望撰的蒲松龄先生墓表。
- ② 乾隆二十八年仲夏二树堂板的聊斋文集。
- ③ 严西仲的淄川蒲松龄先生年谱。

④ 恩荣轩蒲松龄别集。

⑤ 詹纯甫“所著”之聊斋外集。

我正式指出这五项文件是没有的，这五项名目是捏造的。他此次“答辩”文虽冗长，所举证据又无一件不是捏造的。试举一例，他从石印本聊斋文集里抄出了张元的蒲先生墓表，却无耻的骗人说他是从《张元文集》中录出的！要证明这种下流的诈欺行为，是很容易的。我把张元的墓表拓本送给先生看看。履道所引墓表，凡删节之处，讹误之处，无一不与石印本聊斋文集相同。如开首“其别号也”之下，删去三十九字，与石印本同；又碑文之末删去墓铭全文，凡廿四字，也与石印本同。他的抄本有“终一节无少间”一句，文义不通，也与石印本同，碑文实作“始终一节无少间”。他抄的墓表中又有这么一句：

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

单这一句就可以完全证明他的诈欺了。碑上此句是：

少年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郢中诗社。

国学扶轮社本聊斋集附录墓表中此句误脱了“诸先生”三个字，于是妄改为

及余从伯父历友，旋结为郢中诗社。

石印本的编者高明多了，他认得张历友是山东诗人，所以把“友”字改回去，把“视”字妄改为“亲”字，成为：

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郢中诗社。

履道所据即是此石印妄改本，他又妄删去“亲”字，就更不

通了。

其实“历友”与“视旋”都是人名，历友是张笃庆，视旋是张履庆，他们的诗都收在山左诗抄里。这一句的误改，我在别处（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早已指出过了，可惜履道不曾得读，所以仍旧抄袭误本，不打自招，替自己留下诈欺的铁证！

试再举一个最可恶的例子。我原信说“汤望”是捏造的。履道“答辨”中引“国朝文征卷二十八，孙文定公（玮）所作汤望墓志云”：

公字益川，淄川人。崇祯辛未贡生。顺治丙戌官河津知县。
……乾隆二年九月十一日戌时卒，年九十四。

先生，我请你看看这一个小学算题：崇祯辛未当西历一六三一。就算他一出娘胎就作贡生罢，到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他已活了一百零六年了！若算他二十岁作贡生，他应该活了一百二十六岁了！哈哈！好福气！怎么又减成九十四岁了？

请问，登载这样荒谬文字的编辑先生未免难逃有意庇护诈欺者的嫌疑吧？难道他真相信有一位“孙文定公”作了这样荒唐的算术吗？

汤望如此，再看看严西仲。履道又引他新捏造的《国朝文征卷五十七》云：

“严西仲，顺治丁亥进士。”

顺治丁亥是西历一六四七。算他三十岁中进士罢，到蒲松龄死时（康熙五十四年），他已是九十七岁的人了，他还能替蒲松龄作年谱吗？

我敢断言，履道所提出的五项文件，加上此次答辨文中所

举《张元文集》、《孙文定公的汤望墓表》、《蠡勺亭集》内的《严西仲传》等等，都是天地间绝不会有的，都是信口开河捏造的。

我想闲人先生登载这种绝无常识的诈欺文字，至少难逃两次失察之罪，至少应该罚俸两个月。我要求先生把我这封信登在贵报上。

胡 适 廿四，八，十七夜

墓表拓本阅后若不能影照，乞即赐还。此碑每行脚下有四字埋在土中，故每行缺四字。我已托淄川路大荒先生将碑脚积土挖开，另拓有全本。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

致 汤 尔 和*

尔和先生：

送还六、七、八年的日记，并致深厚的谢意。八年日记，细细读过，曾摘记几十条重要日期的主要事项，想先生见许。

六、七二年日记，不及细读，但略翻阅而已。六年记复辟前后的政治，甚有趣味。

先生日记之有恒，真令我五体投地的佩服！每日读书有记，治事有记，而凡十年不断，是真不易得的！

前所欲查的一个日子，乃是八年三月廿六夜，先生记在次

日(廿七)。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子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可惜先生不曾详记,但有月日可考,亦是史料了。

先生试读四月十一日记末行,可知在当时独秀与先生都知三月廿六夜之会之意义。

八年五四之后,留蔡之事,先生用力最勤,而梦麟兄之来北大尤为先生第一大功。倘梦兄不北来,他也许要被任之兄一班人毁了。故梦兄北来之举,先生实大有造于他,亦大有功于北大。八年年底“发现”之役一变而为“去傅”之运动,闹成长期的教职员罢课,尊记有详细记载,也可供史料。

十二月十五日之罢课,我曾于十三夜独力反对,及今思之,我仍深信先生与夷初诸人造孽不浅也。

读八月三十一日尊记整理旧日记时之感想,我十分同情,论人如此,论事想亦不能免此种今昔之感也。

敬谢先生许我偷窥宝藏之厚意,敬祝
新年安好

胡适敬上 廿四,十二,廿二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周作人*

岂明兄：

谢谢你的规箴良言，我真说不出怎样感谢你。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朋旧雕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

王介甫有一首白话诗，我最爱诵：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
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我对于无理解之青年，时时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脱之心，毫无嗔渠之念。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

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蓍荐，使人寝处其上，洩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

痴迷不悟吧？

我多管闲事，是最妨碍我“讲学论学”的，吾兄劝我专门讲学论学，这一方面是我最应该忏悔的。以后倘能做到来信所谓“少管”，而多注意于学术，也许可以多做出一点成绩来，减少一点罪过。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前日和诗末句，“关门尚学仙”，已改为“萧闲似散仙”，似较切近。

此信不是强辩，只是要表明一种“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确当，但没有他种名词比这更确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

吾兄的挽联甚好，我也看见《宇宙风》中你们两人同举罗素赞闲之书，甚为注意。在君遗嘱不发讣开吊，棺不得过百元，坟地不得过半亩，葬于身死之地域内。遗嘱去年所立，我是证人之一，至今读之，泫然神伤。

在君曾有寿高梦旦六十一联，甚佳：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王岛避暑，邀我去玩，他有游北戴河怀我的诗两首：

记得当年来此山，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鬓毛斑未斑。

后来我去住了几天，别时他用元微之赠白香山诗原韵作二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鬚。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我回北平后，也和此二诗云：

乱世偷闲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艰难。

高谈低唱听涛坐，六七年来无此欢。

无多余勇堪浮海，应有仙方可黑鬚。

别后至今将七日，灵丹添得几丸无？

（在君有“赤脚大仙”之号，我们同赤脚走沙上，见狗矢，他戏指是仙人留下灵丹，服之可登仙！）

此种友朋儿戏，及今思之，何可复得！

送上《近著》一册，乞教正。

匆匆敬问
大安

适 之 廿五,一,九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

咏霓、廷黻、景超三兄：

今早经农送来一篇记在君在湘情形的文字，中有衡山纪游的诗四首，其一首题为《麻姑桥晚眺》：

红黄树草争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此诗似是在君自寓其出处之怀抱，我读之因想起宋人杨万里的一首诗：

初疑夜雨忽朝晴，知是山泉终夜明〔鸣〕。
流到前溪无一语，在山作得许多声！

我想吴达诠别号“前溪”，大概是用此诗之意。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季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 educate the chief

〔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行政院的两处应该变成一个“幕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莫令杨诚斋笑人也。

适 之 廿五，一，廿六

达詮说，他生于湖州的前溪，故有此号，我的揣测错了。适之 廿五，一，廿九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叶 英*

叶英先生：

谢谢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写的很好，但你误信了科举时代的是做人与做事双方兼顾的。我毫不迟疑的对你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论学近著》的第四卷，特别是我给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读过《儒林外史》没有？那是中国教育史的最好史料。你想，范进，周进，严贡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过京戏“红鸾禧”没有？一个丐头的女婿，一旦中了进

士,立刻就有人来“投靠”,岂不是很有趣的社会组织?然而你看这位进士老爷受的教育是不是够他做事做人?

你说起书院时代的山长的责任心,这更是误会。书院的山长,院中人每月只公见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过是看看书院课艺而已。有时候,山长完全可以不到书院,只看看课艺。

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大。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的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中国的家庭环境太坏,所以一般人对于学校教育责望过大。你也是其中之一人。这个责望,平心而论,也有点理由。第一是学校的教师的平均智识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许父兄不能教的,教师可以教罢?第二,学生入学校的年龄,还在可善可恶的弹性时期(formative),家庭养成坏习惯,也许学校可以改革罢?

这两层都不错,不幸中国今日的学校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设备。中学的宿舍,大学的宿舍,都没有做到英国学校的宿舍生活,——少数教会学校有了一个起点,——所以除了传授一点知识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无从下手。课堂的生活当然是知识技能的生活居绝大部分。课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训练。凡游戏,社交,开会,竞赛,选举,自治,互助,旅行,做团体生活,……等等,才是训练做人的机会。

中国今日之多数教员,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受过这种做人生活的训练,他们自己开个会就往往要闹到吵架而散,游戏是不会的居多,团体生活是没有的,能埋头做学问已是了不得的

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论，新式教育虽然还很幼稚，究竟比旧式教育宽广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旧教育多的多了。上文所举的游戏，社交，自治，团体生活等等，都是旧日学堂书院所无，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学校也未尝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训练。只可惜教员能挑起这种责任的人还不多，更可惜中小学太坏，学生在小学中学没有受过良好的团体生活的训练，到了大学，不但不能学做人，往往还不肯受教员的指导。他们觉得受中年人指导是可耻的！

我对于你的重视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为你误信旧教育的好处，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险，也许还有点“复古”的潜意识，所以我写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给你发表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不再寄文章来。

胡适之 廿五，三，廿一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吴 健 雄**

健雄女士：

昨夜在马宅相见，颇出意外，使我十分高兴。

今日下午船竟不开，晚间得消息，似此次罢工也许要延长

扩大；同行旅客有赶往 Vancouver 改乘 Canadian 汽船回国的，我则九十二日劳顿之余，颇感疲乏，行李又有一部分已上胡佛船了，故决定留此等待两三天再说。

此次在海外见着你，知道抱着很大的求学决心，我很高兴。昨夜我们乱谈的话，其中实有经验之谈，值得留意。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

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我不是要引诱你“改行”回到文史路上来；我是要你做一个博学的人。前几天，我在 Pasadena 见着 Dr. Robert A. (原误作 M.) Milhkan。他带我去参观各种研究室，他在 Geretics 研究室中指示室中各种工作，也“如数家珍”，使我心里赞叹。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国内科学界的几个老的领袖，如丁在君、翁咏霓，都是博览的人，故他们的领袖地位不限于地质学一门。后起的科学家都往往不能有此渊博，恐只能守成规，而不能创业拓地。

以此相期许，你不笑我多管闲事吗？匆匆祝你平安。

胡 适 一九三六，十，三十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册。

致 苏 雪 林*

雪林女士：

谢谢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长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检出细读。

你自称疏懒，却有此豪兴，有此热诚，可佩之至。关于《独评》，你的过奖，真使我愧汗。我们在此狂潮之中，略尽心力，只如鸚鵡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而救焚之事业实在不曾做到。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治疗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做，——奈何！奈何！

此事当时时放在心上，当与一班朋友细细谈谈，也许能做到更积极一点。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能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的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

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日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的满城风雨，像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这个方法也有功效，因为是以逸待劳。我在一九三零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 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 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

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信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些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俚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我回家已几日了，匆匆写此信，中间又因张学良叛国事，心绪很乱，时写时停，定多不贯串，请你莫见笑。匆匆问好。

胡 适 廿五，十二，十四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周作人*

知堂兄：

得手示及《思痛记》及《病榻梦痕录》两部，多谢多谢！

《思痛记》久思一读，今晚当读了。

我的《梦痕录》果是最早刻本，其中“宁”字皆不缺笔（光绪十二年本也不缺笔；余本皆缺笔），字画工整也为诸本所不及，如“病”字皆刻作“病”，“严”字皆刻作“嚴”。乾隆五十一年邵二云赠序第三行“余读唐律，疏傅议予，比于仁慈”，“傅”字各本皆作“傳”，唯此本及尊藏道光六年本作“傅”不误。

此本小像极佳，比道光六年本还更有神采。其他各本翻刻小像更差了。

此本有一处不如道光六年本。卷下页六十七（两本页数同）《归庐落成》诗“群山俨拱揖”的“拱”字，道光本不误，各本皆作“供”，此本亦作“供”，其字不写作“供”，与全书字式异，与下句“供咀吞”“供”字之字式亦异，显系此字初印后即有损坏，曾经挖补而误刻作“供”的。

道光六年刻本是根据最初刻的初印本重雕的，虽然字体已稍改换，而行款全依原刻，故版本为后翻诸本所不及。小像与像赞翻的最工。卷下附章实斋一跋，《录余》中曾提及（嘉庆十年），大概龙庄生前即有附此跋之刻本了。匆匆草此奉报，

书三种稍迟奉还。

适 之 廿六，一，十二夜

道光六年本刻工不甚一致，似字画细者为原版，字画粗者为补版。

《思痛记》一气看完了。

我的家乡遭洪杨之劫最惨。先父自记年谱中说，乱前族中修祠修谱，点得人口六千人；乱中祠堂被焚，先父领头重建，募捐时细查劫余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死的凡百分之八十！不独吾族如此，徽州各族记载往往相印证。

我们的大问题是人命不值钱。因为不值钱，故人命可以视同草芥粪土，视同儿戏。我们家乡常有妇女为了三个小钱的“破片”（碎布片）而起口角，因而上吊自杀的。旧小说《恒言》中有一文钱杀十五条人命的故事，我每劝人多读。嗜杀性似是兽性的一部分，生活进步之国乃有不忍杀一无辜人之说，更进步则并罪人亦不忍杀了。今日所谓禁烟新法令，吸毒者枪毙，正可反映此人命不值钱的文化。西洋人可以实行“禁止虐待禽兽”的运动，我们现时还够不上谈“禁止虐待同胞”的运动，奈何！

《病榻梦痕录》记乾隆五十一年灾象，记载甚动人，其三诗亦甚佳。此是太平盛时，人命贱至如此，何况大乱之世乎？罗思举自传中记白莲教之乱，其屠杀之惨亦可上比明末，下比洪杨。其中记一日军中缺粮，则屠杀俘匪三千余人，烹煮作粮。此亦是十九世纪初元的事，其时汪龙庄尚在人间也。

总之，人命太贱，可作牛马用，当然可供烹吃；可供淫乐，亦当然可以屠杀为乐。一切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到此都成废话。仅存汪龙庄、李小池所谓因果报应一点点维系，似亦不很有效验。救济之道只有工业与社会主义〔义〕双管齐下，或可有较大进境罢。

适 之 廿六，一，十三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孙 伏 园**

伏园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我今天下午从南方回来，才看见他们。

我把这篇文稿送还给你，决不是嫌这文不好，是因为文里提起的晶晶、郁南两文都不在《独立》发表，你引用的原文太少，读者一定摸不着头脑，故不如让此文登在《潇湘涟漪》上，更亲切一点。你一定不会怪我。

要表明你不怪我，你得再寄一篇文字给《独立》！承赠《潇湘》十三册，已检得晶晶的《给父亲》读了。这文确是很能动人。郁南似是中公的学生，《东方》偶不在手头，故不曾检读。

祭文是可以废的，因为没有“祭如在”的心境，祭文决做不

好。晶晶的《给父亲》，虽然可说是祭文的变体，其实是一个新时代的儿子的追忆，其中有传记式的描写，旧式的祭文决装不进去。我的愚见以为此文若完全作追忆式，也许更好，更动人。其中有一部分颇不免《祭十二郎文》一类古文的影响，现代人读去总觉得有点不自然。你以为如何？

胡 适 廿六，五，九

我写的《高梦旦小传》（今年《东方》第一期），你看见没有？上月我用此传，加入事实，删去原文一部分，改成一千字的墓碑，将来写定后要寄给你看看。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致 江 冬 秀^{*}

冬秀：

你十月十三夜的信收到了。

泽涵的信也收到了。

祖望我想明年夏天带他出来，叫他进一个好的大学，可以安心读书。

你的身体要保重。泽涵说你时常心跳，我很不放心。

我读你信上说：“但愿你给我信上的一句话，‘我一定回到学术生活上去’，我恨自己不能帮你助一点力，害你走上这条

路上去的。”我将来要做到这一句话。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上政治路上去，这是你的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来不作这样想，所以我们能一同过苦日子。所以我给新六信上说，我颇愧对老妻，这是真心的话。

我现在过的日子，也是苦日子。身体上的辛苦，精神上的痛苦，都不是好过的。

我到此已五十日，没有领到一个钱的薪俸。全馆十余人，还须我垫借钱应用。

我每天总是很忙的，晚上睡觉总是很晚的。睡觉总是睡半边床，因为二十年的习惯，从来不会睡在床当中。

我不怕吃苦，只希望于国家有一点点益处。头发两边花白了，现在当中也白了不少。

我这回没有向国内调用一个人，只向国外调了两个人来。

你信说的殷先生，不姓殷，是姓应。同应小姐同姓。部里把他调到中美洲去了。他的太太是五十三岁的人，带着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留在此地。我因住的大屋，无女人照应，很不方便。所以我请应太太一家住在三楼，我同两个同事住在二楼。应太太照应家事，饭食好的多了。我们三个男人初来时，雇了一个广东厨子，我们都不会照管，十分不方便。现在有一位女管家，比较方便一点。

这房子明年六月满租，以后我想不要住这大屋，搬到旅馆或“大楼”去住，就可以不用人管家了。有些“大楼”可以租几间房，可以自己开伙食，但有许多事不用自己照管。有些大旅

馆也可以如此常租(上海也有这种“大厦”,如华安楼上)。请客可以不用自己招呼。

今天第一天大雪,下午下起,现在已有一尺多厚了。

我自己要写信给孟邻,请他照应祖望。美国学校的事,泽涵可以给他打算。

最要紧的是你自己不要着急,不要急出病来。

祝你平安。

駉 十一月廿四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江冬秀**

冬秀:

我真对不住你,这许多时都没有信给你。我因为写信费力,故每月打电报给你,报告我的消息。(我在医院每天只许坐起很短的时候,所以我总不得写信的工夫。)

我二月二十日出医院,当天就回华盛顿来了。昨天满三星期,才把看护送回去。这三星期中,我每天只见一个客,只看一点钟的公事,下午吃了午饭总睡一点多钟,晚上十点半就上床。身体很好了。现在我不穿衣服,有一百三十八磅重,颈脖子壮了,去年的领子都不能戴了。

医生许我喝葡萄酒,许我看书,只不许我做三件事:

- (1)不许爬楼梯,
- (2)不许吸纸烟,
- (3)不许出门演说。

今天是整整一百天了。(我是十二月四夜起的。)医生说我还要休息,总要过了六个月(到六月四日),才可以照常工作。

我上回偷写的信上,不敢对你详细,怕你着急。我现在可以对你说一个大概。

我十二月四日到纽约,晚上演说完后,我觉得胸口作痛。回到旅馆,我吐了几口,都是夜饭吃的甜东西。我想是“不消化”。叫了一壶热茶来喝了,就睡了。

睡下之后,胸口的痛觉得好了一点,但总觉得胸口不舒服。每闭着眼,就出大汗。汗出了一夜,睡衣都湿了。

第二天(五日)早晨,我把上午的约会都辞掉了,睡到十一点才起来。觉得好多了,我出去到一处午餐,饭后又演说了半点钟。

回到旅馆,医生来了,我请他诊看。他说我昨夜胸口痛是心脏的一茎血管受伤,关闭住了,起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重要的病。我还不相信。医生打电话去请了专家来,带了仪器来,做了一个心脏状况图,我才相信了。(我那天的血压低到八十多度。)

几个中外朋友都来了。大家商量,请了两个心脏专家来会同诊看,决定请李维大夫(Dr. Robert L. Levy)专管我的病。当时就不许我起床,就叫医院送车子来,把我抬进医院去了(那是十二月五夜九点多钟)。住医院七十七天,全是静养。到医院的第二天,我有一点发烧,血压更低下去一点。第五夜

以后,就没有烧了。自从第一夜之后,我胸口就不作痛了。起初日夜用两个看护,到第八个星期,我才用一个看护。现在到第十五个星期,可以说是全好了。但我现在还得要静养,养好了,还可以作工二三十年。

以上说的病状,你若看不明白,可以请李刚大夫看看。他一定可以讲给你听。

你信上说,小三功课有进步,我很高兴。他好久没写信给我了。

我托顾临先生(Mr. Greene)带两张照相给你们,一张给你,一张给小三。

匆匆祝你们都好。

请代问丁太太、徐太太、慰慈、孟录——诸人好。

适 之 廿八年三月十四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胡 思 杜*

小三:

今夜“火星”(Mars)特别光亮,红的像红鲫鱼。再过四夜,七月廿七夜,是十五年中火星同地球最接近的一夜,所以全世界的天文家和爱看星的人们,这几天都特别准备看那一夜的火星。

我今夜也在外边看火星，很想着你，所以写这封信给你。
你这几天看火星了吗？

我盼望你好好的用功，也许我明年能接你出来上学。要用功学英文英语。要保重身体。

藏 晖 廿八，七，廿三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江 冬 秀**

冬秀：

我昨晚出门，今早到西来球斯大学。此地离康南儿大学只有两点钟，但我怕不能去看儿子了。因为康南儿的熟人师友太多，我去那边，看这个，不看那个，是容易引起误会的。一会儿，儿子要打电话来。

你今年五十，我也四十九了。可惜我不能在家里给你祝寿。我今天是客中的客中，在一个旅馆里写信给你，我心里当然有无限的感慨。

我们徽州人有句俗话，说，“一世夫妻三年〔半〕”。我们结婚二十二年，中间虽有远别离的期间，总算是团聚的时候多，别离的时候少。

这一次别离，已有两年另四个月，要算是最长久的分离

了。我心里常想念你，常常觉得老年夫妻不应该如此长久分离。但我现在实在没有法子，一时脱不得身。《琵琶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我此次出门，既不为利，更不为名，只为国家有危急，我被征调出来，不能不忍起心肠，抛家别友，来做两三年的孤家寡人。

为什么我不叫你出来呢？第一，你不懂话，此间没有几个中国家庭，你若在此，未免太寂寞，未免太苦。第二，你不在此，我可以免去许多应酬；有太太在此，你出去应酬罢，语言上实在太不方便，是叫你受罪；你不出去应酬罢，又实在太不像样。（有太太在此，若不出去应酬，就像我把她关起来，不许她自由一样，所以不像样。）第三，我本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担负，可以自由来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是一句名言。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要是走了，我就得想法子去到什么用金子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路上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现在要想从国内寄美金给儿子留学，是万万不可能的。）

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我不叫你出来。

我要你明白这些情形，心里也许好过一点。

上两次信上说，我寄美金给你。但因为儿子开学用钱多，我又替大春垫了七百元，故一时没有钱汇回去。现在大春的款子办好了，我不久即可寄钱给你。

十月廿二日，我到纽约，请我的医生验身体。他有三个多月没见我了，他验了我的心脏，用“爱克司”光照看心部。他说，我的身体完全复原了。这句话使我很高兴。

这信是在西来球斯旅馆中写的,祝你福寿康强。

适 之 廿八,十一,十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胡 思 杜*

小三:

我刚写信给妈妈,说,我颇想叫你到昆明去上学。你心上有何意见?我此时不能叫你来美国,因为一来我没有钱,二来我要减轻身上的累赘,使我随时可以辞职。

你是有心学社会科学的,我看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全比清华、北大好。所以我劝你今年夏天早早去昆明,跟着舅舅,预备考清华、北大。上海的大学太差,你应该明白。学社会科学的人,应该到内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实况。你二十年不曾离开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点。你今年二十了(十八岁半)。应该决心脱离妈妈,去尝尝独立自治的生活。你敢去吗?你把意见告诉妈妈。决定之后,不宜迟疑,望早早作预备。

爸爸 廿九,三,廿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答 关 仲 豪*

仲豪兄：

你为这一个“半部论语”的故事，遍找他的娘家，还老远的写信来问我：这真不愧是北大的学风，使我十分高兴。

今天我不曾去国会图书馆，不知他们有无李焘的书。但我查北平新印的《琬琰集删存》，里面有太宗亲撰的“赵普神道碑”，也没有这个故事。碑文有云：

王(赵普追封真定王)性本俊迈，幼不好学。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按；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既博达于今古，尤雅善于谈谐。马伏波词辩分明，杜征南手不释卷。……

即此一段可证“半部论语”故事是不可靠的。那个故事的文字很像是笔记小说的文字，如其中说他死后“家人发篋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最像小说。

神道碑文是“同时人的证据”，最可信用。

大概宋初政治制度多是因袭的，没有什么政治思想可说。到“古文运动”复兴，柳开、石介、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诸公继续起来，才有政治思想，才有庆历的变法和熙宁的变法。明白了这一点，赵普的故事在你的研究题上就没有地位了。

匆匆敬祝

安好，并问

马教授和雷兴教授的安。

胡 适 三十,三,三十一

* 本函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

致 江 冬 秀^{**}

第四号

端姊：

这封信也许是“第三号”；如果你没有收到“第三号”，就是我记错了。二月，三月，我差不多常在外面旅行，所以没有多写信给你。

你的“第四号”信收到了。谢谢你。

陈聘丞先生带来的笔、墨、图章，也收到了。王兆熙太太的衣服已寄去了。

你的四号信上，好像说我怪你“用费大了”。我从来不曾怪你，怕是你误会了罢？

竹先生说我应该把小三叫来。祖望也说，你有信来，要我带小三出来。我现在托施太尔先生汇上美金五百元，你可问竹先生取。若有便人，请你把小三托他带出来。若有定船的困难，可托叶良才先生去托美国总领事馆，也许他们可以向船公司设法。

我曾细细想过小三的问题。我从前所以不敢叫两个孩子

都出来，正是因为我要减轻家累，可以随时要走就走。古人说，“无官一身轻”。我要倒过来说，“一身轻才可以无官”。现在祖望还有一年半，可以毕业；假使我现在走了，我还可以给他留下一年半的学费用费。小三来了，至少有四年，我要走开，就得先替他筹画一笔学费用费，那就不容易办了，就得设法子去卖文章，或卖讲演，替儿子筹备一点美金。所以我去年不敢叫他出来。

现在你们都说小三在上海的环境不好，我才决定叫他出来。我从现在起，要替他储蓄一笔学费。凡我在外面讲演或卖文字收入的钱，都存在这个储蓄户头，作为小儿子求学的费用。

我想把小三送进一个中部的大学，让他从第一年读起。他若肯用功，加上三个暑假学校，也可以三年半毕业了。中部的生活程度比东部低些，用费可以节省一点。

小三出来，可以托叶先生，孙先生，竹先生，沈燕小姐先打听熟人出国，托他照应小三。护照等事，我想也完全托这〔几〕位朋友办理。

这一次我决定叫小三出来，我心里最难过的，还是你自己的事。我们俩，三年半不曾相会了。我也常常想你来。但你信上说的“你要是讨了一个有学问的太太，不就是天天同你在一块，照应帮助你吗”，这句话倒有点冤枉我了。我并不要讨个有学问的太太。我在这儿的生活，并不是很快活的生活。我三番五次想过请你来的问题，总觉得你来这里有种种困难。来的困难多，不来的困难少。根本的问题，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个大学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

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点回到大学教授的生活。你应该能明白我决不是爱干这种事的。我难道不想家庭团聚？我不叫你来，只是不要你来受罪。

“受罪”两个字，好像说的太过。但是这话并不是胡说。

你知道我做了二十年大学教授，第一，我不拜客；第二，我不回拜一个客；第三，我从来不请客。

现在我不能不拜客，也不能不回拜客，也不能不请客。上礼拜六，我下午六点出门，到了六处应酬，直到半夜后一点半才回家。回家看见儿子写的一张条子，说，他先去睡了，明早七点半要赶火车，要爸爸留点钱给他放在房门口。

我现在做的是“受罪”的事。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去就罢了；去了，我总要把全副精神摆出来，总不要叫人家看我的鬼脸，我总叫大家感觉我不是“受罪”，我总不要叫大家跟着我“受罪”。

就如同今天晚上，我这里大请客，穿的是大礼服，吃的是规矩菜，说的是应酬官话。到了客散，已是快十二点了。我送完了客，看见天上月亮正圆，想起今天是三月十四（阴历）。我拉了一位刘先生出去散步，走了二十分钟的山路，才回来写这信。回到家里，一身骨头都疲倦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受罪”还不顶苦。你若在这里，还是跟着我“受罪”呢？还是关在房里不出来应酬呢？这一次请客，同事们忙了整整五天（帖子是三月中出去的），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你若来了，你还是管呢？还是不管呢？

我向来不对你诉苦。今天写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这里过的并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

多年不愿意做的事。你若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明白我不请你出来的意思了。陈光甫太太出来了一年多，她从不出来应酬。她在纽约还可以寻几个中国女朋友玩玩，在家里可以抱外孙玩玩，在这里就更苦了。这里中国人少，又因为地位关系，我的太太在这里就不能谢绝应酬，出门必须坐首坐，在家必须做女主人，那就是天天受罪了。

所以我不能不希望早早回到我的穷书生的生活。到那时，我就可以和你一块回到那“三不主义”的自由生活了。

祝你健康。

四弟 卅年四月十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1册。

致 赵 元 任*

元任老兄：

谢谢你的信。

我匆匆出门，作七千英里的旅行，——他们叫做 Grand Circle Tour——动机是加拿大政府要我在 Vanconver 帮他们作一次 Victory Loan 的演说。但是我有近两年，没到西岸了，所以借此到西岸各大城去一遭，到了落衫矶，然后东归。

你的字典样本，我竟没能细读。只好等我回去时再回信了。

在这里我要请教你一件小事。我在二十年前曾翻译波斯诗人 Omar 的“绝句”一章，当时本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译文虽然有人爱读——因为文字通顺，音节响亮，——但是很不正确。原文是：

O love! Could You and I with Him conspire
To grasp this Sorry Scheme of Things entire,
Would We not shatter it to bits, and Then
Remould it nearer to the heart's desire!

我的旧译文是：

要是天公换了卿和我，
该把这糊涂(后改糟糕)(最后改寒伦)世界一齐
打破，
再团再炼再调和，
好依着你我的安排，
把这世界重新造过。

前些时，一天晚上睡不着，我把这首诗改翻了，开了电灯，记在一个本子上，才睡了。后来周鲠生看了这新译本，说是比旧译好得多了。我把这稿子抄给你看，请你不客气的修改，请你注意修改两个方面：一是白话的文法和“习惯”(idiom)，二是音节。还有第三方面，就是译文的正确程度。

倘使咱(们)俩能和老天爷打成了一气，
好教咱抓住了这整个儿天和地，
咱可不先要打破了这不成样子的东西，

再从头改造翻新，好教咱(?)真个称心如意!

这时候翻译“莪马”当然还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呵!

在改诗工作上，你府上还有韵卿和四位小姐，他们都能帮我改白话。

适 之 卅一，二，十七

因为写这首诗的第一句，我想起三百年前的一支地道的民歌，地道的老百姓的革命歌。这是我在一部清朝小说《豆棚闲话》里发现的，据说是明末流寇时代最流行的一支民歌。我现在抄给你，盼望你能给他作个曲谱：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老天爷你不会做天，
你塌了罢!

适 之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1962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致 傅 斯 年*

孟真兄：

二月六日长函，三月底才收到。

所需药第一种，得咏霓电后即已买，想已收到。此次药单，均已买寄，想亦已收到。

我竟不知老伯母去年十月去世，不胜哀念。她老人家待我和冬秀都很好，我们都没有能报答她。

她老人家辛苦一生，对老兄属望最大，所以今后吾兄更宜十分保重身体，以慰死者。一切纷纷扰扰，都不足置怀。得一个有用之身，为学术效劳，这是第一大事。

老兄病中读《老》，《庄》，未必是对症良药。我想老兄还是读读山东土产《论语》、《孟子》，想想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怨天，不尤人”的通达人情，近乎人情的风度，似乎比那似达观而实偏激的庄生，或更可以减低几十度血压。

这不是笑话，是我近年体念得来的一个感想。

孔子的伟大处正在平平无奇，却又实在近情近理。

近来读《孟子》，也觉得此公可爱。

中国两千多年的士大夫风度，其中比较积极，比较有作为的，都是受《论语》、《孟子》的好影响。

我在此实在无善状可告朋友。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这两句杜诗，时时在哼着。

千言万语，不如用我们徽州的一句俗话奉寄：

“徽州朝奉，自家保重。”

并问大綵、大缜、大维的好

适 之 May, 17, 1942

* 本函录自原件(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致王世杰、傅斯年等**

雪艇、孟真、端升

咏霓、枚荪、子纓诸兄：

我出国五年，最远因起于我写给雪艇的三封长信(廿四年六月)，尤其是第三封信(廿四，六，廿七)；次则廿六年八月尾蒋先生的敦促，雪艇的敦劝；但最后的原因是廿六年九月一夜在中英文化协会宿舍孟真的一哭。

孟真的一哭，我至今不曾忘记。五年中，负病工作，忍辱，任劳，都只是因为当日既已动一念头，决心要做到一点成绩，总要使这一万三千万人复认识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不但可与同患难，还可与同安乐。四年成绩，如斯而已。

当四年前我接受使命时，老妻冬秀曾写信来痛责我。我

对他说：我们徽州有句古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青山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今日所以能抬头见世人者，正是因为我们背上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在。我们做工，只是对这个国家，这青山，出一点汗而已。

今日之事，或为山妻所笑。但山妻之笑，抵不得孟真的一哭。我要诸兄知此心理，知我决不懊悔动此一念头。

我的使命已完全结束。今寄上“尾声”文件若干，以代报告：

1. 介公八月十五电
2. 答介公八月十五电
3. 外部八月十七日电
4. 答外部电(八月廿一日)
5. 美代外长私函(八月廿八日)
6. 美政府答覆征求同意函(九月一日)
7. 美外长回京后私函

右文件或可供诸兄一览。其最后三件，均为“破例”之文件，故亦附入。

我的计划是先往纽约受医生详细检验，然后决定何时归来。我在廿七年十二月四夜得心脏病，曾住医院七十七天。三年半以来，虽未曾复发，但医生不许我高飞，前年三月，今年二月，曾飞过八千尺，但医生甚虑我不能飞万尺以上。一年中体重减去十四磅，医生要我休息几个月，先把身体养好了，再作归计。九月十五日离美京，一星期内身体检查定可有报告。

有几个大学，纷纷邀我去教书，都已谢却，告以三五个月内不能考虑此事。实因急须绝对休养，并须绝对学做哑巴也。

此后诸兄信件，可由大使馆刘公使(Liu Chieh)收转。

匆匆敬问

诸兄健康。

弟适之 卅一，九，十

* * 本函录自原件(台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藏)。

致王重民*

有三兄：

昨寄一信，忘了提及《西游记》事。

前寄还子书兄单本《吴昌龄与西游记》，想已收到了。你说世德堂刻本《西游记》小说无陈光蕊与江流事，使我很感兴趣。杨景贤杂剧始有此二事，后人大概根据此剧加入的。

你说，除此加入一段外，世德堂本与我用的本子文字全同，这一点也使我很放心。当我劝亚东用此本标点时，我深信此本为现存各本中最好的本子。友朋中颇有人疑此本的描写细密传神之处是后来增修的，不是吴承恩的原文。我坚持用此本，力主书中描写传神之处皆是原文所有。但近年《西游》古本渐出，我竟无机细校，每以为憾。今得你的断语，使我放心多了。

承借《丛书书目》，十分有用。顷检此目 470 页有《汉魏遗书抄》，此书不记辑逸者姓名，不知是谁辑的，谁刻的。馆中若

有此书，亦极想借观。

顷得芝加哥大学回信，知光清兄的请愿书已通过了，闻之甚喜。但恐你们那一个“班子”未免更分散零落了。匆匆问安。

弟适之 卅二，三，卅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8册。

致王重民**

有三兄：

廿一日信收到了。

《名人传》的引言，今天打字了，今夜刚寄出，也许此时你已看见了。

校读此书，颇费时间；写此序前后约费两星期，但我得益颇多，故不以为辛苦。

此书我认为很好，可算是“国际学者合作的研究”(corporate research; co-operative research)的第一次大成功。我的意见与兄颇不同。此书编纂甚不易，主编者的编审工作尤困难。我仔细读过这六百巨页(上册)，始知这是绝大工作。题目的选定，我虽有不满意之处，——如程廷祚无传而程晋芳有传之类，——但全盘看来，此书所选八百人，大致是不错的，是很公道的。即令我有全权选三百年的八百篇传题，我的选择未必能比这八百题更公允。此一大好处也。

此书取材兼收中西记载，其中如李之藻、徐光启、瞿式耜诸传，洪秀全、洪仁玕诸传，奕訢（恭王）、耆善、荣禄、李鸿章、张荫桓诸传，都因为兼收外国材料与意见，故均可补旧记载之不足。此是二大长处。

近年吾国禁书颇出，传记研究亦颇有成绩，但均未有收集成书如此书之规模者。此书中凡有近人用功过之传记，如孟心史、丁在君、顾颉刚和我自己等人做过一番整理的，都一概采用新出材料。此是三大长处。

满洲、蒙古、西藏各族的人名，均用拼音作较细密的音读，此为吾国人向未做过的工作，是四大长处。

各传后所附参考书目，兼收中、西、日本文字，此于学者甚有益。此是五大长处。

主编及作传者为国际学人，见解比较客观，评论比较公平。（往日文字禁网，种族成见，固然可怕；但近年的翻案，洪、杨必是，曾、胡必非，亦甚非历史学之康衢也。）此是六大长处。

吾兄前有函说此书不曾做到“第一流传记”的目的，此是悬的过高，必致失望。《史记》、《汉书》、《后汉书》三部大书之中，有几篇传够得上“第一流传记”的尊号？（近年读《范书》最多，觉得一部《后汉书》中像《马援传》那样的文字，竟寻不出第二篇！）

这部“名人传”本来不打算做“第一流传记”，只是一部“三百年名人传记总谱”而已。看作三百年的中国名人辞典，在今日全世界无一书可比此书的完备而有用。十几万元美金，八九年的心血，五十个学人的合作，而能得此一书，是十分值得的。

故我序中对此书甚表诚意的赞许，不但希冀此类事业可以继起，其实是此书值得赞许也。（序文大意如上文所说。）

书中执笔诸人，大概以那位日本人 Hiromu Momose 为最不高明。余人以房兆楹兄为最努力，他和房太太，Kennedy，Goodrich、邓君（此人的原名为何？）所作诸传均大致很好。原意本有大家得训练的意思。用力最多最久诸人，如房君伉俪，其所得训练之益当亦最大，甚可羨也。

今晚附寄给恒先生勘误表一纸，其中有关于马国翰传的一长段，曾嘱恒先生与你相商，乞为订正。

我在序尾引兄函“只恒先生等四人便一共苦干了三十六年了”一语，想不见怪。

前去 Philadelphia，是为了赴一个会。思杜尚在学校，成绩很不佳。

在 Peinceton 两天，看了 Gest 书藏，也颇失望。原来听说此君注重佛经与医书，但匆匆看了，这两组都不算出色。佛经有南宋残本若干，元藏残本若干，明藏残本若干，西夏文佛经两册，如此而已。医书之中，《本草》似无一善本，《千金要方》亦无好本，《外台秘要》是日本延享三年（1764）翻明末（1640）的翻宋本，已为最善本了。我试索《医林改错》（王清任），亦只是翻刻的烂版。但 Gest 全部之中，明刻本颇不少。

大抵医书是应用的书，而学医者绝无讲究版刻之人，故善本颇少。协和医院的中文医书，当日似亦曾请北平图书馆中人估过。（其中主体出于一个藏书家。）今读来函，始知此五百种之中善本绝少，颇感失望。

但我仍望老兄不要太容易感觉失望。能聚集五百种中文

医书在一处，亦是一大事。肯出重价买医书，不是“大头”，实是大好事。你不记“求骏骨”的故事吗？医书所以不能多得古本善本者，都因为向来收藏家不注意此类书的版本，而习医者又往往以最新本“增广”最多者为最有用。（试看藏书大家有几人收医书？《本草》一书的增修历史，最可证我说。政和六年（1116）上去嘉祐六年（1061），不过五十五年，已须“新修”了；下去金泰和甲子（1204），不满九十年，又已须“重修”了。此如八股程文，天、崇时人不读成、宏时的名家八股，因为过时了，不适用了。）能有“大头”肯出重价收买医书古本精本，则三五年后古本精本必大出现，可无疑也。我在民国九年考证《水浒》，其时，《水浒》通行本只有金圣叹的七十一回本，藏书家亦不知收藏小说善本古本。此后十年之中，《水浒》的百回本，百廿回本，百十五回本等等相继出现，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肯出重价收买。重赏之下，古本自出了。

我记得有一天，鲁迅介绍一部百廿回本《水浒》，索价五十元。我不还价，就买了他。次日有朋友来说，“此书是齐某人在黑市上用两块钱买的，你受冤了！”我说，“不然。只要有人知道我肯花五十元买一部古本《水浒》，《水浒》和其他小说的古本就会跑出来了。”

我和马隅卿、孙子书诸人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只是用校勘考证的方法去读小说书。读小说要考证校勘，然后感觉古本精本的需要。否则石印的圣叹评本确是比百回古本方便的多多也！

读医书要用校勘考证的时候到来了，医书的古本善本自然会出现了。

闲话打住，回到 Princeton 的 Gest 书藏。此次我匆匆看了，允为作一简单报告，提出整理方法。此为东美四大书藏之一，值得整理一道。老兄愿意作整理之事，我十分高兴。乞暂勿告人。到成熟时，当见分晓。

匆匆敬问双安。

弟适之 卅二，五，廿五夜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 18 册。

致王重民*

有三兄：

关于通俗书的沿革演变，我很感兴趣。此等书影响全国儿童，最关重要。可惜我一向没机会作有条理的研究。

顷检 1940 的残日记，有一条记《神童诗》，说：

宋以后用《神童诗》来替代《王梵志》，也是大变化，由中古进入近世的一个表现也。

《神童诗》中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即是孔子“有教无类”的通俗说法。

《三字经》的开端一大段，是孔孟的“性”论的通俗说法。也是“有教无类”的平等观。

岂但司马光得靠陆状元的帮助？朱子的思想，孔子、孟子

的思想,都得靠通俗书的帮助。(涵芬楼旧藏有一部白话的《通鉴》,其名似是“直说通略”,源出于元末,其本刻于成化时。我的1921—1922的日记内有记载。此书或有他种刻本。)

但老兄用“深入民间”一语,颇嫌太重。陆状元、林尧叟都还不能“深入民间”。通俗书如《三国志演义》、《水浒》、《封神》、《西游》之类,才够得上“深入民间”的资格。白莲教、义和拳等等即是此等书的产物。

我在《答孟心史书》(《论学近著》519—523)里,曾指出吾国训育工具的六大缺陷,和西洋的育训工具的六长。(521—522)其中第三点即论此通俗文学。

敦煌的各种《变文》、《俗曲》,亦是通俗书的一部分。老兄试看《秦妇吟》、《王梵志》、《太公家教》、《相问书》等等,在佛寺附设的蒙馆里,占何等地位!此项童蒙手写本都是教育史料。老兄所见最多,望便中用“教育工具”的观点,写一专文,使人知道中古蒙馆里用的是什么教材。

初学入门的工具,“上大人,孔乙子”的“仿”,《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自宋以来,直到最近世,竟无大改动!此亦是一件教育史实。(小变改则有之,如《三字经》原文“十七史”一段,后世随时有修改;《百家姓》也有增改本;《童蒙诗》改本最多。)

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幼学琼林》等等,最近乎“高小”教材,似变迁较多于“初小”诸书。“高小”以上,其中一部分不变的是《孝经》、《论语》、《诗经》等等;一部分变的是《小学》(朱子)、《尔雅》,以及各时代的八股名家等等。

所谓受教育的阶级，其知识来源，如此而已！

适 之 卅二，五，卅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8册。

致王重民**

重民兄：

大札两封，及《易林考》，都收到了。

《白氏文集》伪诗，承检示《苕溪渔隐丛话》一则，足证此三诗来历已久。上下千年，论此三诗之伪者，三人之中，两人是绩溪胡氏，也可算是一段文字因缘！（《元和录》当是当时伪书之一。）

（白氏享大名，与明代李卓吾、徐文长、钟伯敬诸人相似，故《碎金》托于白氏，而集外恶诗托名者亦不少。《白集》与《刘梦得集》皆有自题，凡集中未收者皆为伪作。但后人托名，仍非此种自题所能禁止。）

此次在哈佛，为陆军兵官讲演了六次，又加了三次讨论，见客又颇多，故颇忙碌。

《易林新考》曾给杨联陞、周一良、张隆延诸君看过。他们都认我的考证可为此问题作一结案了。

在哈佛时，我曾检黄伯思《东观余论》，读其《易林序》，曾作一条笔记。杨君又代检《图书集成》的“卜筮纪事”部，检得

《续前定录》亦载崔群一条，与《因话录》全同，当是转录赵璘的。《四库提要》所称程迥记宣和、绍兴两占，亦见于《图书集成》此部，大概出于程迥的《周易古占法》。

承嫂夫人愿为代抄文稿，至感至感！下次来京，当带稿纸留存尊处。

承寄李莼客《晋书札记》，尚未收到。收到后定可得益不少。匆匆敬问
双安

适 之 卅二，十，十八早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8册。

致 刘 修 业^{*}

修业嫂：

前天寄一信，想已收到。今天另有点意见奉陈。关于《花草新编》的案子，我反对用“偷”字，确是有鉴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想到许多古人受诬的明训，故有戒心。

第一，是后人编集前人文集，往往不甚细心，往往贪多，不免有误收文件，而后来竟引起争端。如苏洵《嘉祐集》宋本无《辩奸论》，而后人把此论编入，是一例也。如段玉裁《经韵楼集》里误收东原的《记洞遇水》一篇，是二例也。如《直隶河渠书》，为方观承作碑传者都明说是他的书，而赵东潜的友人则

认为赵氏书，东原的友人则认为戴氏书。以今日我们所见，此书大概是方氏雇学者助纂的书，赵、戴都有分，而赵、戴都无意认为己书，但因为材料有用，故各留一本以备参考。不幸赵、戴死后，两家朋友妄起争论，挑起疑案，又影响到别的问题。若赵、戴死而有知，必不愿也。

第二，从陈耀文编刻大部分“类书”的能力看来，《四库提要》说《粹编》“与《天中记》版式相同，盖犹耀文旧刻”）他似是有财力可以雇请文人襄助编书的人。吴承恩、吴岫也许都是他平日送钱周济的文人朋友，他们先后帮他编一部词选，吴承恩先替他拟了一篇序，后来此书改定后，序也改了，书名也改了一个字。而邱震冈诸人编集时，把原拟的序收入，又不注明是代人作的，故三四百年后引起贤伉俪的考证。改定之要点似在“以世次为后先”一点。但《存稿》此序中“以大小差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二句，实不好懂。岂淮安吴氏所见原书体例略如后来的《白香词谱》、万红友《词律》之例，不依世次，但依短长为先后耶？若果如此，则后来改依世次为后先，是一大改动，亦是一大进步。此案情形，我猜想不过如此。《花间》、《草堂》都不是大书，明人习气好用新奇名字，故取《花草》之名。原名《新编》，后改《粹编》，似甚可能。无论如何，此种选本不值得“偷”，故“偷”字太严重。《四库全书提要》又说：“坊刻本卷首此序题作”，“延佑四年陈良弼序”，而“其文则仍耀文之语”！此则是坊贾之“偷”了！）陈氏刻书时自序特别提及“素友”二吴之名，其用意亦决非“偷”也。

总而言之，古人已死，不能起而对质，故我们若非有十分证据，决不可轻下刑事罪名的判断。“罪疑惟轻”，亦是此意。

贤夫妇想能同此意也。

关于尊稿的名字,前函说“评传”不如“传略”。我后来想了,或可称《吴承恩事迹交游考证》。此名重在“考证”,较可指出大作最用力气的主要点。你们以为如何?

此中“简谱”(不如改称“年谱”,因原无详谱,而尊作实系最详的年谱也。)部分,或尚可加详,把一切有关传记的材料,如《先府宾墓志》、《禹鼎志序》……之类,都摘出收入年谱。你看如何?

如《禹鼎志》序中说“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此最关紧要,最可以描写这个《西游记》作者幼年时所受民间俗文学的大影响,故不可不摘入传记部分。《先府宾墓志》、《射阳文存》作“宾”不误,尊稿作“先府君”,似当改作“宾”字?此文中的家庭史料,似亦当分载年谱中。

又“简谱”中每年之下似可加一句“先生约□岁”,使读者得一个约略的传记次序。你以为如何?

吴承恩的文集里很少佳文,故我只圈出他的《禹鼎志序》。你的评论偶有太热心的夸赞,这是作传记者对于“传主”应有的热心,很自然的。但平心而论,吴承恩很像蒲松龄,他们都作古文,又都曾试用古文作小说,又都最后用白话做小说而大成功。《禹鼎志》的诸篇,等于《聊斋志异》的古文小说,都属于这个“试验”时代。(诗集中的《二郎搜山图歌》,可与《禹鼎志》参看。)蒲氏先用古文作《江城》诸篇,次用套曲写《襁妒咒》剧本(《江城》)、最后才用白话小说写《醒世姻缘》长篇。若两公皆止于古文传奇小说,而不进一步作白话小说,则两公皆不能有不朽大成绩。故我论中国文学史,特别注重“文学的工具”

一个问题。工具不良，文学成绩亦必不大也。

我妄猜：《禹鼎志》的短篇，或其中一部分，将来也许能在晚明的各种文学丛刻里发见出来。匆匆写这信，以代面谈。现时还有许多事纠缠着，一时尚不知何日能来华府。敬问

双安

适 之 卅五，三，二日下午

* 本函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胡适致刘修业信》。

致 刘 修 业^{**}

修业嫂：

谢谢你的长信。

援庵先生的议论很公道，我很赞成。

你说的“分寸”，最是许多学者容易忽略的一点，所以我常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

有七分证据，只可说七分话，不可说八分话，更不可说十分话。

关于“以世次为后先，以短长为小大”，你的解释最明白。吴序不能表出“每调之下，以世次为先后”之意。陈序也不能表出“以短长为先后”之意。两本各有得失，似不能说是陈氏“没有明白吴氏原意”，因为吴氏原意并不难懂。全书以短长

为次序，开卷便可了了。故改序文时重在“每调之下，以世次为后先。”一个意思，而文字不够清楚。

《搜山图》是写二郎神搜山除妖的事，二郎神即灌口二郎，《西游记》把他当作玉帝的外甥，《封神榜》里把他当作玉鼎真人的弟子杨戩。两书里都有二郎神除梅山七怪的神话。这都是搜山除妖的故事的一部分。吴射阳《搜山图歌》里的清源公即是二郎。

明人有《二郎宝卷》，宣演二郎故事。

吴氏此歌里有“轩辕铸镜禹铸鼎”之句，可与《禹鼎志》题名参看。

二郎神的演变，我曾有意搜集材料，作一研究。但终不得暇作此事！如二郎本是灌口筑堤兴水利的李冰之子，本是一个“地方的神”，后来居然变为全国的大神。后来怎样成为杨戩呢？

我曾提一假设：宋时祀二郎神，必须撮土一块，此犹是灌口筑堤有功的神迹的遗痕。徽宗的诸佞臣之中，杨戩有刮地皮的本领，民间大概曾给他起绰号为“二郎神”，即指此撮土祀祭的遗风，后来就认二郎神姓杨名戩了！这个假设很好玩，可惜现在我全不记得我的根据了！

《先府宾墓志》似是故宫编者一时误改为“府君”。将来可查原刻本。

匆匆敬祝

双安

适之 卅五，三，七夜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致刘修业信》。

致 邓 世 华^{*}

世华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

我劝你不必悲观。

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所以烟囱不冒烟，机器上锈！

正因为今日的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步〔寸〕的改善。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你问的七个问题，我只答了你的(B)和(C)，也附带答了(D)。国家当然有救，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

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B),(C)

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美国是唯一的例外。)我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到伦敦赴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住在伦敦的第一等旅馆,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但人家的基础雄厚,人才众多,知识水准高,所以大家能谅解国家的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他们在苦战时期就准备和平到来后的苦日子,所以他们不悲观,只苦干。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但在这几年苦战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但英国人绝不悲观,他们自己知道从今以后只能做一个二等大国,他们只努力苦干,想在二十年中做到安全与康乐。

青年人苦闷都由于当年希望太大,所以今日必须明白和平比八年苦战困难的多,抗战时须吃苦努力,和平来了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希望。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D)

别的问题,都是枝节。

百忙中提笔写这信，因为我确是被你的信感动了，所以要你不要悲观。

胡 适 卅六，六，二，半夜

盼望你来谈谈。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致 陈 之 藩^{**}

之藩先生：

谢谢 你两次的长信。请你恕我没有正式回答你第一信。

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当时我很忙，就没有剪寄给你，——当初是在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

我很高兴读你半年来思想演变的经过。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颗虚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识思想进步的源头。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也许有人说，这是同“葡萄是酸的，我本来不想吃”一样。

关于你问我那几点，不一定我都能回答。只说几点罢：

(1) 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这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

我曾引戊戌维新人物王照先生说：“天下事那有捷径？”他曾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老康说，‘列强瓜分即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迄今三十二年，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我的《论学近著》一，四七〇）。此话至今又十八年了！戊戌至今五十年了！这话很像是代我答你了。

(2) 一切“恶连环”，当用齐国君王后的解法。她用铁椎一敲，连环自解了。从你能做的做起。

(3)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的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病与幼稚病一剂圣药。

(4) 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但那是冯友兰先生们不会了解的。

将来你来北平，盼望能来谈谈。

祝你好

胡 适 三十七，三，三

* * 本函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

致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谢谢你们寄赠的《哈佛丛书》两包，都收到了。一点没有损坏。到的第一天，我就抽出一本 Folk - lore and Fable 来看，看到半夜后才睡！可惜没有书架，书还不能上架。先寄信道谢！

……我上次写长信很明白的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送我原版的《四部丛刊》，因为我已有缩本的全部了。缩本只有四四〇册，最方便，最适用。（已占住一个大书架。）原版的《四部丛刊》有二千一百册，我这里绝对没有地方安放。一个书架此时已很不易得，何况二一〇〇册至少要四个或五个大书架？（若有书架，必须六七大架，怕还不够。）冬秀对于书架，绝对不感兴趣，他绝对不能帮我的忙。从种种方面想过，我只好再恳求你们把这部原版的《四部丛刊》留在你们的 Cragmont Ave. 家里，或寄给如兰，因为“行者街二七号”一定可以容得下。此是实在苦衷，千万请你们原谅。我现在的情形，很像一个 baby-sitter，困难万分。你们当日有许多年青学生帮忙，有四个小姐帮忙，所以你们可以布置一个大家庭。我是最怕人多的，最怕热闹的，最怕琐碎麻烦的。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小小 apartment 若要弄的洁净，必须我自己动手扫地，抹桌子，重洗玻璃杯，化冰箱的冰，洗客人留下烟头烟灰堆满的 ashtray。……

只有一位老太太，每星期二来做六点钟的工，但家中若没有人对于清洁有兴趣，有指示能力，用人当然要躲懒的。……因为这些情形，并不是我舍不得这部“名人手批的”报纸印的《四部丛刊》——我不能不恳求你们，把那二千一百本的大书收回，千万不可送来增添我无法解决的困难！千万请你们原谅！你们待我的好意，我完全领受，万分感激。

适 之 卅九，十，二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1962年台北文星书店出版。

致 黄 纯 青^{**}

纯青先生：

去年接到先生十一月八日的手书，提议要把先父铁花先生的《台湾日记》付印，作为《台湾文献委员会丛书》的第三种。此事当然同意；并且感谢先生与文献委员会诸公的好意。先人的日记，保存的共有十五年之多，从光绪七年到光绪二十一年。其中止有光绪十三年十月至十一月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一卷，曾由罗尔纲先生抄登《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一期。此次《台湾日记》在台印行。要算第二次刊布先人的日记了。

先生的好意，使我想起先父的《台湾稟启存稿》三册。这些公牍与私函都是割台之前三、四年中（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一年）最难得的史料。第一册的巡回全台防营随时申报文十余

件是最详细、最切实的全台游记与全台兵志！我费了几天工夫，把这些文件整理一遍，删去一些无关台事的短札；删存三卷，每卷编有详目。

我今托钱思亮先生把这三册带呈先生。如先生与文献委员会愿意抄写副本，留作省志材料，或印作丛书第几种，都悉由诸公尊裁，不必再征求我的同意了。抄写副本之后，请将原本交付钱思亮兄，由他代托妥人带回美国，十分感谢。

丛书印成后，请由我备价购买每种四十部，以便分送海外第一流图书馆，并留少数为留存家中之用。

又附上先父《家传》一册。抄写后也乞交付钱君寄回。此传或可附在《日记》之后？可以代序吗？匆匆敬祝大安！

弟胡适敬上 民国四十年一月二十一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

答 朱 文 长*

文长：

谢谢你六月十日的信和附寄的长文。

我劝你最好暂时不要发表这篇文字。因为这文字里有许多地方是很可以引起反感或误会的。

我是一个“存疑论者”，即是你说的“不可知论者”。但在中国思想传统里，Agnosticism & Atheism 都没有像基督教国

家里那种“罪大恶极”的贬义，故我有时也自称“无神论者”。其实我确是一个无神论者。

这点存疑的态度是中国思想传统里一点最有意义，也最有价值的怀疑精神，他的最明白的说法就是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是很影响我一生的一句话。）孔子的存疑态度见于《论语》子路问事鬼神一章。

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这寥寥几句话，在中国思想史发生了很大的作用。我看后来的哲人，如宋明的理学家，特别是二程与朱子，都很受这几句话的影响。

我的存疑论或无神论与铁幕内的“反宗教者”有一点根本不同，我觉得这个社会能容忍我的无神论自由发表，我应该报答以同样的容忍。我少年时也曾因为主张“破除迷信”，曾有很不容忍的议论。但廿五岁以后，我总努力克制自己，对自己的存疑态度虽绝不放松，而对他人的宗教信仰则总努力谅解、容忍。故当中国开始提倡反宗教的时期，我曾与周作人诸人发表一篇短宣言（此文现在已不可得了，不曾收入《文存》去，因原稿似是周作人拟的），表示我们不赞成这种不容忍的态度。

你在我家住过，也许知道我的 Collection of Bibles 在中国算是第二大收藏。北京圣经会百年(?)纪念时，我的英文演说现今有一长段收在“A Book in Thousand Tongues”里。

但我细读你的长文，颇感觉你的思考方法不细密，立论的态度也不够忠厚。不够支持(defend)你的信仰，也不够说服

他人的不信仰。

你说我的态度是：“你信上帝，很好。不过你如果要我信上帝，拿证据来！”这话大致不错。

但你举的证据都不是能站住的，只可供信仰者信仰，而不能叫不信者不疑。

你看了我的《言论集》，你说我非常推崇四福音。我并没有把“四福音”并作同等的史料或传记文学。手里没有《言论集》，但我记得，我明明说《约翰福音》是很晚出的书，不能比前三部福音。此三福音可以当作传记文学看，也可以当作宗教经典看，各依读者性情所近，都可以有所得。

你虽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我猜想你没有用你的史学方法来研究过这部《新约》，特别是这一百多年来西方基督教学人已很有成绩的“四福音问题”与“三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问题”。如果我的猜想不太错，我很盼望你在这方面用点功夫，试读牛津的 B. H. Streeter's “The Four Gospels”做起点，然后读 Harnach, Baur 诸人的书。必须研究过“三福音”的同异，然后可以明白“三福音”如何先后造成，那一部分是三书共同的，那一部分是马太独有的，那一部分是路加独有的。明白了这大致同源的“三福音”，然后可以明白“第四福音”是很晚出的，是另一环境，另一空气里的新作品，故其中的事迹与言论思想往往与前三福音相差异。

研究了“四福音”的同异，然后可以承认这些书与《使徒行传》等书的史料价值的等级差异。

传记文学有古今的不同，也有东西的不同。自传与他人作传也有大不同。我指出“三福音”是传记文学，并不含有“默

认了〔他们〕并非伪造”的意思，也没含有“好的传记文学必须是忠实的”的意思。例如《论语》，《檀弓》是孔子的传记材料，《孔子家语》也是孔子的传记材料，但前二书是很早出的，《家语》是几百年后的晚书。我儿童时爱读《家语》，同爱读《聊斋志异》差不多。但廿五岁以后就不信《家语》是史料了。

“三福音”里的耶稣言语，比较可以信为出于一种或两三种先后同时人的记载。其中所记事迹与“奇迹”，即使来源甚巨，大都须用批评的眼光去选择，不可以为出于圣典，即无可疑。

即如你看见的《胡适言论集》，确是同时人用速记方法记下来，后来又从速记符号改写出汉字来的。但我自己略略翻看，已觉得其中错误不可胜计。大概是：我有较详细的 note 交给记者的，大错就少些。我若没有详细的纲领给他们，——如《水经注》一篇，——就错到绝顶荒谬的地步！速记方法，——无论中西，——只能记音，而不能同时叫个个速记者都能懂得说的什么思想。从记音的符号改写成文字，往往连篇不成话了！

其实记音也不一定正确。例如你引的一段笑话，我说的是 Iddy，而记出的是艾培！

以上说的是要你不要忘了你生平学的史学方法，要多多用一点怀疑态度来评量圣典圣经。

例如你引的《约翰福音》第九章的用唾沫和泥使瞎子眼明的故事，你当然可以自己相信，但不能叫不信的人相信。我则劝你自己也要试多用一点怀疑。你受过史学训练，岂可以说：“耶稣将这些斩钉截铁的话载入纪录”——这是全无根据的

话。

多从来不“讥嘲”你所谓有“直觉”能同上帝发生直接关系的人，也从来不“讥嘲”你所谓“有答案的人”。但你自己这篇长文颇不免“讥嘲”我们这种没有宗教“直觉”，也没有“答案”的人。这里面的态度是不像你平日的忠厚，也不是我平日所自律的容忍。

你必须平心静气的明了世上自有一种人确不能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他们的不能不怀疑，正如某些人的不能不信仰一样，——一样是性情上的根本不同。

Wm. James 说的两种不同的性情，最有道理。某些科学家在实验室里已养成了“拿证据来”的习惯，所以能有点科学的成绩。但出了实验室，进了礼拜堂，在这一方面，他们没有那后天的严格训练，只有那自少至老的一套传统习惯，所以他们就不知不觉的（或自觉的）随顺那本来（先天）不能不信的性情了。

严格的训练可以挽回一点，补充一点，但根本还是一个性情上的不同，无从勉强。

但你说的有些话，确使我有点担忧。

你说，“灵魂的存在是事实，灵魂的归宿上帝也已经藉着圣经有了明白的指示。”这正是我说的你不能不信，我当然不能阻止你，也不愿意劝阻你。

我担忧的是你引用《启示录》、《希伯来书》一类的材料，毫无一点怀疑，使我忧虑你的史学方法训练太不严格，故毫无鉴别材料的眼光。

第二，我忧虑的是你的眼光太窄，心地太窄，不能明白世

上自有不能信任没有完全证据的东西的好人，故你忧虑这种没有同你一样信心的人就会“成为无希望的，痛苦的，投降的，以至于团团转的”！这种心理是很不忠厚的。你完全不能承认达尔文、赫胥黎一流人确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圣贤。

这种狭窄的心地是不容忍的根苗，故最可虑。

至于你批评生物进化论一长段，也表示你实在没有研究过这些科学问题，所以毫不明白这九十年来的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与组织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上的证据，都足以证实 evolutionism 的大假设。（试读几种关于 Evidence of Evolution 的书，或可以破除你的许多成见。）（这一种信纸完了，只能打住了。）

我劝你暂时不要发表此文，但我也很感谢你让我看看此文。我们相别太久了，有这机会长谈，是很难得的。

请你不要怪我太爽直的说话！

适 之 四二，六，十六夜半后一点

此信匆匆写了，匆匆寄出，不曾留稿。也没有工夫细细改过。将来便中请仍寄还我。

适 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第6册。

致 沈 怡*

君怡兄：

上个月承你寄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十二月七日 *N. Y. Times* 登出香港电，说平伯已被宣告“guilty” of propagating Dr. Hu Shih’s bourgeois idealism in his commentaries on the novel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又说：“The verdict had been reached after 8 meetings by the All-China Writers and Artists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writers’ League.”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匆匆道谢，并贺

贤伉俪新年大吉祥。

弟胡适

以后如有此类材料，仍乞赐寄，至感！

四三，十二，十七(六十三岁生日)

* 本函最初发表于1976年5月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

致 沈 怡^{**}

君怡兄：

收到你寄的剪报两批之后，曾有两信道谢。但都是寄 United Nations ECAFE，不知都得达否？

年底收到十二月七日的手书，多谢多谢。

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禱！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不能安睡，起床

取新译的 Chaucer's Canterbury Tales 读到天明才得小睡。

新年两天还没有出门，今天草此短信，敬贺新年，并致感谢。

适 之 一九五五，一，三

* * 本函最初发表于《传记文学》第 28 卷第 5 期《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

致 张 爱 玲*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

请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侏嗤侏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一三一——一三二页写那条棉被,如一七五,一八九页写的那件棉袄,那是很成功的。一八九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的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一六〇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二〇五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七六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二十五(旧历元旦后一日)

* 本函最初发表于1968年4月《皇冠》杂志第29卷第2期。

致 赵 元 任*

Dear Y. R.

谢谢你寄的 \$ 2,200, 早已收到了。

孟邻、月涵都已见到了？思亮想更早见到了。

月涵此行的 headache 不少。我劝他路过东京时去看看汤川(Yukawa)的研究所, 看看人家在穷苦困难中怎么做。

F. Chang 的消息, 使我放心一点。

Mixed Metaphors, 承你举例, 我有一点小意见。“唱走了嗓子”, 似是很好的例子。其余三例, 似可有商量之处:

(1) “结果”已成习语, “结果一点花也没开”, 句中用“结果”, 作者未必想到“果”的意思吧?

(2) “忽然闻见一股味儿”, “闻见”与“看见”“听见”同是一类老百姓的 word-formation, 他们“推类”的想法, 把“看见”作为“看得”, “闻见”也作为“闻得”了。“闻见”只是 smelled 或 smell。

(3) “我的脚动手麻了”, 似与“结果”同例, “动手”也是老官话, 用的人未必想到“手”的意思。

写到了这里, 才明白你举的四个例子都不错, 都是你说的“不一定管 internal structures & meanings of bound morphemes, 只有“闻见”, 不当写作“闻见”, 当作一个 bound word 看。比较“听见一声炮响”。

在一张 photostat 的共产党的杂志上见中共“国务院”六月九日任命：……陈新民为中南矿冶学院院长，顾凌申、黄培云为副院长。黄培云是否你们的姑爷？

近因注意“胡风事件”，看见这些句子：

(1) “这僵尸统治的文坛，我们咳一声嗽，也有人来录音审查。”(胡风信)

(2) “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一到这里面去，即酱在那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鲁迅一九三五年九月给胡风的信)

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

适 之 (十月二十三日)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

复 胡 光 麋**

光麋兄：

收到你十一月二十三日的长信，我很高兴。

尊事能如此解决，我在海外知道了很高兴。

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

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来，终不能实行此意。

尹君曾在府上会见，承他赠我《吕氏春秋》校记，至今未能道谢。倘相见时，乞代致意问候。

匆匆敬祝双安

弟胡适上 四四，十一，廿六

* * 本函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复赵元任*

元任兄：

谢谢你们的长途电话！

更谢谢今天看到的信！

你们的厚意，——Kerner, Boodberg, Mah, Schaper 诸位先生的厚意，使我十分感谢。你们太好了，我现在只好说“accept if invited for 1956-57”。

我这几年所以故意不教书，也不热心向人要教书讲演的机会，实在是因为一种避嫌的心理，一面是许多所谓“汉学”“支那学”家总有点怕我们打入他们的圈子里去，一面是这种人在政治上又往往是“前进”分子，气味也不合，所以我总有点神经过敏的感觉，觉得还是“敬而远之”为上策，切不可同他们抢饭吃。

你们几位此次的 conspiracy, 当然是给我一个大大的 Honor。但我盼望你们也不要勉强。

匆匆敬祝

你们一家都平安快乐!

适 之 一九五五, 十二, 十九下午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

致 杨 联 陞^{**}

杨公:

那天晚上我们谈的很畅快! 许多时没有这样快谈了! 只是累你回去太晚, 我很不安。

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注家皆无说。直到一千二百多年后, 胡三省始解为“因新都国以定号”。我在三十多年前就不信此说, 我在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North China Branch* 有英文“王莽”长文, 直译为“New”。我以为旧注家不解释“新”字, 是因为此字文义太明显, 故无注解之必要。况王莽事事要改制, 他是存心改革一切的, 故他“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与他改元“元始”, “初始”、“始建国”, 同一心理, 故更无注解的必要了。

“元后传”记, 莽使王舜向元后请传国玺, 太后怒骂之曰:

……且若自以金匱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

这里很明白的说，新皇帝改了新正朔、新服制，也应该作新玺了。这个“新”字的意义，从这怒骂的口气里最可以看出。

更从文法用例上看“元后”“王莽”两传里用的。

掇皇帝，假皇帝（莽传），真皇帝（元后传），新皇帝（元后传），真天子（莽传），这些文例是一律同比的。元后怒骂时说的“新皇帝”，这个“新”字当然是形容词，与当时大家喊的“假皇帝”、“真皇帝”、“真天子”，是同一类的。

所以我当日看了戴闻达的说法，颇觉诧异。那天晚上，我听了你的说法，更觉诧异。

你说，元、明、清以前没有一个朝代不是用地名为新朝代之名的，没有用“有意义的名号”的。

这一说，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至少是不能用来否认王莽号“新”是用有意义的美号。因为那个时代的正统思想正是主张“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白虎通德论》“号”篇说这一点最详明：

……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号以表功，自克明易姓为子孙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

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礼号，以自别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业也。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著己之功业。……

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

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

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

何以知即政立号也？诗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白虎通》说此二句，不止一次，其说皆同。）

此改号为“周”，易邑为“京”也。《春秋传》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也。”（此篇引“春秋传曰”，可见此是西汉以来《春秋》家的主张。其说最近于董仲舒一派。）

不但他们把“夏、殷、周”都说成“美号”，“唐、虞”也都成了“美号”，不是地名了！同篇说：

……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此称“或曰”者，似不是出于当时正统的经师，而出于道家者流，故此节下文有“黄帝有天下号曰‘自然’者，独宏大道德也。……”）

昨晚刚把张大千短文写成寄出，今天刚把“所得税”算好交出，匆匆中写这几叶寄给老兄。我的意思是要请老兄平心想想那位“新皇帝”“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帜，异器制，以十二月朔癸酉为（始）建国元年正月之朔，以鸡鸣为时，服色配德上黄，……使节之旄幡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元后怒骂的话正是指这大串“变更正朔服制”的“新皇帝”！）这一长段文字都不是渲染一个“新”字吗？试以此长段文字与《白虎通》的“号”篇，“文质”篇，“三正”篇对读，——再与《春秋繁露》中一些主张受命改制文字对读，就可以知道前汉的受命改制的“革命”思想到王莽才有第一次实行的机会，王莽自称为“新”，是毫无愧色的！老兄以为何如？

匆匆不及翻检《春秋繁露》了。

下次你来为 China Institute 演讲,能住多久?我想请你吃饭,再谈谈!你不害怕吗?

敬祝双安

适 之 一九五六,四,十夜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致 杨 联 陞*

杨公:

谢谢你四月十二日的信。

关于王莽“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问题,我很赞成你的“并存”说,即是“正好有新都之封,而新又有维新之意。”“正好”者,在我看来,等于“偶然”而已。而当日的“新皇帝”的本意似即是西汉一百多年来学者悬想或“悬记”的“新王”,——所谓“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孔子立新王之道”、“新王必改制”(皆见《繁露》23 及 1 等篇)的“新王”。而“肇命于新都”(见“莽传”引“符命”四十二篇中语),则是偶然巧合的一件事情,可以引作一个“预兆”,其实王莽即使不“从新都侯起”,也还是要做他的“新皇帝”的。

故我的说法是:“新是维新之意,而莽恰巧从新都侯起,故当时符命有‘肇命于新都’之说。”

王充“正说篇”所谓“正说”,在当时实是“异说”,——乃是

一个大胆怀疑的思想家对当时的“正说”的驳论。其说多与古今文之争无关，——特别是这一大段驳唐、虞、夏、殷、周非“有天下之美号”，而是“本所兴昌之地”，更与今古文无关。

其实王充的“土地之名”的“正说”只是大胆的怀疑，可喜的驳论。此说的历史根据，与“美号”之说的历史根据，是同样薄弱的。“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有何根据？“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又有何根据？

“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自是史实。但用此二代来上驳前此“五家”的美号，下比“亡新”之“从新都侯起”，似乎只是一种大胆的类推而已，虽是“针对”《白虎通》“号”篇所代表的正统思想作战，其实没有能够根本推翻那个“应天受命作新的美号的思想”。——一千几百年后，这个思想竟跑到至元八年忽必烈的诏书里去做用美号为国号的主要理由了！后来又居然跑进《古今图书集成》的“皇极典”的“国号部总论”，成为唯一的“正论”了！所以者何？“土地之名”实是后起的异说，远没有“天下之美号”之说之深入人心，也不能比“美号”说有实际大用处！

若以“本所兴昌之地”为国号，刘渊、石勒以至女真、蒙古、满洲都不能讳其“本”了，一不便也。一切符谶妖言也都无用了，二不便也。“圣人受命”的革命思想与口号也失其作用了，三不便也。

试看代汉的“魏”，此是地名耶？是符谶里的“美号”耶？

我们试细看《后汉书》的“袁术传”与《三国志》“魏文帝纪”的裴注，可以明白魏之为魏，并不起于“曹操初封魏公”，而起于“代汉者当涂高”的谶文。曹操初封魏公，在建安十八年，已

在他掌握政府实权之后十多年，这当然是特别挑此国名以应“当涂高为巍”的美名。

后来拓跋称“魏”，明说是“宜仍先号，以为魏焉”。拓跋与魏有何关系？此不过是要沿用符谶里那代汉的魏罢了。

又可注意的是《封氏闻见记》四的“运次”条说，“汉魏共遵刘（向的五行相生）说。国家（唐）承隋氏火运，故为土德，衣服尚黄，旗帜尚赤。……高宗时，王勃著‘大唐千年历’，国家土运，当承汉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至隋室，南北两朝咸非一统，不得承五运之次。……天宝中，……有崔昌以勃旧说上闻，玄宗纳焉。下诏以唐承汉，自隋以前历代帝王，皆屏黜之。……”

故即以“魏”论，已不可仅作“地名”解了。

晋之为晋，与魏同理。司马懿翦除曹爽之后，父子掌握军政实权，前后凡十五年，然后司马昭接受晋公之封。（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次年进爵为王，又次年，司马炎就受魏禅了。“晋公”之封，远在甘露三年（二五八），而司马昭辞不肯受。司马昭先封高都侯，后封高都公，这还是继承“当涂高”的谶文。晋者，进也，由魏而晋，是由“高”进到“更高”了。司马氏出于河南之温，与晋何干，正如曹操与魏郡何干？故魏晋虽是地名，其实皆是求合于符谶之美号也。（袁术字公路，他自以为名与字皆应谶，即是指谶文的“涂”字。后来则专做“高”字，解作“巍”字。如《易运期谶》的“鬼在山，禾女运，王天下”，如《春秋汉含孳》说的“汉人魏，魏以征”，如《春秋玉版谶》说的“代赤者魏公子”，都是抢着要把这个字做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四十年后，“高都”与“晋”似仍是做这个“高”字，郑冲等劝进表

所谓“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国土嘉祚，巍巍如此”。“明出地上，晋”光之至也，高之至也。）

以上所说，并不是要抹煞“王莽从新都侯起”的事实，只是要指出“肇命于新都”是偶然的事，而新王受命改制的思想是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有力量的思想。此说其实不止一百余年，其源起于秦先的驺衍，《吕览》《淮南》都已接受其五德终始说，贾生、司马迁都不是公羊学者，而皆倾向于此种“历史哲学”，不但董生而已。眭孟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眭孟虽因此被杀，但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后世。（延康元年〈二二〇〉许芝引“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受命而王”，竟说是《春秋大传》的话了。）王莽虽倒了，“王者受命而王，必择天下之美号以自号”的思想还是正统的思想，（故在《白虎通》里此语也是引《春秋传》，）故还劳王充的驳论。

我们看那“新皇帝”即位的那一天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殊徽号，异器制”的忙乱，不能不感觉那“定有天下之号曰新”，本意是维新之意，是“应天作新主”的新。“肇命于新都”只是一个偶然的预兆，非号“新”的本意。

试读王莽始建国元年的诏令：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嬪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

……

此即眭弘所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思想也。又如莽令：

……然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

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

……

此即所谓“春秋作新王之事”(董)，所谓“以春秋当新王”(何休)的思想也。

(先生在上面陆弘所说“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的书眉上，又写了一段：)

李渊以唐公起，故有“神尧”之字。但“传国之运”已不是“传”给别人，乃是“传”给自家了！

以上杂论，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要指出：(1)元、明、清三代用“美号”作国号，并非创作，实是推行一个原来很有力量的古代思想；(2)元、明、清以前，如魏，如晋，似是“地名”，其实是特别挑选地名以应符谶的“美名”；(3)王莽的时代，其时代思想，其生平抱负及设施，皆足以使我倾向于承认元后怒骂的“新皇帝”的“新”是本意，——“莽传”中叙“符命”四十二篇，内用“新皇帝”凡四次，其中如“大神石人”说的“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毋留！”乃是所谓直接引语，又此四次用“新皇帝”之称，皆在王莽“改元定号”之前。“莽传”“符命”中说及“肇命于新都”，王充说的“从新都侯起”，似是偶合，可备一说，而不足以说明“定有天下之号曰新”的历史的意义。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致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昨晚在汽车上你们谈的关于我的将来的话，我很感激你们对我的关切，但我有一些话，昨晚没有能够说明白，所以今晚补写一封短信。

我昨晚听你们说，元任曾向 U. C. 的秉先生提起我将来能否重来 U. C. 的问题。我盼望你们不要向 U. C. 重提此问题，因为我现在的计划是要在台中或台北郊外的南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寻一所房子为久居之计。不管别人欢迎不欢迎，讨厌不讨厌，我在台湾是要住下去的。（我也知这一定有人不欢迎我长住下去。）思亮兄给我预备的房子太大了，我决定不要。我颇想向中央研究院借一块地，由我自己出钱盖一所小房子，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房子归研究院所有。这样可以为其他院士开一先例，将来在南港可以造起一个院士住宅的聚落。史语所的书籍（一九四八年我两次在南京用过）于我最适用，比国外任何地方的书籍都更适用。有特殊需要时，可以向国外买 microfilm。更要紧的是年青的助手，在台北比较容易收“徒弟”，由我自己训练，帮我做点事。

我在今年初，——也许是去年尾，——曾有信给元任，说明为什么这几年总不愿在美国大学寻较长期的教书的事。我记得我说的是：第一，外国学者弄中国学术的，总不免有点怕

我们，我们大可以不必在他们手里讨饭吃或抢饭吃。第二，在许多大学里主持东方学的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往往同我有点“隔教”，他们虽然不便明白说，我自己应该“知趣”一点，不要叫他们为难。（以下两点是今天加上的。）第三，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的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第四，我诚心感觉我有在台湾居住工作的必要。其中一件事是印行我先父的年谱和日记全部；第二件事是完成我自己的两三部大书。

以上说的，都是对我的两个老朋友说的诚心“自我坦白”！我知道你们一定能谅解我的。所以要写出来，是因为韵卿性子急，她对我的事太热心了，往往没有耐心听我“坦白”！请你们不要笑我这一篇坦白书！

适 之 一九五六，十一，十八夜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

致 李 济^{**}

……

我近来有一个妄想，想请骊公与兄替我想想：

我想在南港院址上，租借一块小地，由我与院方订立契约，声明在十年或十五年后，连屋与地一并收归院方所有。此办法有无法律上的障碍？此意有几层好处：

(一) 可以开一例子,使其他海内外院士可以仿行,将来在南港造成一排学人住宅。

(二) 我觉得史语所的藏书最适于我的工作(一九四八年我曾长期用过),又有许多朋友可以帮助我。(近来与严耕望先生通信,我很得益处。举此一例,可见朋友襄助之益。)

(三) 我若回台久住,似住在郊外,比住在台北市为宜。

此计划是一种妄想,不但要骊先兄替我想想,也要兄转告思亮、子水诸友替我想想。(我尚未告知他们。)

敬问双安

弟适敬上 1956 年 11 月

* * 本函最初见于《故院长胡适之先生纪念集》,1963 年 12 月台北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0)。

复 陈 之 藩*

之藩兄:

谢谢你四月六日的长信。

《丁文江的传记》得你这样一位热心的读者,我的五个月工夫真不算枉费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丁君的日记、信稿、原信札,都没有收存。日记竟不知在谁手里!我屡次想作此传,终以材料散失,不敢动手。一九五五年的冬月里,我把 Columbia

Univ. 所存的《独立评论》全份, 及《科学与人生观》等等, 全借在我寓里, 细细读一遍。又把我的日记细细翻查一遍。我先作了一个《年表》看看缺什么重要材料。我发现最缺乏的是在在君做上海“总办”的时期的材料, 我只能用 *China Year Book* 的英文材料来补充, (那一年——一九二六——我游英国与欧洲, 只有 British Museum 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日记几册, 差不多没有提到丁在君干政治的事!)

我检查了我手里的材料, 我决定用严格的方法: 完全用原料, 非万不得已, 不用 second hand sources, 这是材料的限制。

故此传的好处是充分保存丁在君自己说的话, 自己写的文字。别人的追忆, 大部分是出于追悼他的二十七篇文字, 其中已有不很可靠的材料了。

这样“充分保存”他自己说的话, 有时是很费力的。例如“徐霞客”一章, 我把丁在君记的金沙江的西岸的诸山, 与东岸的诸山, 总括成两页(页二四——二五)不满的叙述, 是很吃力而不易得读者了解的。

又如“科学与玄学”一章, 我曾删改三四次, 有些地方曾重写两三次。(此章原稿很长, 删改很费劲。)

其实这是我平生自己期许的工作方法, 就是“述学”的工作法。“述学”最好是充分保存本人的文字语言。

在二十年没有人注意搜集丁在君的传记资料的情形之下, 只有这个法子可以“无大过”。

你盼望我“能放开笔, 写一些您的理想与失望, 您的悲哀与快乐……”这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在四十年前, 我还妄想我可以兼做科学的历史考据与文

学的创作。但我久已不作此梦想了。

丁在君曾称赞《我的母亲的订婚》(《四十自述》的第一篇)(《丁传》页七五——七六)。那是用小说体裁写的。当时我本想拟出十几个题目,一律用短篇小说体裁写我的自传。徐志摩极力赞成我的计划。但我写到第二章,就改用历史叙述体了。……

你曾读我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文存》四集,台湾版;《论学近著》原载)吗?那也是我的文学试作。

匆匆写几句谢谢你,不料也写长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四月九日

今天杨振宁、李政道两君来看我。谈的很好。

* 本函最初见于台北文星书店 1962 年 9 月出版的《在春风里》(陈之藩著)。

复赵元任夫妇**

元任、韵卿:

今天收到韵卿的信,真吓了我两大跳!不但韵卿的腿“已三个月不能走动”,并且查出是脊骨的毛病,须要长期休养。(韵卿信上用“修养”字,我觉得比“休养”更深切些。要叫韵卿长期“休养”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先得“修养”!!)

不但韵卿腿痛,并且元任的身体“老觉不舒服,查出是胆

石!”我觉得根本治疗是对的。

想起我在一九一六年八月曾为了元任开割盲肠炎,做了一首打油诗,有这几句:

依我仔细看来,这病该怪胡达。

前年胡达破肚,今年先生该割。……

如今明复久已作了古人,我的新打油诗就得改成这样子了:

依我现在想来,这病该怪胡适。

二月胡适破肚,五月你割胆石!

我有长信给大春(徐),说我最近的病大概起于离 Berkeley 的时候(一月底),起初只是“老觉不太舒服”,后来觉得很不舒服,只说不出不舒服在那儿!后来才觉得是在每顿饭后两三个钟头就觉得“饿”的难受。二月十三日才请医生检查,十四、十五都照 X 光,十四照的是胆石,十五照的是胃溃疡。照相的检查结果,是既无胆石,又无胃溃疡。但后来才知道我的 ulcer 是急性的,又在胃的后墙,X 光照片上差不多看不出来,几乎误事。

因为我的大病,一班年纪相当的老朋友都感觉一点“健康的”自觉,都肯费点工夫去检查身体。这是很好的现象。

我盼望韵卿不要嫌“每日医院各种治疗”的“麻烦”,盼望她安心“修养”!我也盼望元任的“根本治疗”一定可以收“一劳永逸”的效果。

我现在可以说是全好了。只是很瘦,现在只有一二四——五磅了。胃还是弱。但已能看书,也能写信了,祝你们一

家都平安。

适之、冬秀问好 一九五七，四，二十九

*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

复 陈 之 藩^{*}

之藩：

对不起！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我还没答覆，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覆。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

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James 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 hard-minded 与 soft-minded 两大区别。费密（明末清初人）也指出人“沈潜刚克”与“高明柔克”的两大类。（但他加上“平康正直”〈中行〉第三类。）

同样重要，而稍次一等的，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训练是“一言难尽”的，是“终身以之”的，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平日的训练，一旦偶然放松，人的性情或早年先入的成见就无意中流露出来了。

例如，Sir Oliver Lodge 治物理学，那是他的训练。他信鬼，信灵魂，那就是性情流露与他的训练没有大关系了。

我在《丁传》里（页五五——五九，九七——一〇七）（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

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这是性情的表现，其实同他的动物学与地质学无大关系。

我平生留意方法的问题，方法是可以训练的。这种训练正是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你所说“胡先生的看法常常是无大误”，很可能的是这种训练的一点点成绩，也就是你所谓“由于你的谨严的精神”。

你曾看见我写给王重民的一封信吗？（曾登在抗战时期的《图书季刊》新五卷一期。）我在那篇短文里，曾用古人论从政（做官）的四字诀来说明“治学方法”。那四个字是“勤、谨、和、缓”。

勤即是眼勤、手勤、——即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

谨即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即是谨，即是“敬慎”。

其余两字，同样重要，你好像不大注意到。“和”，我解作“心平气和”，解作“平心静气”，解作“虚心体察”。（西方宗教所谓 humility，其实并不十分 humble，平心考查一切不合吾意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跟着证据走，服从人，“和”之至也。）

“缓”字在治学方法上也十分重要。其意义只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证据不充分时，姑且凉凉去，姑且悬而不断（suspending one's judgment）。

所以我中年以来，常用这四字诀教人，常说，科学方法不是科学家独得或独占的治学方法，只是人类的常识加上良好的训练，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养成了勤、谨、和、缓等良好的

习惯，治学自然有好成绩。

现在可以谈谈你所谓“情感”、“真实情感”、“一团火”等等名件了。

因为我注意良好的工作习惯，因为我特别重视“和”“缓”两种美德（良好习惯），所以我很感觉“情感”“火焰”等等在做学问的过程上是当受“和”与“缓”的制裁的。

我所谓“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训练自己，其中一个重要“场合”就是我常说的“正谊的火气”。我最佩服的两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与孟森先生，他们研究史学，曾有很大的成就，但他们晚年写了许多关于“水经注疑案”的文字却不免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陷入了很幼稚的错误，——其结果竟至于诬告古人作贼，而自以为主持“正谊”。毫无真实证据，而自以为是做“考据”！

其实现代许多赞成列宁、斯大林那一套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吃亏的，我想还是他们对于社会问题某方面的一点“正谊的火气”罢？

所以你说，读我的文字“连一朵火焰也看不见”，这是很大的赞美辞，我怕很少人能承当。我是不敢承当的。

你说，清代三百年的考据时代“主要是因为不自由的环境下，不能由人随便说出真心的感情……”这其实是妄说，不可误信。考据的学风是两宋（北宋、南宋）就开始了的，并不是近三百年的事。欧阳修的《集古录》，司马光《通鉴考异》，赵明诚《金石录》，朱熹、洪适、洪迈，并不必“把情感压下去”，他们是考据学的开山人，因为他们生在学术发达时代，感觉有辨别是非真伪的必要了，才运用他们的稍加训练纪律的常识，用证据

来建立某些新发现的事实。这才是考据学的来源。

这种辨别是非真伪的热情,也是一种情感,并且是一种有大力量——也有火焰——的情感。

试读崔述的《考信录提要》或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你一定会感到火焰的热力。

故我不赞成你说的“考证的路”确实是科学的,然而“并非健康的”。你仔细想想,那有“确实是科学的”东西而“并非健康的”!

你举的 Einstein 的故事,大概是不可靠的。Einstein 是天才和训练和合的人物,但他在某些方面稍稍放松他的言论,就不足为训了。

不写了,祝你好。

胡 适 一九五七,五月,二日

* 本函最初见于《在春风里》(陈之藩著)。

复 陈 之 藩**

之藩兄:

谢谢你的 Oct. 11 的信和支票。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你报告我的学校情形，我听了非常兴奋。我二十岁时初次读《新约》，到“耶稣在山上，看见大众前来，他大感动，说‘收成是丰盛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了。’”——我不觉掉下泪来。那时我想起《论语》里，“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一段话，和“马太福音”此段的精神相似。

你所谓“第一次尝到教书之乐。”其实也是这样的心理。是不是？

你收到了我寄到 YMCA 的一封短信和我的 United Nations 的演说吗？如未收到，可去 YMCA 一问。祝你好。

适 之 一九五七，十，十五

* * 本函最初见于《在春风里》（陈之藩著）。

复 柳 无 忌*

无忌先生：

示悉。近来多病，最近又须出门一次，匆匆读大作一过，略有鄙见，即写在大稿上，乞恕之。

我多年不弄中国文学史了，此次胡乱写出一点意见，定多不妥，只因尊意不可却，故略供参考而已。中国的短篇小说（唐之传奇，宋以后的话本）实值得特别一提。李田意兄收集此类材料甚多，可以看看他的《三言》《二拍》等等，此乃是《今古奇观》的来源。

长篇小说之中,《三国志》似不足与《水浒》并提。中国小说可分两大类:一是 stories of long evolution,如《水浒》《西游》等;一是创作的小说,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

匆匆敬祝

双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七,十一,三夜

* 本函最初发表于1979年6月台北《传记文学》第34卷第6期《我所认识的胡适之》。

复 苏 雪 林^{**}

雪林女士:

谢谢你五月五日的信,和寄赠的《棘心》、《天马集》、《昆仑之谜》、《玉溪诗谜》四部书。

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的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

毛神父似未曾有机会把《棘心》交给我。

我今天匆匆翻看这书。在九十、九四页上看见你追念“五四”的“理性女神”的文字。我同情你的看法,但我(觉得)“五

四”本身含有不少的反理智成分，所以“不少五四时代过来人”终不免走上反理智的路上去，终不免被人牵着鼻子走。

你的《天马集》等，我还没有时间细读。（我一定要读你这本书），只想起了一件事，在美京的顾季高先生（名翊群）在今年三月尾来纽约看我，带了一部书稿来要我看。那书稿是讨论李义山的“诗谜”的，他引用了你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和冯浩等人的议论。我那时因为行色匆匆，又因为我平日不喜欢义山的诗。所以不曾细看顾君的书稿。他是一位有地位的经济学者，出于一个旧学有渊源的家庭，晚年（约有六十岁了）对义山的诗发生兴趣，居然写成一部书。我对他说，我们作历史考证的人，不可不知道考证的方法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三分证据，不可说四分话。”我指出他书稿里所举义山的诗谜，往往一首诗可以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包括雪林的说法），而没有一种说法是有两三分证据的。我那天书桌上正摊着一本《朱子语类》，我翻出一条指给顾君看。朱子大意是说，往往“前圣”说的话，虽有“后圣”，他未必能全懂；何况千年后的我们？朱子此言是很平允的，很有经验的，很可以使我们发深省的。……

适 之 四七，五，十二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答 某 先 生^{*}

○○先生：

我从来没有好好的学写字，十几岁时，我曾临写颜鲁公，也曾临写褚河南，也曾临写苏东坡。无论临写谁，我总学不像，当时中国公学有一位会写字做诗的安徽同学汤保民先生（昭）曾说：“适之样样事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

我十九岁出国留学，更没有学写字的工夫了。民国六年回国教书，到现在四十多年了。这四十多年里，我写了三四百万字的稿子，或是讲义，或是文稿，我只有一条自律的规则，就是：不写一个潦草的字，不要叫排字工人排错。

但在过去四五十年里，我没有费一天工夫去学写字。所以我自己知道我不会写字，更不配给别人写字。

承先生的好意，要我写字。我写这封信，请先生原谅，请先生恕我不写了。原纸奉还，敬祝先生健康。

胡适敬上 十二月十三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复 潘 恝*

君实先生：

谢谢你送我《钟表浅说》一本，我读了很感兴趣，还增加了不少知识。

你在钟表小史里提到《红楼梦》里提及钟表的地方，我可以给你加一条“脂砚斋评本”的小考据。五十二回（你已提到了此一回）写晴雯补裘完时，“只听自鸣钟已敲了四下”。脂砚斋本有小注云：

据四下乃寅正初刻。寅此样“写”法，避讳也。

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所以说“避讳”。（此条是依据徐星署藏的八十回本。）

听说你的病已大有进步，今天看见你的题字，我很高兴。我此时不敢来看你，怕劳动你。匆匆草短信道谢，并祝多多保重。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复徐文珊*

文珊先生：

谢谢你十二月十七日的信，更谢谢你寄赠的校点的《原抄本日知录》！

这个本子的底本，诚如黄季刚先生说的，当是“自原本移写”的抄本。季刚先生的校记，我已读了，其中“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胡服”一条，固是极可宝贵的补亡原料，就是避明帝讳诸条，也可以使我们明了当日遗民志士的心理。

你校点这部大书，功力浩大而精细，真可以对得住张溥泉先生和崔震华女士表彰亭林原稿真面目的苦心了，佩服佩服！

敬此道谢，并祝
新年百福。

胡适敬上 四七，十二，二十二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

复杨云萍**

云萍先生：

前日在山上畅谈，甚慰。

谢谢你的信和大作五篇。

《郑成功焚儒服考》一篇,我最感兴趣。你考定这个传说只有郑亦邹的一个来源,证据很充足考定梨洲遗著中《郑成功传》不是梨洲的著作,又考证谢国桢的错误,都很好。你指出郑成功在遁入海之前已统过兵,并非“未尝一日与兵枋”,是很有力的反证;其余四篇,也都拜读了。多谢多谢。

胡适敬上 四八,一,八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李霖灿*

霖灿先生:

今夜偶看《大陆杂志》十七卷第十二期,看见你说明梅清《奇松图册》的短文,我觉得他题诗的末句“异常见风流”五字的平仄不调,我翻看封面原照片,乃是“毕韦见风流”,你认错了两个字。毕是毕宏,韦是韦偃,都是唐朝画松的画家。杜甫诗:“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少……”即是此两人,你看是吗?

胡 适 四八,一,十二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唐富言等*

先生：

中国刊物常有请名人题词的习惯。我个人向来不赞成这种题词，所以我很少很少答应各处题词的请求。现在我很诚恳的报告先生，我已决定谢绝一切的题词的请求了，千万请原谅。

(二月五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吴祖坪、王绍桢**

祖坪、绍桢先生：

承示“因有关母校辅仁大学在台复校事宜”，两位先生要求和我谈谈。关于这件事，我有两点要报告你们和辅大校友：

(一) 我是民国十八年被推为校董的，三十年来，除校董会成立会之外，学校没有召开过一次会。天下没有这样三十年没有开过一次会而还可以自居校董的校董。

(二) 我觉得台湾现在大学已太多了，所以不赞成再添设大学，我是北大的校长，但我从不主张北大复校。我是中国公

学的校友，但我也从不主张中公复校。

这两点都应该让诸位知道的。诸位要和我谈的事，恐怕我没有什么好意见可以贡献给诸位，千万请原谅。

胡 适 四八，一，廿一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某 君*

某某先生：

前天面谈，我说了不少不中听的话，请你恕罪。

先生的《旅台吟草》一本现在托许先生奉还，先生的诗，我已匆匆看过。先生作的全是旧诗，先生一定知道我是很不赞成这种诗的，所以不配题什么话，千万请原谅。

胡 适 四八，一，廿七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韩 石 泉***

石泉先生：

去年承赠大作《六十回忆录》我当时匆匆不曾读，到今年才得细读。这部《回忆录》，是台湾光复后仅见的一本自传，其中不但有先生一生立身行己的纪录，还有六十年来的重要史料。先生提倡自传的风气，我十分佩服。我很盼望将来有许多台湾朋友，如蔡培火先生，如黄朝琴先生等，都有继续仿效先生的《回忆录》，有更多更详细的自传文字出来，使我们更明白当年“日治时代”的爱国运动、自治运动的真实情形，或使我们更明白当年“东港事件”“二二八事件”等等的真实情形。我相信，这种自传式资料的出现必定可以增加我们整个民族的了解与亲爱，不但是给将来史家添一批史料而已。

承寄示令郎良诚世兄照的相片，多谢多谢。并乞转谢令郎。

《回忆录》一二一页提到“朱子家训”所引乃是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治家格言”，他是苏州昆山人，名用纯，字致一，自号柏庐。他的“治家格言”往往被人误传为“朱子家训”，其实朱子并没有留下这种家训。

匆匆敬谢先生赠书的好意，并祝平安。

胡 适 四八，二，十七

*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桂 裕^{*}

公绰先生：

承赠大作《访美杂记》，多谢多谢。

你这本游记，写美国的司法制度各方面特别详细，我看了得益不少。第五章列举“法官的待遇”，更足以供我国人反省。我盼望此书在台湾能有许多人买读。

书中记与令师吴德生先生“雪夜长谭”，其论法律一段（页六七——七八）很有趣味。你用“行路规则”作例证，我也常用这例证。我在纽约有一晚雇 Taxi 回家，车走中央公园，时已半夜寂无行人，也无车辆，而司机每遇红灯必停车，我私叹，此真道学家所谓“慎独”的工夫。必须人人养成了这种守法的习惯，才有法治可说。

匆匆敬请大安

胡适敬上 四八，二，廿八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 吴 相 湘*

相湘兄：

袁克定的跋语，去年就写了，许久没有写好。今夜涂改一遍把草稿寄给你，请你看看。如可用，就请你留下罢。

王云五先生记得芾煌的事颇多，他也知道芾煌游说袁家父子的事。我请他多作一点回想，便中你可以找他谈谈。（我已对他说你发现袁克定的信了。他很愿意见你。）

你评论罗尔纲的话最中肯，我常对他说，不苟且的习惯，是时常需要自觉的监督的。稍一松懈，就会出漏洞了。

我因此回想，古人说“离群索居”之害，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当年早看出尔纲的天资不太高，需要朋友督责，所以我总想管住他一点，其实我太忙，没有功夫监督他，试看他的《太平天国史纲》里就已经收了我责怪他的“明人好名，清人务利”的议论了。

我因此又想起，陈独秀若不脱离北大，若不因偶然的事永离北京，他后来的思想可能不会走上共产党的路上去，而中国思想与政治的演变也可能完全大不相同。

鲁迅也是如此。他若不离开北京，可能不会演变到后来那样子，我看他一九三五年给胡风的信，很感觉他晚年很痛苦，但已无法子解放自己了。

胡 适 四八，三，四夜半

副刊单行本送上一册，乞指正。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陈诚、王云五**

辞修、云五两位先生赐鉴：

本年二月尾，警备总司令部将本市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及其妻应文婵(书局经理)传去，当即拘押，并当面交他们“警备总司令部起诉书”，主文为“右被告因叛乱案件，业经侦查终结，认应提起公诉”。

沈志明、应文婵二人已拘押十二日之久，尚未释放，亦不许其家属探问；他们的律师曾向该部呈请调阅案卷，至今亦未得覆。

云五先生和我皆曾看见起诉书副本，其中所举“犯罪事实”有二项：一为三十九年二月香港出版之斯诺《长征二万五千里》(又名《中国之红星?》)译本，印有香港启明书局发行字样，应由台湾启明书局沈志明负责。二为四十七年一月台湾启明书局出版之冯沅君《中国文学史》，其中之第二十讲(最末三页)内容“渲染自由主义文学，歌颂共产文学”。

鄙意以为民国三十九年香港出版的斯诺(Snow)书译本，事在近十年之前，岂可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局经理人夫妇？至于冯沅君(冯友兰之妹，陆侃如之妻)之书乃是二十年

前在安徽大学的讲义，全书很平凡，只在最末三页提到“无产阶级的文学”，此不过是二十年前的文人大学当时的“时髦风气”，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沈志明夫妇为贪图省钱，即将原书影印，未及看出此最末三页的谬论，事后于去年一月十日即发现此三页之不当，即停止门市部发售，并全部收回本市代售之书，并通知外埠寄回，他们至多不过有一时疏忽失察之咎，若即加以“叛乱”的罪名，似乎太严重了罢？

顷查云五先生主持之“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总报告”，其六十九案即是“切实保障人权案”，其中“办法第二项即关于司法机关与军法机关审判权之划分”，其三项“人身自由之保障”，即特别注重宪法第八条之规定，“于二十四小时内将逮捕人移送法院”等等。

书籍的事，鄙意似不应由军法机关扩大到“叛乱”的大罪名。沈志明夫妇有家在台北，有店业在台北，怕他们逃到那儿去？何以拘禁至十余日之久，不许家属探问，不交保释放候讯？

我认识沈志明夫妇多年，深知他们决不是犯“叛乱”罪的人。我也是追随两公制定宪法第八条的一个人。所以我把这件事在百忙之中写成简单报告，提供两公的注意，千万请两公恕我爱管闲事的罪过。

匆匆敬祝

大安

胡适敬上 四八，三，十一日下午

起诉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那一条法

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 胡适。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程沧波*

沧波先生：

谢谢你十一月廿一日的信。

《李斯传》“吾方燕私”，《韩诗外传》孟母责子“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确有点合乎 Privacy 的字典意义，尤其是孟母说的“燕私之处”一语。

但《牛津字典》引 Emerson “To guard independence and privacy of their homes” 一例，则“燕私”“燕息”，似仍不能达其意。（此语中的 homes 一字也就不易翻译。）“要保障他们的家的独立与燕私”，似不成话。

老兄试译此句，有何妙法？“No more privacy in the homes”，又如何译法？

老兄要到汉人文字里去寻例，可见 privacy 这个 concept 久已不存在了。此字的难译，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没有这个观念。

“幽独”似近一点，但也不是平常人生活习惯里的一个平常观念。

说了半天，还没有解答原来的问题，请老兄再想想如何？

敬祝

大安

弟适敬上 四七，十一，廿二夜

沧波先生：

这封信是去年十一月廿二夜写的。我本想留一两天，看看有没有新意思。不料一搁就是三个半月，千万请恕罪。

我现在想，你引的《李斯传》与《韩诗外传》孟母语两例确是切当。但在西方人的生活里，如《牛津字典》所举，这个字似侧重“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society of others”“avoidance of publicity”，即“不受侵扰”，“不受别人打扰”的意思特别着重。故“To guard the independence and privacy of their homes”似可以译作“保障他们家庭独立与不受侵扰”。

我前函说的“我们的生活习惯里就没有这个概念”，我现在觉得也不对。中国人常说的“清闲”“清福”，其中“清”字似含有“冷清清的”“没有人打扰”的意思。古语“燕私”的“私”字，也侧重“单独”“没有外人打扰”。《论语》“退而省其私”，孔注“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正义》“言回既退还而省察其在私室与二三子……”。朱注“私谓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此即“私语”“私情”之私，同是“没有人打扰”。而“子之燕居”，朱注“燕居谓闲暇无事之时”。故“燕私”之“私”字，与“清闲”的“清”字，都侧重“单独”；而古语之“燕”与近世语之“闲”，则是闲暇休息之意。“夜半无人私语时”，单用“私”字，又加

“无人”，才是 privacy 了。

总说起来，西文的 privacy 若单指其 seclusion 之义，可译为“独居”“独处”，即“退而省其私”之私。若侧重其消极意义“being withdrawn from the society of others”，则似须用“无人打扰”，“不受侵扰”一类字样，如说“there is no privacy in the homes”，似须译作“私人的家庭已没有不受外人侵扰的清福了”？这类罗嗦的翻译，老兄一定要大笑了。拉杂写出，请老兄指教。

弟 胡适 四八，三，十三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郑 清 茂**

清茂先生：

五月十八日的来信和你译的《挽歌》一书，都已收到。多谢多谢。

《挽歌》我还没有读完，但我读了你的序文，已知道你对于日本现代文学有很深刻的兴趣，我很佩服。我读完《挽歌》之后，如有什么意见，我一定写出来寄给你。我读序文，颇觉得序中用“自貽伊戚”、“红杏出墙”、“戴绿帽子”一类的“套语”太多，鄙意认为能避免最好。

屈翼鹏先生托你把《禅宗研究史》和《中国的社会与宗教》

两书中的一部分译成中文，你要等六月底毕业后才有空整理。我七月初出国，九月里回来，请你在这个夏天有空时整理好了。

你已把日人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一书译成中文，我很高兴。因为吉川教授是我一向认识的朋友，此书确是值得翻译的。你如愿意把这部译稿给艺文印书馆或商务印书馆出版，请你给我一封复信，我可以替你介绍艺文的严一萍先生，或商务的赵叔诚先生。

胡 适 四八，五，廿三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杨 力 行^{*}

力行先生：

谢谢你六月二日的信。

我的狂言，你不但没有生气，还向我道谢，我很佩服你的雅量。这种虚心是治学的基本条件，我很诚恳的给你道贺。

卫挺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也曾收到他送我的两本书。但我对于这个问题向来没有研究，所以从没有敢发表意见，因为日本古代史里就会有很多不可信赖的神话，近几十年里这种神话很多的古史又得到了政治与宗教的保障，所以近代日本学人的谨严史学方法似乎没有自由的充分应用到那个领域里去。神武天皇本身的有无，谁都不能知道，传说的徐福故事

里有多少可靠的成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又何从批判神武天皇是不是徐福的问题呢？

敬谢你的好意，并祝平安。

胡适敬上 四八，六，四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王云五**

云五先生：

承先生送我一部《历代纪事年表》，共四十册，还有木梓箱，真是很贵重的礼物，很有用的参考书，十分感谢！

华国小序提到辟园居士是“兰溪刘治襄，壬寅领乡荐，联捷成进士，入词垣。”我偶检房兆楹夫妇的《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引得》，并无刘治襄，只有刘焜，浙江兰溪人，光绪廿九年癸卯（一九〇三）二甲七十名进士，选入翰林。治襄是刘焜的表字。

因为先生热心表彰此书，故检查辟园居士的官名奉告，以表谢意。

敬此道谢，并祝
先生府上都平安。

适敬上 四八，六，十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苏 雪 林*

雪林：

连得你三封信，使我十分不安。

我一定依你的话，不把我的信给别人看，请你放心。

你读过王静安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的《王亥》、《王恒》两篇吗？你读过《傅孟真全集》里的《史料论略》（中篇丁，页二——七）讨论这两篇的文字吗？静安先生两篇皆与《天问》有关，其方法最谨严，故值得重读。

祝你平安。

适 之 四八，六，十九夜

考证的工作，方法是第一要件，说话的分寸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我常劝朋友，“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不可说六分话。”前信说的，大旨似不过如此，你不必多疑。

适 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罗 锦 堂^{*}

锦堂先生：

谢谢你六月十二日的信。

前几月你送给我的《中国散曲史》及《历代图书板本志》两书，一直没给你回信道谢，十分抱歉。

我从前曾注意到元明小曲，也曾收集一些材料，但我收集的材料都丢在北平了，现在身旁一无所有。

你在《大陆杂志》上最近发表的《论带过曲与集曲》一文，我也看了。我是门外汉，但我大体上赞成你的意思。

郑清茂君译的吉川幸次郎的《元杂剧研究》已得严一萍先生的帮忙可以付印，我们都很高兴。

胡 适 四八，六，廿三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拙 哉^{**}

拙哉先生：

六月廿二日的信收到了。

道士的书，百分之九十九是伪作。《仙佛合宗》书中说“邱祖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正足以证此书是伪作。

小说《西游记》与邱处机《西游记》是两部书，完全无关。我在民国十二年有“西游记考证”一文，开始就说：

《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邱处机作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邱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前去，经过一万余里，走了四年，始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邱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二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

“西游记考证”现在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里。先生如要研究明代吴承恩著的小说《西游记》，请你看看这篇“西游记考证”。

胡 适 四八，六，廿六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彭 君*

某某先生：

谢谢你十月十二日的信，更谢谢你寄的七首诗。

大概是因为你信封上写错了地址，所以我今天才收到。（以后请写“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你说：

我以为新诗应该用最普通的词句，来直接抒写感情，扔去五

光十色的联想,使每句诗读来都是口语,然后使这些口语结合成整体,乞灵(此二字不太好,不如说“归结”?)于含蓄。

这几句话,我大致都很赞同。(“然后使”三字也有语病,似不如删去?)如果你能依照这几句话去做诗,我相信你的成绩一定是很好。

我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曾说:我做诗的戒约至少有这几条:

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

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消极的说,这就是要删除一切浮词凑句;积极的说,这就是要抓住最扼要最精采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

第三,意境要平实。……在诗的各种意境之中,我自己总觉得“平实”、“含蓄”、“淡远”的境界最禁得起咀嚼欣赏的。……

我的戒约和你的新诗见解似乎颇相接近,所以我很赞同你的看法。

你说“诗真是很难写的”。这一句话也是从经验里得来的真实话,我已多年不写诗了。

你的七首诗,我觉得《泪》最好。

《病》也好,但下半首有毛病,“心脏”与“心”不同,“心脏”是“在这儿”,那“在我的遥远的故乡的”是你的“心”。

《相会》的语言是很干净的口语,但意境远不够“含蓄”。你说的是吗?

《兰花之献》原是两首诗,读者误作一首,这三节说那青年“从此哑默无言”了,怎么下面又说了?何妨试删去两个子题,

又删去第三段，试把两首并作一首，似乎别有风味。那就不会引起误会了。

我感谢你寄诗的好意，忍不住轻易批评你的作品，千万请你恕我狂妄。

胡 适 四八，十，廿五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 赵 元 任**

元任：

昨天时逢来看我，我才想起前天是你的生日，敬补祝大寿！

一年前的 Nov. 1，你们送我行，几乎闯下大祸，害你们两人都受伤，我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感觉不安。

我给时逢写的信，有一份给他看了，请他转给你看。

我还没有收到 Miller 的回信。

前几天我寄了一本小说《旋风》，给韵卿消遣，这部小说很值得看看。

听说你明年夏天“退休”了，羡慕之至！我很诚恳的劝你退休之后回到南港来住，把史语所的语言学组光大起来，训练出几个后起的人来，我们还可以多多见面，大家高兴高兴！

我们在南港兴造四座“学人住宅”，明年（误作“天”）夏天

可以完成。其中一座是留给你们住的。

“交友以自大其身，造（误作‘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这是李恕谷（塏）的名言，我曾读了大感动。这是“收徒弟”的哲学！

三小姐生产了没有？是男是女？

适 之 一九五九，十一，五

（在台大医院作检查，住一宿，检查结果很好。）

*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第3集。

复 何 勇 仁*

勇仁先生：

谢谢先生十一月十六日的信，谢谢寄来的《胡适的为学与做人》一篇文章，又蒙赐寄照片和资料。尊文推奖过当，读了很惭愧惶恐！

这篇文章，依据《四十自述》，在幼年事实方面没有大错误，但有三点可以奉告：

（一）光绪十七年是西历一八九一，不是一八八七。

（二）欧阳予倩不过是当时认识的朋友，并不是我的同学。

（三）我跟了先三兄到上海，我自己进梅溪学校，我进学

校几个礼拜之后，他就病死了。今说“他才跟三兄到上海梅溪学堂读书”，这就好像说我跟三兄同进一个学堂了。

先生要精选二十件名画到中央研究院来展览，并招待院中同人，我特别感谢你的好意。只是院中没有可以展览的地方，而且离台北市太远。台北市到南港来的人，如果没有汽车的话，一定要坐火车或公路车先到南港镇，再换三轮车，实在太不方便了。我希望先生能在台北挑一个中心的展览地点。何时展览，希望先生通知我，那时我一定去看。

胡 适 四八，十一，十七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复 陈 谟**

陈谟先生：

谢谢你十六日的信。

《吴承恩诗文集》的“叙例”使我很感兴趣。因为这位编辑刘修业是我的朋友，是王重民先生的夫人。看此“叙例”可见她还健在，所以我很感谢你寄示此件。此件今寄还。

此书我当设法在香港买一本，可以让故宫博物院的朋友用刻本校勘一遍。

何时重来台北，甚盼你来看看南港。

敬祝平安

胡 适 四八,十一,二十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8册。

致 周 法 高*

法高兄：

采稻的小记一条，承你指出《颜氏家训》附录一条；及《札朴》所引四条，我很高兴。（《家训》一条，去年我已记出，今年遍觅不得。）

胡颂平兄今天又检出《通鉴》一条，我请他抄一份送给你。颜之推自注“我师采稻失火，烧宫殿荡尽”，与《梁书》“王僧辩传”所记是一事。“僧辩传”原文是：

僧辩令众将入据台城。其夜军人采稻，失火，烧太极殿及东西堂等，时军人卤掠京邑，剥剔士庶，民为执缚者，袒衣不免，尽驱逼居民以求购赎。自石头至于东城，缘淮，号叫之声震响京邑，于是百姓失望。

若采稻、采稻，只是采撷田野中不布种而自生之谷物，何以军人采稻而致“火烧宫而累月”呢？

故知六朝常语之“采稻”确有“出门找机会发点意外之财”的意思。军人入宫殿大搜括，大抢掠，也是“采稻”！“建康宫殿之火烧累月”，与圆明园之烧为瓦砾，都是“采稻”的结果呵！

此函请兄与槃庵、万里诸兄一阅。

适 之 四八,十一,卅

* 本函最初见于《近代学人手迹》初集(周法高编)。

致 刘 宗 怡^{**}

宗怡大嫂:

吉忱曾标点我收藏的《罗壮勇公年谱》两册,本拟付印,因战事发生,此书未付印。

我记不得吉忱标点本是否还我了,你记得此事吗?你记吉忱遗稿之中有一部标点的《罗壮勇公年谱》吗?

那是乾隆末期到嘉庆年间打白莲教匪大将军罗思举的自传,文字很近于白话,是一部值得读的自传。今天有人问起此书,所以我写此信问问你。敬祝你新年平安。

适 之 四九,一,十二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 梅 贻 琦^{***}

月涵兄:

收到大札，知道上月此间全体大专院校校长集会，决定拟组织“孔孟学会”，并诚邀“担任发起人之一”。

我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倡思想自由，思想平等，就希望打破任何一个学派独尊的传统。我现在老了，不能改变四十多年的思想习惯。所以不能担任“孔孟学会”发起人之一。千万请老兄原谅。

弟胡适敬上 四九，一，廿九

*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 张 圣 述^{*}

圣述先生：

谢谢你一月三十日的长函，并谢谢附件。

这两天很忙，要赶成一篇长文，故不能详答尊函。

先抄寄蕢斋公集中“致吴清卿书”一通，此中胡铁华即是先父，名传。又章琴生编修洪钧也是安徽绩溪人，你看此书就可以知道“致安固侄”书中的章琴生是谁了。

《润于日记》中记“蕢斋公在宣化谪所时，收到胡铁华从远道寄银二百两，”那也是先父。《润于日记》此时不在手边，只记得大意如此。

先父自作《年谱》，是自传中最难得的好作品，其中记他进谒蕢斋先生一段最详。先父与吴清卿的关系——十多年的师

生关系——起于蕡斋公这一封介绍信，故我珍重此信，抄给你看，要你知道我们两家的世谊不止于远伯先生与在君先生和我的友谊而已。

先父《年谱》只记到他四十一年，尚缺十四年，我总想补作。现在想先付印，加上他的日记，可以成一部自传了。

百忙中草此，敬谢厚成，并祝新年百福。

胡适敬上 四九，二，二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张圣述**

圣述先生：

谢谢你的信。

顷从历史语言研究所借出《澗于日记》，其《出塞日记》（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记四月初一宿宣化，初二日至张家口，初五日派头台效力（察罕托落梅）初六日报出口到台。……二十二日……见邸报军台恩诏，兵部奏，奉谕佩纶军务获咎，毋庸查办。

五月十三日记：

胡守三寄百金来，作书却之，交琴生。（十一页）

此可改正我前函记忆之错误。

大概当时蕡斋先生最遭谗忌的时候，不但已“发往军台效

力”了，还有人要“查办”他，要置他于死地。先君那年在吉林署五常厅抚民同知，兼理儒学，是一个“芝麻大”的小官，独寄百金到口外，故蕙斋先生特于日记内记此一事，可惜他的信不存了。（史语所中无《涧于集》，前函抄存的荐书，是北平贵族人在三十年前抄示的。）

我很惭愧，我自己的“自述”只写了《四十自述》，以后仅有《逼上梁山》一章（附在台北版《四十自述》之后），以后就没有写下去了。民国廿八年（一九三九）印行《藏晖室札记》，卅六年（一九四七）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题作《胡适留学日记》。这也可以说是自传的一部分，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归国时为止。这二十多年来，我们都在乱离之中，没有写自传的心情了。

《丁文江的传记》是在海外写的，居然写成十万字的传记，也颇出我自己的意料之外。

傅孟真的传记，我也想写，但颇不容易，我也腾不出工夫来。将来也许可以给这个可爱的朋友写一篇“述学”的文字。

我的日记都留在国外，因为太多，太重，故没有带回来，其中一部分，沦陷在北平，不知下落了。

先君的《台湾纪录两种》，——日记与禀启——曾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近年我又重编过，把禀启编在每日的日记事后。此本不久可以印行。

杂拉奉报，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四九，二，十五

“先生”之称，还是用了，只是为了方便而已，千万勿罪。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王世杰*

雪艇兄：

尊藏《乾嘉闻人书翰》一册，我已看过，很感兴趣。其中袁枚两札是书记代老人写的，但第二札上方批的廿五字是简斋亲笔。

此中程鱼门二札似是给朱竹君的，朱珪两封家信，及阮元及曹振鏞给“少白十一兄”的信，与鱼门二札，都出于朱竹君家，少白是朱筠的儿子，其名似是锡庚？

此中李申耆与徐星伯一札使人想像当年学人往来的风范。

包慎伯一札也可爱，其中“家贫望邻富”一语，甚有趣。

弟适之 四九，四，三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 黄 应 良*

应良先生：

二月七日和三月十四日的信，都已接到了。

你要把《新青年》杂志七卷中发表的白话新诗抄出，编为《新诗的开拓者》一书，这些诗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至少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尝试精神。因为不是我一个人的诗，我不敢说“允诺”，但我是赞成的。我没有功夫写序文，只能题一个封面附上。

你要附录“我为什么要作白话诗”（《尝试集》自序），我不反对。《谈新诗》一篇似可不必附录了罢？寄上《新文学运动小史》一册，供你参考。

胡 适 四九，四，廿七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 入 矢 义 高**

.....

以上说明，敦煌出来的证件使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位死在

宝应元年(七六二),年九十三岁的神会确曾做了两首“五更转”,每首五章,总共十章,曲拍完全相同。这就是说,盛唐时期已可依现成的曲拍“填词”的事实了。

神会最活动的时期是开元天宝时代(七一三——七五四),故我们可以说,开元天宝时代确然已有依现成的曲拍作曲的风气了。

所以我的新结论是:

现在我们看敦煌出来的各种佛曲,特别看那流传最广的神会和尚的“五更转”,我们不但可以相信开元天宝时代已有依照当时最流行的曲拍作佛曲的风气,我们并且可以相信那样填词作曲的风气可能比开元天宝还更早,可能是人们歌唱的普通作风,并不限于教坊的乐工,也不限于歌妓舞女,也不限于佛教的和尚尼姑。凡是好听的曲子,凡是许多人爱听爱唱的调子,总有人依照那曲调编造新曲。那就是“填词”了。(胡适“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写本”,《史语所集刊》外编第四种,页二八以下。)

我在此文里,也提到各种敦煌本“五更调”或五更转,如:

- (1) 五更调艳曲 P.2647 (刘复《掇琐》二七)
- (2) 维摩五更转 S.2454
- (3) 无相五更转 S.6077
- (4) 太子五更转 P.2483 (刘复三六)
- (5) 叹五更(罗振玉《零拾》五)

我也提到了许国霖抄的“五更调”(周字七十)与刘复抄的“南宗赞”(P.2763),与伦敦的 S.5529。这一首“五更调”,我也参校写定了。此曲题作“南宗赞”,但思想不近于神会,例如

第一更有“行住坐卧常作意”，即与神会的“无念”“莫作意”相反。我暂定此首是“后来的和尚套神会的‘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做的佛曲”。

关于这些佛曲，我的结论是：

我们看了敦煌出来的许多佛曲，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宣传佛教的曲子实在没有文学技术，也没有高明的思想内容，所以他们都没有文学的价值。他们的宣传作用似乎是音乐的成分比文学的成分占的多，他们全靠那些人人都能唱的曲调来引动许多男女听众。文字的不通，内容的浅薄，都是不重要的。……从盛唐以下，尽管有一些和尚用最流行的民歌曲调来制作佛曲，但因为那些作宗教宣传的佛曲实在没有文学价值，——正如那许多倡家歌妓唱的歌曲，虽然“音律不差”，而“下语用字，全不可读”（此用沈义父《乐府指迷》的话），也没有文学价值，——所以“词的时代”不能起于盛唐，只能起于白居易、刘禹锡之后，必须到了温庭筠、韦庄、李后主的时期，方才有文学的词，方才有词的文学。（胡适，同上文，《集刊》外编第四本，页三一）

以上几点，都只是摘抄近作的一篇文章，——就是先生去年的两封信引起来的一篇文章。此文出版尚在数月之后，故摘抄一部分，说明我所以承认那两首“五更转”是神会作的，又附带说明我因此须修正我在三十多年前发表的“词的起原”说。

简单说来，我们必须承认敦煌出来的证件是第一手的史料，我们必须用这些证件来试验我们提出的文学史上的某种假设。“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

章’形式?”只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问题,我在三十多年前提出“长短句的词起于中唐”的答案只是一个假设。现在我们既已搜集了这许多敦煌出来的第一手史料,既已发现了其中的两件是有作者的主名,而作者的生卒年代是大致可信的,——那么,我岂可不接受这种第一手史料来修改我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假设吗?

我们应该承认“五更调”、“五更转”、“十二时”一类的俗曲都必定是“定格联章”的形式。五更须有五联章,十二时须有十二联章,都是题材规定了形式。这种“定格联章”,实在是幼稚的,原始的(Primitive),并非进步的。敦煌出来的佛曲之中,有许多“五更”“十二时”曲子,都是这一类 Primitive “定格联章”。因为不得不具十二时,或不得不具五更,故往往有极劣的凑调句子或凑韵句子。

故尊函提出的问题本身即有小错误。问题并不是“神会时代的歌曲是否已发达到这样复杂的‘定格联章’形式?”真的问题似是:“神会时代的歌曲明明还在那很幼稚的,很笨重板滞的‘定格联章’的五更转形态:唐人的歌曲何时才从这种‘定格联章’的幼稚形态发达到《云谣杂曲子》那样自然的歌唱?”

先生试想,问题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此信太长,千万请恕罪!

敬祝起居万福!

右手还不太方便,故写字多潦草,乞恕。

胡适敬上 一九六〇,五,廿六夜半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手稿》第8集,1970年6月台北胡适纪念馆影印。

致 沈 亦 云*

亦云夫人：

承您许我先读《回忆》的“自序”，又得读“塘沽协定”诸章的原文，十分荣幸，十分感谢！这半个月以来，我天天想写信给您，总没有安定的心情；直到今天，勉强写这信，一定不能表达我想说的话。

我要首先向您道贺：贺《回忆》的写成，贺您这一件心事的完成。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很少人能够写出像您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所以您的稿本的写成是真值得庆贺的。自序写得很好，我读了很感动。第一段叙述乱离时保存材料的困难，使我想起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您说：“我岂可以此不急之物分人逃生之地？”这是很感人的一句话。

“自序”写“属稿时”的心理与方法，也说的很动人。您批评中国新史家好像有心“回避”现代史的题目，并且指出“教科书中所见，……对国难尤多责人之言。……我们自己岂无一点责任？”正因为有许多人至今还不肯负“一点”国难的责任，所以现代史的材料至今还没有出现，所以现代史至今还是被“回避”的题目。我盼望您的《回忆》的出世可以引起别人的仿效，把他们长久收藏的史料发表出来，把他们的追忆或回忆也

写出来。

史料的保存与发表都是第一重要事。我看了您几卷稿本之后,我的感想是: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来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保存了真实史料而没有机会发表,或没有勇气发表,那岂不是辜负了史料?岂不是埋没了原来保存史料的一番苦心?

日本军人在沈阳发难,到今天已是二十九年了。“七七”与“八一三”到今天已是二十三年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中日八年战史”,也没有一部中国史家著作的“抗战前的六年中日关系史”。这都是很可耻的事。为什么我们的史家到今天还没有写出“中日战史”(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实在是“十四年中日战争”)这一类的著作呢?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国家继续在空前的大患难之中,史料不容易保存,不容易得人整理。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您说过的:“史家似乎在回避此一题目”。这就是说:“社会里还有太多的忌讳,史家就没有勇气去整理发表那些随时随地可以得罪人或触犯忌讳的资料了!”

您说:“我所记者,偏于我一家的事,……区区之心,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我很热诚的欢迎您的“交卷”,很热诚的佩服您发表这许多现代史料的勇气。这样的“交卷”才是“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这就是替中国现代史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了。傅沅叔先生遗札影本四件奉还。其卅二年一月六日一札的影本,承你许我留存,我十分感谢。沅叔先生父子待我最厚,他家藏书常许我借校。民国卅七年

十二月中我最后飞出北平的前夕，我还在料理托人送还他家的书，那时他老人家已病困多年了。我最爱他这封长信中的一段：

……朋友相关，时加劝喻，谓衰龄晚岁，宜事幽闲，何必自苦如此？愚意不然。凡人处境，宜事勤劳，慎勿长闲耽逸，虚度此生。盖闲者体易惰，精神或至衰颓；逸则心易放，志意无所专注，最为人之大病。常人且然，有聪明才智之士，尤不闲逸自甘。《易》曰：天行健。古训云：民生在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鄙人居恒以此自励，愿夫人亦共勉之。人生此世，固有应尽之责，则待治之事正多。苟抚心自省，奋志勉图，且有来日苦短之虑，此生又安有闲逸之日乎？

我读此信，始知沅叔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原来都建筑在“勤劳”的人生观之上。这又可以显示保存师友信札的重要了。

我很高兴您已把割去的一章恢复了。

昨夜我听您说，您还有不少的没有采用到《回忆》里。我昨夜曾建议：最好请哥伦比亚大学主持 Oral History（口述的历史）的先生们给您的文件做一套 microfilm，这样就不怕遗失或毁坏了。倘您对这件事有兴趣，可以和何淬廉先生接洽。昨天江季平说：哥伦比亚大学主持 Oral History 的人曾托游建文先生转询您是不是愿意口述膺白先生和您的自传，让他们记录（record）下来？我想，您已写成了《回忆》三十多章，似不必口述了。但我还盼望您让他们把《回忆》全稿（包括文件）制成一套 microfilm，由大学保存 negative 原本，而您可以请他们复制一两套——这是最便于保存的方法，值得您考虑、考虑！

最后,我重申庆贺您写成《回忆》全稿的大喜!并祝您和熙治、同同平安快乐。

胡适敬上 四九,十,九夜

* 本函最初见于《中国现代史丛书》第4册(吴相湘著),1962年3月台北中华书局出版。

致 梁 实 秋^{**}

实秋兄:

有一件事奉商。

今年的“文艺奖金”的推荐,十一月廿四要截止了。有一位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写信来问我为什么不推荐姜贵的《旋风》小说。我向部里讨得“文艺奖金办法”来看,才知道,即使我要推荐此书或别的作品,我也没有推荐的资格,因为我不合于第五条的规定。

因此,我想请老兄考虑是否可以由老兄以“学术审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推荐这部曾经《文学杂志》第六卷六期登出两万多字作介绍的《旋风》小说。

此书老兄想已读过。今天我送上:

《旋风》三册

姜贵印的《怀袖书》一册(《旋风》)的评论,其中有高阳先生的两万多字的介绍(页四十)。

教育部四十九年文艺奖金候选人推荐书一份(其中前几栏,我已代填,但“贡献”与“推荐评语”都空着)。

请老兄想想,如何?

我与《旋风》作者只有今年六月十八日在成功大学草地上一面之缘。此人姓王,名林渡,是王统照的本家;《旋风》写的是山东诸城王氏大族“天翻地覆”的情形。

你若不愿意提此书,我绝不怪你,也绝不介意。老兄知道我是一个“好事之徒”,这封信不过是我一时“兴之所至”的表现而已。

匆匆敬祝

双安

弟适之敬上 四九,十一,十八下午

昨天看见毛子水、姚从吾,他们都没有读过此书!

《旋风》三册是我自己买来的。作者并不知道我有此意。

适之

* * 本函录自《胡适书信集》下册。

致毛子水、姚从吾^{*}

子水、从吾两兄:

前晚偶说及小说《旋风》的事，我现在买了两本送给你们两位玩玩。

我很盼望你们两位能在一天或两天里看完这本书，如果你们觉得此书值得推荐为今年文艺奖金的候选人，我盼望你们看看此函附上的两三件资料。

（一）此书作者印的《怀袖书》一册，——收了许多《旋风》的批评，其中有“高阳”为文学杂志（六卷六期）写的两万七千字的“研究”。

（二）文艺奖金候选人推荐书（反面有“办法十条”）一份。

（三）备用的《旋风》三册。

我昨写信请梁实秋先生作推荐人，他今天有回信来，我也送给你们看看。

我与作者“姜贵”（原名王林渡，山东诸城人，是王统照的本家）仅有今年六月十八日在成功大学草地上匆匆一面之缘，我偶然高兴，想推荐他的小说，因我不合格（办法第五条），所以我先托实秋，现在转托你们两位。但你们如果不愿意推荐，我完全谅解，决不怪你们。（昨天函实秋，我也如此说。）

适 之 四九，十一，十九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王姜贵*

姜贵先生：

谢谢你的信和资料。

我不合于推荐文艺奖金的资格(办法第五条)，所以曾向几位合格的友人商量过，他们感觉今年太晚了，明年当早日开始筹备。他们读了我送他们的《旋风》，都很受感动。有一位朋友写信来说：

这部书写得真好，……比《红楼梦》、《儒林外史》泼辣、深刻的多了。只是太残忍一点。……使人感到可怕、可厌、气闷、失望，妨害了目前工作的情绪，只有暂时放下，缓一口气，过一半天再读了。

我今天回信说：

这书的好处正在“太残忍一点”，正在作者有力量能够“忍心害理”的描写，能够“太残忍”的描写。……你说我的话不太错吗？

关于重印《旋风》的事，我已把来信交给启明书局的沈志明先生看了，他会直接向你接洽。

敬祝平安

胡 适 四九，十一，廿三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复 陈 君*

某某先生：

谢谢先生十一月廿六日的信。许久未能奉覆，甚歉。

承问“陈姓同派究为陈胡姚田，抑为陈胡庄袁田陆孙？”我很惭愧，竟不能答覆此问题。我只知道敝族出于安徽徽州一带的“考水胡”，又称“明经胡氏”，又称“李改胡”。相传始祖原姓李，出于唐代宗室，避朱温之难改李，故历代不与李姓通婚，故敝族向不敢自称出于胡公满之后。

先生所问都是谱牒学上的问题，可检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附录的“姓氏略考”。陈田古同音，故陈成子又作田成子。此外，姚、袁、胡、陆诸姓则是谱牒学家造出来“出于舜”的关系。但庄孙二姓似向来不在此列。

胡 适 四九，十二，十二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

致胡天猎*

胡天猎叟先生：

这两年里，时时想写信给您，总苦于不得工夫写长信，——因为我总想写长信谈谈您手里的几部旧小说，——结果总是搁下来了，一搁两搁，就是一年有半了！

现在写信，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一年半里，我出国了两次，竟不知道您的小说已印出了几部？这一件我最应该帮忙提倡的事，我竟丝毫没有帮您一点忙，真是十分惭愧，十分抱歉！

今天我只想谈几点：

(1) 你的郁郁堂刊本百二十回《忠义水浒传》，已有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铅印本，有我的长序，收在《胡适文存》第三集里。今送上此集一部，请指正。

(2) 你的金圣叹批本《水浒传》，似确是贯华堂原刻本。圣叹的贯华堂原刻本，曾由刘复先生(半农)交中华书局影印行世。今送上旧文一篇，乞正。此文可备先生校勘之用。

(3) 民国十六年曾由亚东图书馆铅印行世，有我的“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也收存《胡适文存》第三集(卷五)里。另送上《文选》一本，其中页二六八——三五八是讨论《红楼梦》的旧文，页三〇四以下是第一次提出“程甲本”与“程乙本”的问题。

自从民十六亚东排印壬子“程乙本”行世以来，此本就成

了《红楼梦》的标准本。近年台北远东图书公司新排的《红楼梦》，香港友联出版社新排的《红楼梦》，都是根据此本。大陆上所出各种排印本，也都是“程乙本”。

你的弘治本《三国志演义》，商务印书馆有影印本行世。不知与尊藏本是否一样？

以上略说尊藏诸本中的四种本子的流传本，供您的参考。当时本想为您做一点参考工作，但时间总不容许，一直搁下来。今天偷出一点时间，写几句草草的话。如有我可以帮您的地方，请您不吝指教。

匆匆告罪，并祝平安。

胡适敬上 五十年一月廿四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沈 裕 民**

裕民先生：

今天看见你一月廿八日的信，我特别感谢你费了那么多的时间、精力，替我主持办理抄写旧文的事，还“为校对往往至深夜始已”。

《努力》及《读书杂志》的文字，绝大部分原已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了。台北版是重排的，当时我想为书店节省一点排字费，所以删去了不少《努力》上的时事评论。现在亚东版的

《文存》二集已很难得见了。(亚东版二集所收的“这一周”，已有“未删”与“删去三条(?)”的两种不同的本子。)所以贵处代我抄存的《努力》里的全部拙文，是我自己认为最可珍藏的一部抄书。我对于贵会的好意，先生主持“查找篇目，分配抄写，校对整理，编造目录”的辛苦，以及抄写诸君的辛苦，都十分感激！

我是不会写字的，写了两小幅寄上，请你莫见笑。另寄赠《文存》四集及《四十自述》一册，也请你笑纳，这也是“秀才人情”，略表感激而已。

胡适敬上 五十，二，一日下午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杨 亮 功^{*}

亮功兄：

《中公周刊》半张，我已看了，今天送还给你保存。君武先生的续史有“中略”“下略”的部分，可能是他发牢骚的话都被删去了！

我盼望你早日写成你的历史。

送上一本《四十自述》，其中页五七——八三，都是中公与新公学的生活，其中记戊申（一九〇八）年的风潮，我当时有资料，故写的最详细；在中国教育史上，很少追记学校风潮的文

字,也很少描写学生生活的文字,所以我送一本小书给你玩玩。

敬祝府上新年快乐。

适 之 五十,二,十五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胡 天 猎^{**}

胡天猎隐先生:

星期日匆匆晤谈,不幸被来客打岔,不得多多领教,抱憾至今!

前写短序,不知可用否?

别后我回想,先生带来的两种藤花榭刻本,那个小字刻本似无可疑。但那个半页十行,每行廿二字的大字刻本,我颇疑不是藤花榭刻本。《红楼梦书录》著录了三部藤花榭本,(1)是原刻,(2)是“重镌”,(3)是同治三年耘香阁“重梓”藤花榭原版,三部都是半页十一行,行廿四字。尊藏的半页十行,行廿二字本,行款颇像所谓“东观阁”翻“程甲本”。此本可能是南方很早(或最早)的刻本。因为藤花榭刻本最著名,故书店只知有藤花榭之名,而不知有更早的东观阁本了。

此说只是我的揣测,不敢认为定论,请先生指教。(东观阁本前面应有“东观主人”的题记,书坊因要充藤花榭本,可能

毁去了。东观阁本回目第二十七回作“宝钗戏彩蝶，……黛玉泣残红”，不作“杨妃”“飞燕”。藤花榭本回目则作“杨妃”“飞燕”。)

胡适敬上 五十，二，十七夜

此篇未留稿，倘蒙飭人抄一份见寄，至感。适之
又尊藏有正书局石印的所谓“国初抄本”《红楼梦》，
即“戚本”，将来可否借我用几天？适之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赵 聪*

赵聪先生：

谢谢你二月二十日的信，并谢谢你寄赠的《红楼梦书录》
和《春柳堂诗稿》。

萧辉楷的信尚未收到。贵社同人愿意担任香港代售预约
一切事宜，我十分感激。

影印缘起及样张，今日印成，先寄上样张十份，缘起及说
明书五份，乞先送辉楷兄看看。

又送上台北商务印书馆代理经销条款抄本一纸，供萧兄
参考。

港币价格，乞贵社代为酌定，预约通知单亦乞代拟，港地

广告等事，均乞代理，所有费用，均应由我负担。如需先寄款，乞嘱辉楷兄示知，当即寄呈。

我最近研究“甲戌本”与“庚本”的情形，始知雪芹在甲戌（乾隆十九，一七五四）年写成的初稿只有此二十回？最有力的证据是十三回写秦氏之死，“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此回原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她是自缢死的，故可以说“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后来删去了“天香楼事少却四五叶”，故雪芹后来补写十三回以前的几回，故意写秦氏之病重。十回写张太医诊病，已说病只“有三分治得”了。十一回里写凤姐、尤氏对话，竟说“一应的后事”，“都叫人暗暗的预备了”，只是棺材“不得好木头”！这都可见甲戌初稿还没有这四回（九至十二回）。如果秦氏已病重到“一应的后事”都预备了，他死时决不会“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了。

贾瑞的“风月宝鉴”的故事，是雪芹的旧稿，原是独立的。如今也塞进这后写的四回里去，才填满这空洞，这四回写的很吃力，很潦草，——如写学堂一回，实太潦草。

故我现在不但回到我十七年的看法：“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也许止有二十八回，也许只有四十回”。我现在进一步说：甲戌本虽已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其实止写成了十六回。

看“庚辰本”的残缺状况，——已写到八十回了，而尚缺六十回与二十七回；十七、十八、十九三回显然是后来补写的（此三回也是甲戌本没有的），“此回未成而芹逝矣”。此皆可证甲戌年成稿止有此十六回。

故我这个“甲戌本”真可以说是雪芹的最初稿本的原样

子,所以我决定影印此本流行于世,我这个意思,请你指教。

适 之 五十,二,廿四下午

顷得启明书局电话,说已寄给(友联社)一百份样张(空邮),又寄四百份(海邮)。

适 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林中行、邵幼轩夫妇**

中行先生、幼轩女士:

上星期承你们两位叮嘱我写几句话介绍你们的画展。这几天我几次想动笔,但到了今天,——半夜了,——还写不出来。这不是客气话,是实在的情形,根本原因是由于我实在不懂得画,所以不会谈画,更不会用文字评量画家的画。你们试看我给齐白石翁写的一本年谱,里面没有一句话论他的画。或评论他的刻印!朋友们常引为笑话,但我觉得这是古人说的“不知为不知”的意思。你们两位一定能够了解这意思,一定了解我半夜“交白卷”的苦恼。

你们的画展,我一定要来看。将来我还想多看画,也许可以学到一点点门径。

以上是一个外行人诉说他的真实困难,千万请你们俩原谅这回不能不交白卷了。

敬祝双安

胡适敬上 五十,二,廿四半夜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齐如山*

如山老兄:

自从府上一次畅谈之后,几个月之中,我又大病了一场,在台大医院住了五十天!年青人不健旺,定给老大哥笑煞!

这两天看了报纸上发表的贪污案,尤其是吕太太自杀的遗书,我常想到旧戏里的“四进士”。我早年看“四进士”,就觉得那本戏是一位懂得刑名法律的有心人编的,那是一本社会问题戏,其中提出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就是个人犯罪,往往非出于本心,往往是受了某种外力的逼迫。这个犯罪的社会(家庭)责任问题,中国人往往不注意。“四进士”一戏可贵在此。老大哥以为然否?

我曾访求“四进士”的全本戏文,但因循至今,未能访得。今天偶因吕志超太太遗书的刺激,我在医院里特别写此信请教于老大哥,不知老大哥有没有法子让我得读“四进士”的全本戏文吗?

匆匆敬问
大安,并祝 府上都安好。

小弟胡适敬之 五十年四月十六日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杨 白 衣^{**}

白衣先生:

谢谢你四月廿六日的信。

你的信使我十分高兴。诚如你说的,“中国的佛教早已走向歧路,剩下的只有美其名的骨头,而出家人咬定了它,硬要闭门造车!”我是不能了解印度思想的一个人;觉得我所以不能欣赏印度思想,怕是由于“先天的”的因素。例如美国哲人 William James 说的人有心硬与心软的不同,我大概是心硬的人,所以别人吃得下的东西,我往往吃不下。只因为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我不能不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史,不料我发掘出来的资料往往引起中国佛教界的抨击。我是受惯了四方八面抨击的人,所以我从不反驳,更不反驳那些太脆弱的抨击者。

但像你这样一位学佛的人而肯写这样坦白的信给我,我真感觉兴奋。我谢谢你给我的鼓励。这样鼓励在今日是不可多得的。

另包寄上有关《神会遗集》的两个抽印本,乞赐存。

胡适敬上 五十,五,十九

我没有认错你的大名吗?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李祖法*

祖法兄:

谢谢你五月廿九日的信。

芑均兄已见过几次。

祖莱已见过否?“劫”此画者是谁?何年“被劫”?

至今此画的新主人还不曾出面,故此画的“照片”流传在大陆上还传说是“李祖涵旧藏”,还说“此画已运香港”,或说“此画仍在收藏者之手,惟不肯示人耳”!因此,吴恩裕(北大政治系教授,近年始注意《红楼梦》掌故)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曾托人写信问祖韩,均未得覆。

祖韩所以不覆信,原因大致如你信上所说,及孤帆转述祖莱所说。祖莱说的是:祖韩“被劫时亦未摄影留存”(此画及画上的题咏)。

我疑心那“劫”画的人就是造作那三件伪证的人,①“旅云王冈写”一行字,②“南石”、“冈”两小印,③“壬午春三月”一行字。此三项,我在三十年前见祖韩此幅时,就没有看见。(我

绝不记得曾见此三事。)叶誉虎写信给我,也没有提及此三事。可能还有第④项伪证物,就是“幽篁图”或“独坐幽篁图”的标题。

我今夏去纽约,要把旧日记几十册带回来,我一定要翻出我当日记的话及叶誉虎的原信。

总而言之,原有的乾隆大名公八九人的题咏是永远要被埋葬或毁灭了。画上现在添出了这三四件有意作伪的题记及印章,而隐藏原题咏,与造作新题记及印章的责任,至今还由“上海李祖涵氏”负责!这是劫画的人所以至今还不出面的原因。你想我的看法对不对?

寄上一份我的小文,可以与祖莱看看。

适 之 一九六一,五,卅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李 孤 帆**

孤帆兄:

谢谢你五月卅日及六月一日的两封信。

祖莱肯为那幅画像再去函祖韩,我十分感谢。请你告诉祖莱,最要紧的是那些乾隆名人的题咏的全部,其次是“旅云王冈写”,“王冈的两个印章”,及“壬午春三月”,“独坐幽篁图”等四项是否原画上所有的题记。

我对此事颇不乐观，因为我怕祖韩至今还不愿意有人证实此画不是曹雪芹的小像。但我也盼望我的顾虑只是一种“过虑”。

关于独秀的遗文的收集，我盼望你能买到他的《文存》，我回到南港后，也可以设法寻一部《文存》来检查一遍，看看这书是收到何年为止的。我在十二年前作序印行的《独秀最后见解》，就是你记忆起的国际大饭店里江津某君交来的遗稿，——交来的并非全部。我还有《实庵自传》的第一章印本，以下似没有写成。我的意思是：仲甫的遗文是无法全部收集出版的，因为他做共产党时代的文字既无法搜全，也无法出版。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的。

关于“宗教史”的两件，我已托人查“借出”的人，当设法收回作 Microfilm 备你参考之用。

你收集的《红楼梦》的著作确实很丰富。六月一日信上开的书目使我歆羡！（我收的“程甲本”、“程乙本”都没有带出来。你的书目里的书，我大致都有。）但你的“红楼梦集评”计划，我觉得太广泛，太杂，不容易断制选择。你看见我的《甲戌脂砚斋重评本》影印本及我的长跋没有？香港预约的五百部，已寄出了，你若已预约了，你可以看看我的长跋，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你若没有预约，我当设法寄一部给你。

有许多文章是不值得收集的，如李辰冬、林语堂、赵冈、苏雪林……诸人的文字。“集评”一名，似也不甚妥。因为“集评”一名词不能包括这四十年中出来的原料，如故宫发现的曹寅父子三人一百多件密摺及朱批，——曹寅之妻李氏是李煦

妹，——如周汝昌的《棟亭图》四大卷的资料，如近年出现的雪芹的朋友的诗文集，如敦诚、敦敏诸人的诗之类，“集评”一名也不能包括四十年来出现的红楼本子，如我的“甲戌本”之类。

这个问题，你没有好好的想过，此时谈论不能畅达，似宜暂时先着手收集资料，下次再谈如何整理。

你不妨重读我的“红楼梦考证”，看我如何处理这个纷乱的问题。我在那时（四十年前）指出“红楼梦的新研究”只有两方面可以发展：一是作者问题，一是本子问题，四十年来“新学”的发展，还只是这两个问题的新资料的增加而已。

匆匆奉复，写得太长了，暂且打住了。敬祝
安

适 之 五十，六，五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苏 雪 林*

林：

谢谢你两次问病的信，谢谢你介绍两种药的好意。

某君既是治音韵学的，你似可以劝他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治语言学的董同龢、周法高两位先生通信请教，问他们如何利用史语所的设备与环境，如何可以请求

做所里的“助理研究员”，等等问题。

你也不可生气，作文写信都不可写生气的话。我们都不是年轻人了，应该约束自己，不可轻易发“正谊的火气”。

我曾观察王静安、孟心史两先生，他们治学方法何等谨严！但他们为了《水经注》的案子，都不免对戴东原动了“正谊的火气”，所以都不免陷入错误而不自觉。

何况此时此地写信发牢骚更是无益而有损的事？你难道不明白了？

祝你好

适 之 五十，七，廿四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赵 聪**

赵聪先生：

谢谢你六月廿四日的信。我从你此信里，和刘甫林兄的信里，摘引了几句话——赞扬《甲戌本石头记》的印制精工的话——写信去谢中央印制厂的主持人。他们收到了我致谢的信，听说很高兴。听说他们要在一个厂中同人的通讯刊物上发表我的信和你们赞许的话。我若收到那刊物，一定寄一份给你。

友联重印的《红楼梦》初版卖完，即将再版，我盼能得“再

版”一部。

我觉得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四册,其一二册是八十回校本,第三册全是校字记,第四册是后四十回,作为附录)在今日还是第一善本。你若没有细看,请你找来一校,便知此本真不愧为他三十年的功力的结果!可惜中共统治下的学人当然不敢颂赞平伯此书,自由世界的学人又很少人得见此本!

友联出版的《三国演义》,我已见到了,但没有细看。我觉得我的旧序那一段话还不失为公平的估计。谢谢你替我宣扬这一段文字。

你们是否有意重排《西游记》?

你看见我的“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胡适论学近著》,又台北版《胡适文存》第四集)是不是有点意思?

我近来又大病了一次,——急性肠炎,引起体中水分乏竭(dehydration),引起半天的血压太低,——现在才好了。

祝你们都好。

胡 适 五十,七,廿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李 孤 帆*

孤帆兄:

宗教史料两种的 microfilm 上周已寄出,收到时请告我,费用甚微,请你看作我的一件小礼物罢。

我对于你选印《独秀文存》的事,颇不热心。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来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因为那就需要我重读他的全部文字,而现在绝对无法搜集他的全部文字。第二,因为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很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我觉得你也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儒林外史》里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我在六月初曾想批评你寄我的“我的宗教生活”几页,匆匆写了一点意思,后来,我觉得太直爽了,就删了,没有寄给你。今天检出来看看,也许你可以了解我说你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的意思。请你不要怪我太直率。

祝你好

适 之 五十,八,廿八

(附)

谢谢你寄示自传目录及“宗教生活”一章。此章稍嫌引用议论过多,自述太少,但你保存了一个时代的有些有关宗教的辩论文字,自是有益的事。

五十二页叙述耶稣会初来华传教的一段,颇嫌太简略,又多错误。如云“在朝的徐光启、李之藻等率先奉教”,即是错的。徐光启与基督教徒传教士接触,远在他在广东教书的秀才时期,也受洗在他中进士之前。——

因为你是基督教徒，而明末耶稣会学人取得中国最高知识分子的崇敬，“泰西新法”的历法取得学术上的绝大胜利，这都是耶稣会史上最光荣的事，故我劝你多参考史籍，或请教于天主教学人，将此节改正。

你在此章里的许多论断也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一些幼稚左倾的党八股的影响，如页五六——五七的论断，是很幼稚的。

匆匆奉复，敬问

双安

适 之 五十，六，五

可读费赖之(Aloys Pfister)的《入华耶稣会士列传》
(商务)

罗光：《徐光启传》(香港公教真理学会)

《明史》的《历志》一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王 某**

王先生：

谢谢你四月廿六日及九月一日的信。

邱处机奉元太祖的召命，从出发之日到他到达成吉思汗

西征军中，共走了一万余里，费时四年。邱的弟子李志常记有西行的经历，题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三卷。

王国维先生有《长春真人西游记注》二卷，收在《王忠愍公遗书》的第三集。又石印的《王静安先生遗书》，也收有此书。

我很盼望你能看邱长春的《西游记》。

小说《西游记》与邱长春毫无关系，从一切道士妄说，都不足信。

我知道先生不会听我的忠告，所以我不敢回信。我现在很郑重的向先生说：先生屡次信上说的关于小说《西游记》的尊见，我完全不相信，也完全不敢赞同。以后请先生不必再写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了。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六一，九，三

* * 本函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李先闻夫妇*

先闻兄嫂：

谢谢你们送给我过中秋节的美艳的花！中秋过去了三天，还没有写信道谢，千万请恕罪！我在医院里，每天背诵一些宋人的词，其中有朱希真的一首，我要抄出来送给你们俩：

早起未梳头，
小园行遍，
拄杖穿花露犹沾。
菊篱瓜畹，
最喜引枝添蔓。
先生独自笑，
流莺见。
著意访寻幽香国艳，
千里移根未为远。
浅深相间，
最要四时长看，
群芳莫笑我，
归来晚。

我盼望你们喜欢这首词。

适 之 五十，九，廿七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苏 雪 林**

雪林：

谢谢你的信。

这回你来南港小住，使我得多见你几次，我很高兴。可惜我们没能多谈谈。

我劝你不要轻易写谈《红楼梦》的文字了。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适宜于做这种文字。

《作品》上的文字是赵冈写的，不是赵聪写的，你给我的信上说是“赵聪文”，难道我抓住了这一个误字，就可以写一篇文章说苏雪林如何如何吗？

同一封信里，你把董同龢作“董仲龢”，我抓住了第二个误字，难道又可以用作证据来证明什么吗？

赵冈先生是一位学经济的，他在几年前偶然对《红楼梦》发生兴趣，写了无数文字，越写越走上了一个牛角尖里去了。我也曾托人劝过他，他虽然不肯听，但他却真发愤搜集材料，搜集版本。他是很有耐心的，故能细心比较文字，有时有很可注意的发现。

你在这里小住的时候，我本想请你看看我的书房里现有的《红楼梦》版本：

甲戌脂本 存十六回

庚辰脂本 八十回本

戚蓼生本 八十回本

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这是一部最好的“汇校本”，单是“校字记”就有六百九十多页！

你连戚本都没有校过，又不曾比勘俞平伯的汇校本，千万不可用庚辰本的“别字，错字，及不通文句”来说，“当亦出于曹雪芹手笔”！你没有做过比勘本子的工夫，那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难道别本上的不“别”字，不“错”字，“通”的文句就不

“出于曹雪芹手笔”了吗？

不必听章君谷的话，你多挑一个题目写文字吧。办杂志的人叫你写《红楼梦》的文字，那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他不管苏雪林女士晚年目力与体力与耐心是否适宜于做这种需要平心静气的工夫而不可轻易发脾气的工作！

你听听老师的好心话吧！

适 之 五 十，十，四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10 册。

致 罗 家 伦^{*}

志希兄：

近日看见“三民主义研究所”编印的《五四运动论丛》一册（正中书局经销），其中有马璧先生的“救起中华民国垂危的文化”一篇，文里有这段话：

国父说过：“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七八）

中山先生这句话，我昨天翻张晓峰先生送的《国父全书》，竟寻不出。

《论丛》（一二三——一二九）又有许君武先生的“足感

篇”，其中有这一句话：

民国十年(国父)在桂林，则对苏俄代表马林明白声称，其革命思想之中心，乃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统。

中山先生对马林的谈话也不见于全书。

在我们南港，我们公认徐高阮先生研究中山先生的著作最多，最详。但他也不能够替我寻出马璧先生引的原文。所以我写信请你替我查查。我疑心马君引的可能就是对马林的桂林谈话。

你送我的那部袖珍本中山全集，此刻已在海船上运来，所以没有检阅。

这本《五四运动论丛》，你也应该读读。

敬问双安

适 之 五十，十，六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致 罗 家 伦**

志希兄：

昨函未发，徐高阮先生借来戴季陶先生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封面有你的题签，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小册子，其廿二页上有这一段话：

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接近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在这一点，我们可以承认中山先生是二千年以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去年有一个俄国的革命家去广东问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先生答复他说：“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那人不明白，再又问先生，先生仍旧把这一段话来答复。……

这还不够作前函的那一段话的来源。第一，这段话里没有说到“道统”。第二，这段话里说“至孔子而绝”，与前引“不绝”不同。第三，这也不是民国十年在桂林答马林的话；季陶先生此文是十四年写的，文中“去年”应是十三年。

还得请你查一查。

适 之 五十，十，七日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苏 雪 林*

雪林：

谢谢你的信。

你肯决定不写《红楼梦》的文章，我很高兴。

昨天院中布置双节展览“善本书”，要我的《脂砚斋石头

记》也参加。我因此翻看几个旧写本《红楼梦》与各种刻本、排本。我试举一两个例子，寄给你看看。

(1) 你试翻我的影印本八三页上六行“刘姥姥”下注：

“音老，出《谐声字笺》，称呼毕肖。”

又看八三页上七行，又下十行，又八五页下三行作“刘嫖嫖”，又八六页上五行，又上八行，皆作“刘嫖嫖”。八六页下四行，又下十一行同，又八七页下二行，下十一行，八八页上七行，下二行；又八九页下六行，又九十页下三行，九一页上十一行，也作“嫖嫖”。

我们看这一回（第六回）里，现行的印本把“刘姥姥”都改作“刘老老”，凡六十四次之多。而我的写本，作“姥姥”的四十七次，作“嫖嫖”的十七次。庚辰本一律作“姥姥”。看甲戌本的注语“嫖音老，出《谐声字笺》”，可知“嫖嫖”是最初写法，后来改“姥姥”，但改之不尽，还留下十七处作“嫖嫖”。原注的意思是说，此字读“老”音，但用于老女人，应写作“姥姥”。曹雪芹为这一个字，先用“嫖嫖”，后来依据《谐声字笺》改为“姥姥”。刻本改“姥姥”为“老老”，起于“程甲本”与“程乙本”，这两本活字排本，为了避免刻“嫖”字，一律改作“老老”，——这样一来，作者先作“嫖嫖”后改作“姥姥”的一番苦心，就完全看不出了。

(2) 你试翻我的影印本八五页下二行“进城逛去”，下注云：

音先去声，游也。出《谐声字笺》。

九五页下三行有“只管来徃徃，”

庚辰本，一一八页二行，作“进城旷去，”一三二页一行作

“只管来旷旷，”(庚辰本此回无脂批注)

程氏排本用“逛”字，以后南方刻本也都用“逛”字。

若没有甲戌本保存的“徯”字与原注文，我们就无从知道二百年前的作者为这一个俗字费的心血了。（先生在这一段信头上又写了：）“旷”字不是光去声，也没有游玩之义。“逛”字见于《康熙字典》，引《集韵》古况切，音逛，欺也。又《等韵》狂上声，《玉篇》走貌。

(3) 你试翻我的影印本八五页下六行：

刘姥姥便不敢进去，且弹弹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然后徯到角门前。（傍批“徯字神理”。）

又下八行：

刘姥姥只得徯上来，向“太爷们纳福！”

又九十页下五行：

方徯到这边屋内来。

这三个例子，庚辰本都改了：

(a)然后走到角门前。（程乙本作“溜”）

(b)只得蹭上来。（程乙本作“蹭”）

(c)方过这边屋里来。（程乙本作“方蹭到这边屋内”。）

再看南方刻本：

(a)然后蹲在角门前。

(b)只得挨上前来。

(c)方蹭到这边屋内。

你看了这一个“徯”字的历史，就可以明白二百年前的作者寻一个合乎活语言的字有多么大的困难！

看以上的三个俗字，——嫖(嫖)、徯、徯，——我们可以懂得古人用活语言作文学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曹雪芹这三个字，真费了一番苦心。然而稿本到了别人手里，这三个辛苦写定的字都轻轻的被人乱改换了！（“徯”字是《康熙字典》有的。）

你认得“漶”字吗？那是中古白话文字里的“呢？”字。

你认得“漶”字吗？那是“我们”“你们”的“们”字。

懂得一千年前或二三百年前古人造俗字的艰难，我们就不会轻易谈“白字”“别字”了。

以上几个例子也可以略表示甲戌本早于一切写本。

现在我可以谈谈“正义的火气”。

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容忍与自由”，就可以明白我所谓“正义的火气”是什么。

“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我在一九四六年北大开学典礼演说，曾引南宋哲人吕祖谦的话作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懂得这八个字深意，就不轻易动“正义的火气”，就不会轻易不容忍别人与我不同的意见了。

我当时引那八个字，在场的一千多人大概至多只有几个人懂得那八个字的重要性。次日各报登出我的演说，共产党就开始大攻击“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思想！他们懂得这八个字是一件很厉害的武器，是攻打一切教条主义的武器，所以他们不肯放松这种“危险”思想。

你说你“到了老年，火性始稍大。”我请你想想吕伯恭的那

八个字的哲学，也许可以收一点清凉的作用罢？

写的太长了，乞恕我老年人太啰唆！

适 之 五十，双十节夜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高宗武夫妇**

宗武、惟瑜：

谢谢你们十月十四日的信。

冬秀十八日平安到达，大家都很高兴。

从她口里，我才知道宗武兄病了一场。近来完全恢复健康了吗？年纪是不饶人的，我今年病了两次，才有一点点觉悟了；如今不比从前了，不可自逞好汉了。

话虽如此说，我时常还记着 Tennyson 的诗，——Ulysses——的最后几行。

Tho' Much is taken, much abides; and tho'
We are not now strength in old days
moved earth and heaven; that which are, we are;
One equal temper of heroic hearts,
Made weak by time and fate, but strong in will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虽然用去了不少，剩下的还多着哩。
虽然我们现在不是从前掀天动地的身手了，
今天我们有的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有的是平匀跳着的勇敢的心房，
——被时代和命运衰弱了一点儿，——
但是意志还是坚强的，去努力，
去追求，去寻找，——永不退却，不屈服。

这几句诗送给你们过年，好吗？

我印出的甲戌本《脂砚斋石头记》，用的是道林纸，太重，每部有两磅重，所以我没有敢多寄给海外的老朋友，今天寄一部给你们。季高来了，我送了他一部。张悦联太太有《读〈红楼梦〉杂记》，由他妹妹燕娟给我看，我也送了她一部。

你们若需要什么书，我盼望你们不要客气，告诉我，我很高兴替你们寄去。

祝你们健康快乐！

适 之 一九六一，十，廿五

冬秀昨天住在台北，今天还没有回南港。
李干来了，已见到了，他太太还在香港。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翁燕娟*

燕娟：

谢谢你十月十六日的信。

《石头记》我只留了一百部，因为纸张太重，国外寄的很少。太太来信说要五六部送朋友，我只寄了三部去，——其一部就是大姐一晚上读到五点的一部！

你说的“计划写一部自传式的长篇散文或小说”，我听了很高兴，我今天寄我的《四十自述》给你。《自述》的第一篇是小说体，写我母亲的订婚，这一篇是 Yale 大学加上注释，用作中文课本的。我本想挑出十来个题目，照样写短篇小说的形式。但那是很难的文学工作，我的历史训练终于战胜了，第二篇以下就不用小说体了。我的成功与失败，也许可以供你的参考。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你不要客气，老实告诉我，我劝你放胆写，不要怕“牵扯许多熟人”，——也不要怕爸爸生气。

匆匆敬祝你和宪秋好。

适 之 五十，十，廿五

我认识你爸爸多年，我最奇怪的是他做一个机关首长，总不能得他手下人的爱戴，后来做了大官，我总听见人家说他“官派”太大，天天大骂下属，许多老朋友还不

免。张丽门就天天挨大骂的一个。所以我很知道关于你爸爸的心理分析与历史分析。

适 之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复 赵 聪**

赵聪先生：

谢谢你十月廿三日的信。

再版的《红楼梦》，日内当可收到，敬此预谢。

严明先生一文已看了，他另有信给我，我还没有答他。（我若回答严明，定可寄副本给你。）《作品》最近一期也有赵冈先生的一篇长文。近来我颇忙，——忙于解答一些新发现的小问题或大问题，——很有兴趣，但因此没有多大工夫做辩论的文字。

《人民文学》发表的《鲁迅传》戏本，我尚未看见，中共恶诋我和我的师友，我见惯了，看作当然应该有的“戏文”，只觉得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未免有点好笑。前些时（一九五七）我还曾搜集这一类“清算胡适的幽灵”的出版品，居然收集了一大堆。近年来，连这点兴趣也没有了，——原因只是嫌“板眼太死，腔调太陈旧了”。

你在《祖国周刊》上反驳《鲁迅传》的文字，倘蒙赐我一份，

我最感谢。《祖国》往往收不到，故有此请。

《西游记》的两个问题，我都没有意见，因为我写“西游记考证”的时候，此书的许多版本还没有出现，我见的版本太少，不配谈版本问题。《胡适论学近著》里曾收“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短文，——台北版《胡适文存》四集原想把此篇删去的，因为我用的《西游记》是嘉庆年间的本子。后来此文保存了，我至今引为遗憾。此文最可表示我所见《西游记》版本的贫乏。所以我很望你的序文早日写成，盼望你能在序文里叙述最近三十多年里从日本、欧洲，及国内发见的《西游记》各种版本总目录及其历史的沿革。

我的“八十一难”是一篇玩世的试作，原不是准备附印在旧本之后的。我最赏识《西游记》的诙谐风趣，……这是中共骂我的一点，——所以我写“八十一难”时，原想写一篇诙谐文字开开那些“要吃胡适之的肉的人们”玩笑。不料我写下去态度变严肃了，竟写成了一篇宣传“无量慈”的传教文字！所以你的重印本不附录此篇最好。

匆匆敬谢存问内人的厚意，并祝平安，并乞问友联诸友安好。

适 之 五十，十，廿五

你平时用什么表字(号)? 乞见告。 适之
韩镜塘先生影印的“程乙本”第一套(尚有三套续出)，今寄赠一部。 适之

* * 本函最初见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附 录

胡适简明年谱

胡适：(1891—1962)，字适之，行名洪驊，乳名嗣糜，别号自胜生、铁儿、藏晖等。安徽省绩溪县八都上庄人。
谱系：上庄“明经胡氏”第四十二世孙。

祖父：胡禎錡(律均、奎熙，1822—1873)

父：胡 传(祥蛟、守珊、铁花，1841—1895)

母：冯顺弟(1873—1918)

兄：胡洪骏(嗣稼、耕云，1871—1915)

洪雅(嗣柜、觉、绍之，1877—1929)

洪駟(嗣桤、振之，1877—1904)

姐：胡大菊(织儿，1866—1915)

细菊(緻菊，1868—?)

幼菊(金菊，1876—?)

妻：江冬秀(1890—1975)

子女：胡思祖(祖望，1919—)

素斐(1920—1925)

思杜(1921—1957)

孙：胡 复(1955—)

1891年 1岁

12月17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父胡传时任淞沪各厘卡局总巡。

1892年 2岁

3月20日 胡传被台湾巡抚邵友濂奏调台湾。胡适母子移居上海浦东川沙。

1893年 3岁

4月12日 在四叔胡玠的带领下与母亲、二哥、三哥渡海到台湾,在胡传当官的台南道署住了九个月零十一天。

6月17日 胡传调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各营,29日启行赴任。

1894年 4岁

1月20日 胡适母子也搬迁到台东胡传任所。——三口小家庭在台东又度过一年零十八天的团聚生活。这期间认了700多字——父亲是胡适的最初的启蒙教师。

1895年 5岁

2月7日 因中日战局紧张,胡适母子随四叔启程经台南内渡,21日到上海。

3月6日 随母亲从上海启程返回家乡——安徽绩溪县八都上庄。

4月17日 “马关条约”签字,台湾割让给日本,北京朝廷电令台湾文武官员“内渡”。

6月25日 胡传撤离台东。8月15日由台南安平港内渡,18日抵厦门。病躯不支,苟延至22日凌晨逝世。

是年春 胡适入家塾读书,开始了他“九年的家乡教育”。最早的两种启蒙课本即是父亲著的《学为人诗》与《原学》。

1896 年 6 岁

在家塾读书。

1897 年 7 岁

在家塾读书。

1898 年 8 岁

在家塾读书。

1899 年 9 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白话小说，“不知不觉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四十自述》）

1900 年 10 岁

仍在家塾读书。

1901 年 11 岁

仍在家塾读书。读朱熹《小学》中引司马光《家训》论地狱的话，读《资治通鉴》中引范缜《神灭论》的话，受到无神论思想的巨大影响。开始阅读《纲鉴易知录》、《御批通鉴辑览》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并尝试编撰《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胡适后来说：“这也可算是我的‘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四十自述》）

是年 胡适母亲试着与二哥、三哥讨论送胡适出门念书的事，未果。

1902 年 12 岁

仍在家塾读书。开始读《尚书》、《周易》、《诗经》等“经典”作品，小说也读到了《聊斋志异》、《虞初新志》的程度，并已能对本家姊妹讲说“聊斋”故事了。

1903 年 13 岁

仍在家塾读书。无神论思想酝酿成熟,是年正月,几乎发生打毁神像,“把这几个烂泥菩萨拆下来抛到毛厕里去”的革命行动。(《四十自述》)

1904年 14岁

是年春 结束九年的家乡教育,赴上海求新知。出门前夕,由双方母亲包办,与旌德县江村江冬秀订立了婚约。

离开家乡时他已读完“四书”和“五经”中的四经,还读了《律诗六钞》、《孝经》、《小学》、《幼学琼林》以及《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等史书。在文字和思想方面均打下了较好的底子。

胡适到上海后即进入张焕纶创办的梅溪学堂,课程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在差不多是最低的第五班读了六周,即连升三班,进入了第二班。原因是他在课堂上纠正了国文老师的一个错误——错把《易经》的《系辞传》当作了《左传》——梅溪学堂偏重国文,分班以国文程度作标准。

在梅溪学堂,胡适接触到了梁启超的言论著述,也读到了最富煽动性的革命宣传品——邹容的《革命军》,思想上种下了革命的种子。这点革命的种子使他与同学一齐写匿名信痛骂上海道袁海观,并因拒绝到上海道衙门考试而离开了梅溪学堂。

是年春 三哥洪骝病死上海。

1905年 15岁

春 进澄衷学堂。初编在第五班,下半年升入第三班。在澄衷,胡适的英文、算学进步很大,月考,大考,“常常在第一位”。(《四十自述》)

是年 阅读大量新潮书刊,如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时报》。胡适后来说:“《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四十自述》)——后者还诱发了胡适将来要做《中国哲学史》的野心。

是年 “胡适”的名字正式诞生——胡适接受二哥的建议,取名“胡适”,字“适之”。——后来发表文字偶尔用“胡适”作笔名,直到考试留美官费时(1910年)才正式用“胡适”作姓名。

1906年 16岁

春 升入第二班,并且当了班长。

命题作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是目前存世胡适最早的一篇文章,长期为澄衷学堂珍藏档案。此文大可窥见胡适当时的思想与文字的水平:

今日之世界,——强权之世界也。人亦有言,天下岂有公理哉!黑铁耳!赤血耳!又曰公法者,对于平等之国而生者也。呜呼,吾国民闻之,其有投袂奋兴者乎。

国魂丧尽兵魂空,兵不能竞也;政治、学术,西来是仿,学不能竞也;国债垒垒,人为债主而我为借债者,财不能竞也;以劣败之地位资格,处天演潮流之中,既不足以赤血黑铁与他族角逐,又不能折冲樽俎战胜庙堂,如是而欲他族不以不平等相待,不渐渍以底于灭亡,亦难矣。

上半年 胡适还在澄衷学堂作了《论性》的讲演，阐发了人性本无善恶，可善可恶的观点，这是有记录的胡适第一次学术讲演。

上半年 因学校开除一名同学，出面与校方交涉，竟受悬牌记大过处分，愤而离开澄衷。

暑假后 胡适考入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是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后愤而回国的留日学生自行创办的一所新校，本年春刚开始招生开课。——学校中多革命党人，也弥漫着浓重的革命思想与新潮气氛，行政管理上也试行着“一种民主政治的制度”。

入校不久，胡适即加入学校内“竞业学会”组织。此学会宗旨是：“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相濯磨”，“专以养成高尚人格为目的”。学会正创办刊物《竞业旬报》，标榜“振兴教育，提倡民气，改良社会，主张自治”。胡适应邀为《竞业旬报》撰写文章，创刊号上即刊载了胡适平生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地理学》，这也是他第一篇用白话写的文章。

本年 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的文字还有《敬告中国的女子》、《说雨》、《真如岛》（长篇连载章回小说，未完）、《毅斋杂译》。

冬 得脚气病，告假医病。养病期间对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古体歌行发生了浓厚兴趣，阅读了从《古诗十九首》、《木兰辞》到陶潜、杜甫、白居易等大量的诗，并开始尝试自己写古诗。

1907年 17岁

新春正月 游览苏州，四月与中国公学全体同学旅游杭

州,均有纪游诗;游万国赛珍会、观爱国女校运动会,均有纪事诗。《观爱国女校运动会纪之以诗》后载1908年5月20日出版的《竞业旬报》第15期,是胡适生平第一首公开发表的诗歌。

夏 脚气病又发,回绩溪老家养病两个月。更加沉溺于读诗与做诗,主要诗作有《弃父行》、《西台行》等。在家乡与朋友胡近仁切磋诗艺过从甚密。返沪前又有赠胡近仁诗多篇。——返校后诗名鹊起,与老师、同学多有唱和,得“少年诗人”称誉。

是年 女革命家秋瑾遇害,胡适做《题秋女士遗影》诗表达了深沉的悼念与敬意。

1908年 18岁

8月17日 出版的《竞业旬报》第24期由胡适担任主编,直至第38期(1909年元月2日出版)。这期间胡适发表了大量文字,并且几乎包揽了全部的“社说”和“时闻”栏目。主要文章有:《姚烈士传》(刊载于16—23期间)、《婚姻篇》、《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无鬼丛话》、《论家庭教育》、《世界第一女杰贞德传》、《东洋车夫》、《论毁除神佛》、《中国的政府》、《读爱国二童子传》、《论承继之不近人情》、《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革命党的好口供》、《爱国》、《独立》、《苟且》、《对于中国公学风潮之感言》、《中国人之大耻》、《本报周年之大纪念》、《曹大家〈女诫〉驳议》等。

9月 中国公学为修改校章事引发风潮,校方董事会及执事者与民主自治色彩浓厚的校评议部和执行部发生矛盾冲突。10月3日校方开除闹风潮的学生,学生一百六十多名集

体退学,以示抗议并积极另组“中国新公学”。胡适最初没有参与两方的争执,“到了风潮正激烈的时期,我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虽然不在被开除之列,也在退学之中。”(《四十自述》)——胡适积极参与了退学和另组“中国新公学”的斗争,并在艰苦的条件下接受了“中国新公学”教员的聘约,开始了最初的教师生涯。胡适每天教六个小时的英文,还要批改作文卷子。他的最初的一批学生中有饶毓泰,杨杏佛、张奚若等人。

本年中胡适主要诗作有《口号》、《沁园春·春游》、《先三兄第四周年忌辰追哭》、《赠鲁楚玉》、《秋日梦返故居》、《追哭先外祖》、《赠同学古绍宾君》、《赠别汤保民》、《秋柳》、《慰李莘伯被火》、《寄邓佛衷日本》、《电车词》等。本年开始有译诗,如《六百男儿行》、《军人梦》、《缝衣歌》、《惊涛篇》等。

1909年 19岁

1月2日《竞业旬报》第38期出版后,胡适“大病数十日,几濒于死”。1月22日《竞业旬报》第40期上刊登《铁儿启事》,胡适称自己“病后弱质,殊不胜繁剧,《旬报》撰述之任现已谢去,后此一切,概非鄙人所与闻”。——《铁儿启事》刊出后,《竞业旬报》只出了一期(第41期)便停刊了。《竞业旬报》可以说是胡适“思想之胚芽,文笔之摇篮”,胡适感怀于《竞业旬报》的最大得益是训练了文字,整理了思想,日后胡适许多文字与思想萌芽于此,嚆矢于此。另一层重要得益是胡适在《竞业旬报》期间养成了独立思考、大胆说话、自由表达意见的习惯,这个习惯是胡适在以后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一刻也未曾忘怀,一刻也未曾放弃的。

11月13日 中国新公学在现实困窘的压力与老公学的利诱下屈服,同意与老公学合并。胡适与其他一些不愿合并回去的教员学生退出学校,另谋出路。

本年 诗歌创作甚为高产,主要有《赠别古仲熙旧粤》、《赠别怡荪旧娶》、《赠意君》、《酒醒》、《纪梦》、《闰月六日中国新公学全体合影》、《菊部四律》、《送二兄入都》、《登楼》、《十月题中国新公学教员合影》、《题谢尹文之孝赵建藩三君合影诗》、《十月再题中国新公学合影时公学将解散》、《己见一律》、《读〈儒林外史〉》、《和德贞见寄》等。

1910年 20岁

2月9日 旧历己酉除夕。百无聊赖之际作《岁暮杂感》,有“客里残年尽,严寒透画帘”、“壮志随年逝,乡思逐岁添”之句,寄寓了身世困顿、前途渺茫的哀愁。

2月28日 由王云五推荐至华童公学教授国文。

3月22日 夜饮大醉,归途神智朦胧,与巡捕厮打,被拘执警厅一夜,并罚款。醒来后疚愧交加,发誓振作。“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我已经过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转机。”(《四十自述》)——当日辞去华童公学教职。从此立定心志,闭门读书。开始为第二期“庚款”留美官费考试作准备。

4月至6月 胡适决定赴北京应考,积极复习功课,并谋划经济资助。

6月28日 在二哥绍之的陪同下登轮北上经天津进北京。

7月3日 到北京,又作了半个多月的考前准备。

7月下旬 参加考试。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

文。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自称是“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结果竟得一百分。英文考六十分。头场平均八十分，取了第10名。第二场考各种科学，本来就是弱项，大都临时抱佛脚准备起来的，“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高分拉着，最后得了第五十五名。——录取名额七十名，“很接近榜尾了。”（《四十自述》）

8月16日 胡适在上海登海轮赴美国——横越太平洋，经加拿大温哥华再坐火车进入美国。“金风正萧瑟”，“褰裳渡重海”，胡适心潮激涌，感慨万千，在船上写下了两首《去国行》，寄托了“从兹万里役”，既迷惘畏疑又瞻瞩欣喜的复杂心情。

9月上旬 胡适进了美国纽约州绮色佳城(Ithaca)的著名学府康乃尔大学。选学农科。

1911年 21岁

在康乃尔大学农科(农学院)学习。

1月30日 胡适留学的日记从今日起一直记到1917年7月回到上海(中间有断阙，有遗失)，共十七卷，最初用《藏晖室札记》为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1939年)。后来改题《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47年)。胡适后来称这部日记为“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

4月13日 读《诗经》之《召南》、《邶风》诸札，深感汉儒解经之谬，日记中称：“汉儒寻章摘句，天趣尽湮，安可言诗？而数千年来率因其说，坐令千古至文，尽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读诗，推翻《毛传》，唾弃《郑笺》，土苴《孔疏》，一以己意为造《今笺新注》，自信此笺写成，当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

不朽，非自夸也。”是年作有《适庵说诗杂记》草稿，又指斥汉儒穿凿附会，支离破碎，真趣都失。宋儒注诗，“附会史事之处，大率都仍其旧”，故他主张“当以二十世纪之眼光读之”，把《诗经》当诗读，勿作经读，“须唾弃《小序》，土苴《毛传》，掊击《郑笺》”。又作有《诗三百篇言字解》，是胡适《诗经》研究的一篇重要文字，也是胡适国学研究的第一篇重要文章。（刊载1913年1月《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后又收入1921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文存》一集卷二。）

6月13日 参加中国基督教学生会夏令营，游享可诺松林(Pocono Pines)。在这次基督教气氛极浓郁的夏令营中，胡适曾受到强烈感染。但后来明白了“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的真情之后，又生起一种“反动”，“深恨其玩这种把戏”。（《留学日记》卷一）

9月3日 写成《康南耳传》。

1912年 22岁

春 弃农学文，入文学院读书，主修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梅光迪致信称胡适转科为“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认为胡适“乃稼轩、同甫之流”。

9月29日 译法国都德小说《割地》（即《最后一课》），刊载于上海《大共和日报》。此是胡适第一篇翻译小说的公开发表，后收入《短篇小说》一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出版）。

1913年 23岁

1月 在《留美学生年报》（第二年本）上发表《赔款小史》。

5月 被选为康乃尔大学世界学生会会长，任期一年。

7月1日至3日 在《大共和日报》上发表《美国政党概论》。

1914年 24岁

1月25日 日记：“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归纳的理论，

二曰历史的眼光，

三曰进化的观念。

余近年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又曰：“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

二，致用哲学。

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留学日记》卷三）

1月 在《留美学生年报》（第三年本）发表重要论文《非留学篇》（上、中、下）。文中关于留学生的时代职责有如下描述：

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
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
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之神药，乞医国之金
丹，然后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
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

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混合之新文明。

2月3日 译英国诗人裴伦(Byron)《哀希腊歌》。——此为胡适重要译诗，后收入《尝试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出版)

5月7日 《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一文得康乃尔大学“卜朗吟征文”奖，获美金50元。“校中诧为创见，报章著为评论”，一时在绮色佳城名声飞扬。9日日记中称：“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留学日记》卷四)

6月17日 参加康乃尔大学毕业典礼。——胡适去年夏天即修完本科毕业所需课业学分，但大学有规定，必须在校修业居留八个学期方可毕业。故延至2月始得学位，今日才与全体毕业生同行毕业仪式。——其在本科毕业后，留校继续读研究生课程。

12月 作《睡美人歌》，此诗为胡适留美七年思想文化成熟定型的重要记录。诗云：

东方绝代姿，百年久浓睡。
一朝西风起，穿帟侵玉臂。
碧海扬洪波，红楼醒佳丽。
芳年时世装，长袖高螺髻。
可怜梦回日，一一与世戾。
画眉异深浅，出门受讪刺。
殷勤遣群侍，买珠入城市。
东市易官衣，西市问新制。

归来奉佳人，百倍旧姝媚。

装成齐起舞，“主君寿百岁！”

1915年 25岁

1月至9月 继续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主修哲学研究生课程。

3月 留美学生因抗议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群情激愤，纷纷集会，“或发急电，或作长函，或痛哭而陈词，或慷慨而自杀”。胡适认为，中国学子的大患在于不肯深思远虑，平日一无预备，外患一来，则惊扰无措。“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留学日记》卷九）3月19日在《致留学界公函》中又强调“我们的职责是读书”，不能让这些纷扰耽误了读书的主要任务。

7月 暑假，开始考虑转校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

8月2日 为《科学》杂志作《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创列十种文字标点符号，并在自己文章中身体力行。是为1919年《请颁行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的蓝本。

9月17日 作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

9月20日 作《戏和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又提出“诗国革命”的口号。同日离开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转学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研究哲学。

10月6日 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致信胡适，请他为上月创刊的《青年》杂志撰稿，并告诉他《青年》杂志主撰为皖人陈独秀。

12月13日 汪孟邹再次致信为《青年》杂志催稿,称:
“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

1916年 26岁

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

4月5日 作札记《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此文标志着胡适对“文学革命”开始“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即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学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代替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

4月13日 作词《沁园春·誓诗》,有句:“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褰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6月7日 作《尔汝篇》。载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

7月22日 作诗《答梅觐庄——白话诗》,这是一首论证“二十世纪的活字,胜于三千年的死字”的著名白话论战诗篇,载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2号。

9月1日 作《吾我篇》,载1917年3月《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1号。同日所译短篇小说《决斗》(俄国泰来夏甫作)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表。——这是《新青年》杂志上第一篇白话文学作品。

11月 作《文学改良刍议》,载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文中提出了文学改良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

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这八事的核心意见便是文学必须采用革命性的文体——白话文。文章又强调文学必须有情感，有思想。这篇文章被文学史家称为“文学革命发难的信号”（郑振铎语），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第一声春雷。陈独秀称之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在紧接着出版的第2卷第6号《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以为声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他自称“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为之他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呼应配合。

1917年 27岁

3月 俄国发生“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胡适大为感奋，作《沁园春·新俄万岁》词。3月21日初写，4月17日完成。

4月16日 撰成《诸子不出于王宫论》，载1917年10月15日《太平洋》第1卷第7号。

4月 完成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此文写了九个月。——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时题为《先秦名学史》（英文）。

5月1日 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5月22日 接受博士学位的最后防卫口试（答辩口试）。上年（1916年）已通过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初试的笔试与口试，获博士候选人资格。防卫口试结果，博士论文通过，但需修改

后上交一百册附本备档,才可参加博士头衔授予仪式。胡适没有按要求修改论文,样册一百本也没交。因此,博文论文虽然通过了,受衔仪式则一直拖到1927年才补办——交上一百册没有修改的论文样册,注册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受衔仪式是在杜威本人请求劝说和主持下近乎陪礼道歉的情景中补办的。

6月9日 离纽约,经加拿大、日本回国。

7月10日 到上海。在上海停留期间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中国文化学术的落后使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

7月27日 回到绩溪上庄故里,与相别十年的母亲团聚。但因家乡风俗,没能见着江冬秀,约定冬季归娶。

9月10日 到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应蔡元培、陈独秀之聘约来北大当教授是是年1月中旬拍定的。

9月21日 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典礼上,胡适作《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的讲演。开学后讲授英文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科目;每周12学时,月薪280元大洋。

12月 创办北京大学哲学研究所,自任主任,开始哲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同时兼英文科的教授会主任。是年又担任了新成立的校评议会评议员和新创办的《北京大学日刊》编辑。

12月13日 启程回绩溪。12月30日与江冬秀完婚,新婚期间作有《新婚杂诗》五首。

是年 主要诗作有《朋友篇·寄怡荪经农》、《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觀庄》、《百字令》、《鸽子》、《人力车夫》和《老鸦》。重要信札有《寄陈独秀》、《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答钱玄同》等。

1918年 28岁

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担任课程有中国名学、英文高等修辞学、中国哲学史、西洋哲学史等。

1月 从安徽绩溪回到北京。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发表《归国杂感》。同时《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成立编委会。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主持编辑工作,主要撰稿人还有鲁迅、周作人、张慰慈、陶孟和、刘半农等。

3月15日 在北大国文研究所小说科讲演《论短篇小说》,傅斯年记录稿先刊载于《北京大学日刊》,后经胡适修改补充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号。

4月15日 在《新青年》第4卷第4号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文学改良八事概括为四句话: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又提出建设的新文学论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6月15日 《新青年》4卷6号为“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抽译出易卜生主义的三句名言: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二,“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三,“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

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核心精神就是由这三句话生发的，这个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玩偶之家》主角)，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国民公敌》主角)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要为社会造出无数爱自由胜过于爱面包，爱真理胜过于爱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为今日的文明世界奠定基础。

6月 妻子江冬秀从绩溪来京定居。

7月 发表《贞操问题》(《新青年》5卷1号)，是为社会伦理革新的先声。

10月 发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新青年》5卷4号)。文章有三层内涵：一，文学乃是人类生活状态的一种记载，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二，文学包括艺术的戏剧是慢慢进化的，有时会停步不前。一旦与别种文艺相接触，受了影响，吸收长处，又会继续进步。三，西洋戏剧可作中国戏剧直接比较参考的材料，“采用西洋最近百年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11月23日 乘天津南开学校讲演之便，拜访梁启超。谈了新诗与墨学的一些问题。

11月24日 接到绩溪拍来的急电，告母亲冯顺弟前一日病歿。25日即携眷星夜奔丧，12月1日抵绩溪上庄。有《奔丧到家》诗，寄寓无尽哀思。(《每周评论》第1号)

12月22日 《每周评论》创刊，在创办人陈独秀、李大钊邀约下，答应担任撰稿人。

1919年 29岁

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1月1日 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汪敬熙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胡适担任主要顾问。《新潮》是五四时期《新青年》最重要的姐妹刊物，《新潮》同人大多成为胡适思想文化路线的追随者。

2月15日 发表《不朽——我的宗教》（《新青年》6卷2号），此文与《易卜生主义》以及后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同为代表胡适“人生观”与胡适“宗教”的重要文章。其主旨为：“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对于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未来，也须负重大的责任。”——“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的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

2月 《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蔡元培为之作序。——这是胡适的一部划时代的开山之作，影响巨大且深远，不到二个月即再版，1922年8月已出至第八版。青年学子几乎人手一册。胡适自己认为此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蔡元培序，称此书有四大优长：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在这书的“导言”中胡适以赫胥黎的怀疑论与杜威的实验术为理论的经纬，结合当时西方哲学，历史学，逻辑学，校勘学的方法论对以清代乾嘉考据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方法作了一次有系统的整理，他正是以这个系统整理后的中西学结合的新方法、新眼光、新手段，对待上古先秦的

哲学遗产,终于理出了一个清晰简核的头绪来,使国中的哲学学者和莘莘学子摸到了“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

3月15日 发表独幕话剧剧本《终身大事》(《新青年》6卷3号)。这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个话剧剧本,标志着中国现代戏剧史的启幕。

3月16日 长子祖望(思祖)生。

3月22日 撰《少年中国之精神》,载《少年中国》杂志创刊号。

3月 发表《〈墨子·小取〉篇新诂》(《北京大学月刊》第3期)。

4月 发表《实验主义》(《新青年》6卷4号)。此文约三万字,是介绍实验主义哲学源流的重要文章。

4月30日 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访问讲学,并担任翻译,全程陪同。

5月2日 在江苏教育会讲演,介绍杜威思想哲学。本月还撰述、发表《杜威哲学的根本观念》、《杜威的教育哲学》(《新教育》1卷3期)和《杜威论思想》(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5月4日 北京爆发五四运动。5月7日,胡适在上海参加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国民大会,并跟随大队人马游行。

5月初 在上海拜访孙中山先生,孙中山与他谈论“知易行难”哲学。

6月11日 陈独秀被捕,胡适作诗《威权》表达愤慨。23日,胡适接办《每周评论》(第28号起)。

7月9日 发表《论大学学制》(《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7月20日 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此文很快引起争议,争论文章主要有蓝志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的《问题与主义》(又转载《每周评论》第33号)和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致胡适的信)。——两文明确表示不赞成胡适的意见。

7月27日 发表小说《一个问题》(《每周评论》第32号)。这是胡适生平唯一发表的现代短篇小说。

8月16日 撰《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提出“为真理而求真理”的学术态度与批评标准,及“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的名言。

8月24日 在《新生活》杂志创刊号上专门发表《新生活》一文,以为该刊宗旨。

同日 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

8月31日 发表《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7号)。前一日北京警察厅查封了《每周评论》,37号的《每周评论》实际上便是终刊号。

10月10日 发表《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星期评论》纪念“双十”专号)。

10月15日 发表《大学开女禁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4期)。

11月1日 发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新青年》6卷6号)。

12月1日 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提出新文化运动的四大任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前三个任务汇集到一个方向、一个目标,

便是“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目的即是为了重建中国文明，为了中国走向“现代”，为了“现代中国”走向世界。

是年 亚东图书馆初版胡适译《短篇小说》第1集。

是年 胡适的主要诗歌有《应该》、《送任叔永回四川》、《一颗星儿》、《我的儿子》、《乐观》、《上山》、《一颗遭劫的星》等。

1920年 30岁

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1月15日 毛泽东来访，谈湖南政治、文化及青年运动的方向。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再次提出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时代任务，并强调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是“一尺一步”的改造。

3月 亚东图书馆出版《尝试集》，这是中国新诗第一本个人诗集，标志着白话新诗的“成立”，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块重要里程碑。

3月24日 撰《中学国文的教授》（载《新青年》8卷1号）。

5月4日 与蒋梦麟在《晨报》的“五四纪念增刊”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提出校园为中心的学生活动是最能持久又最有功效的学生运动。

5月26日—29日 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研究社会问题底方法》。

6月 从南池子缎库后身胡同迁家至后门里钟鼓寺14

号。

7月9日 毛泽东有明信片寄胡适,告知湖南驱张后,气象一新,教育界尤有蓬勃生气,希望胡适对湖南革新多加关注,期盼有所借重。

7月27日 撰成《〈水浒传〉考证》,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说考证文字,后收入《胡适文存》一集卷3。

8月1日 与蒋梦麟、陶孟和、王徵、张慰慈、李大钊、高一涵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指出“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故而专门宣言,提出四种最基本的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书信秘密自由,政府不得在宪法之外另立种种限制。

8月16日 女儿素斐生。

9月20日 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普及与提高》的讲演,鼓励北大师生努力学术的“提高”与“创造”,不要堕入浅薄的“普及”即流行的“新名词运动”中去。

9月 《尝试集》再版,篇目上较初版有所增删。

12月 关于《新青年》前途事,写信答复陈独秀,提出三条办法:一,另办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将《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发表宣言不再谈政治;三,停办。

是年 主要诗歌有《示威》、《五月二十三夜自西城回新屋》、《纪梦》、《戏代慰慈作》、《蔚蓝的天上》、《追悼许怡荪》、《外交》、《一笑》、《我们三个朋友》、《湖上》、《艺术》、《例外》、《梦与诗》、《十一月二十四夜》、《究竟死的是谁的老子》、《我们

的双生日——赠冬秀》等——这是胡适诗歌创作的高产年。

1921年 31岁

1月22日 致信《新青年》北京同人，提出办刊修正方案：取消“停办”，也暂不“另办”，放弃“宣言不谈政治”，只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

1月28日 致信顾颉刚——开始与他讨论古史辨伪的工程设计。此函自述古史观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至于东周以下的史料，亦须严密评判，“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古史辨》第一册）

2月22日 撰《发起〈读书杂志〉的缘起》，载4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后刊1922年9月3日第1期《读书杂志》（《努力周报》增刊）作为“发刊词”，号召“大家少说点空话，多读点好书。”

3月 休假养病。这期间作《章实斋年谱》。又撰成《红楼梦考证》初稿。

4月至10月 为修改、充实《〈红楼梦〉考证》，与俞平伯、顾颉刚两人频繁通信，讨论《红楼梦》有关问题。

5月4日 在《晨报》发表《黄梨洲论学生运动》。

6月20日、21日 在《晨报》发表《〈吴虞文录〉序》，称赞吴虞为“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7月10日 杜威将归国，在《东方杂志》（18卷13号）上发表《杜威先生与中国》，大力宣传杜威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

7月—8月 在《新青年》(9卷3、4号)上发表《国语文法的研究法》。此文与前此的《国语与国语文法》、《国语的进化》合成《国语文法概论》，这是《马氏文通》后研究中国语文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8月4日 发表《研究国故的方法》(《民国日报·觉悟》副刊)。

8月14日 在国语专修学校讲演《好政府主义》。10月22日又到中国大学讲演《好政府主义》。11月17日至18日又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好政府主义》文字稿。

10月10日 在《时报》上发表《十七年的回顾》，盛赞《时报》创刊之初的办刊方针与新闻业绩。同日，又在《晨报》发表《双十节的鬼歌》的诗，有“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等诗句。

11月3日 写定《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第八章“总结”，概括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

11月12日 改定《〈红楼梦〉考证》。这篇文章是胡适第一篇也是最重要的“红学”研究成果。标志着“新红学”的诞生。对“红学”的兴趣与钻攻持续了胡适的一生。

11月19日 为《胡适文存》一集撰写“序例”。12月《胡适文存》一集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2月17日 次子思杜生。

是年 主要诗歌有《醉与爱》、《平民学校校歌》、《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死者》、《一个哲学家》、《希望》、《晨星篇》等。

1922年 32岁

1月 《学衡》杂志在南京创刊，以反对新文化运动为宗旨。创刊号上即有胡先骕攻击《尝试集》的文章，2月4日胡适作诗《题〈学衡〉》以示回击。

2月 发表《对于新学制的感想》（《新教育》4卷2期）。

4月19日 美国提倡生育节制的山格夫人接受胡适的邀请来北京大学讲演，胡适担任口译并代拟《校长启事》，预为宣传，扩大影响。

5月7日 《努力周报》创刊，胡适担任主编。在创刊号上作《努力歌》，鼓动“努力”的宗旨。

5月11日 拟定《我们的政治主张》，得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汤尔和、陶孟和、丁文江等16人赞同签名，发表于《努力周报》第2号上。——这是胡适谈政治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他改良政治，建立“好政府”的第一个具体纲领。

5月30日 入清宫见溥仪。

6月18日 在《努力周报》第7号上发表《我的歧路》，述说自己谈政治的缘由。称他的谈政治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努力周报》从第7号起开辟《这一周》的时评栏目，由胡适撰写。共发表67篇文章，后全部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3。

7月23日 《这一周》内发表《旧道德的死尸复活》，引起孙中山与国民党人的强烈不满与批评反击。

9月3日 《读书杂志》作为《努力周报》的“增刊”创刊。

第一期即刊出胡适的《读楚辞》、《评新诗集——康白情的〈草儿〉》和《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三文。

9月10日 在《努力周报》第19号上发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反对陈独秀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

10月1日 在《努力周报》第22号上发表《国际的中国》，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纲领。

10月 《尝试集》增订四版出版，对初版，再版的篇目作了较大的增删。四版以后的《尝试集》各版均不再有内容变动。《尝试集》之外胡适生前也没有再出版过新的诗集。

12月12日 开始在教育部举办的第四期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讲稿在北京翻印成《国语文学史》的单行本。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学社正式排印。

12月17日 本日起向北京大学请假一年，离校养病。

是年 主要的文学论文有《〈三国志演义〉序》、《评新诗集——俞平伯的〈冬夜〉》、《北京的平民文学》、《〈蕙的风〉序》、《南宋的白话词》、《歌谣的比较研究法的一个例》、《元人的曲子》等。主要诗歌有《后努力歌》、《有感》、《游大明湖》、《回向》等。

1923年 33岁

1月 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创刊，1卷1号上刊出胡适的《〈国学季刊〉创刊宣言》。

2月 《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出版，刊载了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两篇重要文章。

3月 为《国语月刊》的“汉字改革号”写“卷头语”(1卷7期)。

3月4日 《读书杂志》第7期上发表《读王国维先生的〈曲录〉》和《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文。

4月1日 在《读书杂志》第8期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氏主观主义的直线走向、严整有序的东西方文化观提出批评。

4月21日 离北京到南方休养(杭州、上海)。

5月15日 写信给郭沫若、郁达夫，表示对“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希望自己对郭、郁两位英译错讹的批评不致引起误会，“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10月9日 致信高一涵、陶孟和、张慰慈、沈性仁四位，对他们一段时间来辛苦维持《努力周报》表示感谢，然后告之决定暂时停办《努力周报》，将来可能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效仿《新青年》，专从思想文艺着手。

10月21日 《努力周报》出至第75号宣告停刊，同时发表胡适《一年半的回顾》，为《努力》作总结。表示谈政治已“止了壁”，谋求政治改革的梦想终归失败。

11月29日 撰成《科学与人生观序》，是专门为亚东图书馆编辑的科学与玄学近半年的论战的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的总结性的长序，全力为科学派张目，为科学在中国落脚生根呼吁呐喊。这是胡适的关于人生观与宇宙观认识的一篇重要文章。

是年 重要的文学论文还有《〈西游记〉考证》、《〈镜花缘〉的引论》、《〈中古文学概论〉序》、《〈水浒续集〉两种序》等。主要诗歌有《别赋》、《西湖》、《烟霞洞杂诗》、《南高峰看日出》、《梅树》、《十月廿三日的日出》、《秘魔崖月夜》、《暂时的安慰》等。

1924年 34岁

2月10日 发表《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21卷3期)。

2月22日 《读书杂志》18期宣告停刊。同时刊出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此文大力推扬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提倡疑古辨伪的精神,批评了刘掞藜、胡近仁等的崇古、泥古态度,从而为纷纭一时的古史讨论作了学术上的总结。

2月25日 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再谈整理国故》。

7月3日 写信给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张国淦,抗议警察厅禁售《胡适文存》。此信载7月6日的《晨报副镌》。

9月 发表《〈国语文学史〉大要》(《国语月刊》2卷2期)。

10月10日、21日 两次写信与王国维,讨论唐《教坊记》中的曲目。——此事是胡适为编纂《词选》与撰写《词的起源》作的准备。

11月5日 写信给“北京政变”后的黄郛“摄政内阁”的财政总长、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冯玉祥派军队驱逐溥仪出宫,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最不名誉”的行为。此信在9日的《晨报》刊出。溥仪出宫后,胡适还到北府(醇亲王府)去看望过他,以表示慰问,并劝溥仪出国留学。

11月 《胡适文存》二集出版(亚东图书馆)。

12月26日 作《读吴承恩的〈射阳文存〉》，载1925年4月《猛进》周刊第4期。

是年 主要诗歌有《小诗》、《江城子》、《中央公园作》、《鹊桥仙·七夕》等。

1925年 35岁

1月1日 段祺瑞政府邀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胡适表示“愿意试他一试”。

2月1日 “善后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胡适出席开幕式。会议期间，胡适曾提出“国民会议组织法”修正案的提案，会议未予以认真讨论。

3月4日 胡适辞去代表身分，中途抽身退出。

3月15日 撰《〈三侠五义〉序》。后收入《胡适文存》三集。

5月 女素斐因骨结核病夭亡。

8月13日 《戴东原的哲学》完稿，载《国学季刊》2卷1期，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

8月27日 作《老章又反叛了!》一文，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学运动的污蔑与攻击。

9月5日 发表《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39期)。

9月下旬 在武昌大学讲演《新文学运动之意义》(载10月10日《晨报副镌》)和《谈谈〈诗经〉》(载10月16、17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10月26日 在上海大夏大学讲演《怎么样思想》，载28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

12月 在《清华学报》1卷2期上发表《词的起源》。

是年 主要文学论文还有《朱敦儒小传》、《胡笳十八拍》、《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演变》、“野有死麋”之讨论》、《〈吴歌甲集〉序》、《重印〈文木山房集〉序》、《〈老残游记〉序》、《〈儿女英雄传〉序》。主要诗歌有《题章士钊胡适合照》、《记言》、《题凌叔华女士画的雨后西湖》、《八月四夜》、《也是微云》等。

1926年 36岁

5月24日 写信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为他们八九个月来的笔战进行调解，呼吁消除误解、冷酷与不容忍，放开胸怀朝前走。

7月10日 发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4卷83期），这是胡适关于东西方文化与文明见解的最重要一篇文章。文章对文化和文明先确立了概念范畴，并强调任何文明都包含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因素，没有纯粹物质的文明，也没有纯粹精神的文明。在比较东西方文明时，他指出“东方的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同时又“绝不轻视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她的“满足人类心灵上的要求的程度，远非东洋旧文明所能梦见”。胡适要求国人对于西洋近代文明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开放的心态，以便把东方旧文明改造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新文明。

7月17日 离京赴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走东北出境，取道西伯利亚，经莫斯科去西欧。

7月20日 抵哈尔滨，对哈尔滨市内“东西方文明的界

线”颇多感慨。

7月24日 在火车上作《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后载《现代评论》4卷91、92期),又写信“寄颉刚《论封神传》,寄玄同《论恶姻缘》”。自觉尚满意,认为“皆可存”。(《日记》)

7月29日 抵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3天,参观“国际文化关系会”、革命博物馆、第一监狱等,还访晤了在莫斯科的于右任、蔡和森等人。对苏俄的新“政治试验”极感兴趣,多有称赞之词,在给国内朋友徐志摩、张慰慈等的信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苏俄社会建设成就和教育改革持欣赏与同情的态度。

8月3日 火车几乎一日都行驰在德国境内。本日有日记:“今日回想前日与和森的谈话及自己的观察,颇有作政党的意思。我想,我应该出来作政治活动,以改革内政为主旨。可组一政党,名为‘自由党’。充分的承认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不以阶级斗争为手段。……不以历史的‘必然论’为哲学,而以‘进化论’为哲学。资本主义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党纲应包括下列各事:一,有计划的政治。二,文官考试法的实行。三,用有限制的外国投资来充分发展中国的交通与实业。四,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这是二十年代胡适社会政治设计的一段认真的思考。

8月—11月 在伦敦、巴黎查阅敦煌卷子,发现大量神会和和尚的材料,生发了写《神会和和尚传》和治禅宗史的兴趣。

11月 在英国各大学作学术讲演,讲题有《过去一千年来中国停滞不前了吗?》、《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

12月31日 由英国渡大西洋赴美国。

是年 主要学术论文有《〈海上花列传〉序》、《〈词选〉自序》。

1927年 37岁

1月12日 抵达纽约。这是胡适十年后重回纽约,看到十年来美国的迅猛发展,颇多感慨。稍后撰写的《漫游的感想》一组文章中多有反映(《现代评论》)6卷140、141、145期)。

2月4日 到哥伦比亚大学作讲演,补办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手续。

3月19日 发表《整理国故与打鬼——给诒徐先生的信》(《现代评论》5卷119期)。再次强调整理国故运动的本质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它的功用正在打鬼捉妖,解放人心。

4月12日 从西雅图乘轮回国。17日在轮船上作《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肯定《左传》作为信史的地位。10月4日又作《〈左传〉真伪的提要与批评》,继续发表对《左传》考核与评判的意见。

4月24日—5月17日 在日本参观游览,同时观察国内形势。5月17日自神户上船回国。20日抵上海。

6月 租屋沪西极司菲尔路49号甲——定居上海。是月《词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8月 受聘为光华大学教授。

8月21日 撰成《菩提达摩考》,9月30日改定,载1928年6月《现代评论》第三周年增刊。

10月24日 致信蔡元培,请辞“大学委员会委员”之职,

原因是不能同意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方针。

是年 重要的文学论文有《〈孔雀东南飞〉的年代》、《〈官场现形记〉序》、《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白话诗人王梵志》等。主要诗歌有《素斐》、《旧梦》、《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赠张元济》、《生疏》等。

1928年 38岁

1月—2月 发表《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贡献》旬刊6号至8号),此文论述近三百年的反理学思想运动的四个代表人物:顾炎武、颜元、戴震、吴稚晖,重点在表彰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思想意义。此文2月7日的修定稿,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2。

2月12日—16日 撰写《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载《新月》1卷1期)。这是胡适的“红学”研究迈入新阶段的一篇里程碑式的重要文章,主要利用去年购得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崭新材料构筑起“新红学”完整的学术体系。

3月10日 《新月》月刊创刊,出版第1卷第1号。《新月》同人主要为胡适、徐志摩、陈源(陈西滢)、梁实秋等。

3月24日 撰成《白居易时代的禅宗世系》,作为《跋宋刻本〈白氏文集〉影本》的“附录”,刊载于《浙江图书馆报》第2卷(8月号)。

3月25日 致信蒋梦麟,辞谢主办浙江大学文理科哲学与外国文学两门的邀请。

3月28日 致信汤尔和,力辞清华大学校长之邀请。

4月10日 发表《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新月》1卷2号)。

4月19日 作《再论王莽》(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7)。

4月26日 接受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聘约。
30日莅任。

5月4日 在光华大学讲演《五四运动纪念》。

5月10日 发表《庐山游记》(《新月》1卷3号)。同日,撰成《〈曲海〉序》(收入1929年大东书局出版之《曲海总目提要》)。

6月5日 作《〈白话文学史〉自序》。——《白话文学史》(上卷)本月由新月书店出版。

6月24日 作《请大家来照照镜子》(载《生活》周刊3卷46期)。

7月10日 发表《名教》(《新月》1卷5号)。

7月21日 作《论禅宗史的纲领》(收入《胡适文存》三集卷4)。8月10日又发表《禅学古史考》(《新月》1卷6号)。

9月10日 作《〈宋人话本八种〉序》(收入《胡适文存》三集8卷)。

9月22日 作《跋〈白屋文话〉》(收入刘大白《白屋文话》)。

9月28日 作《〈吴淞月刊〉发刊词》(载1929年4月《吴淞月刊》创刊号)。

9月 作《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新月》1卷9号)。文中说:“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堆的路是死路。”

11月21日 有日记称:“我考《红楼梦》,得顾颉刚与俞

平伯；考《西游记》，得董作宾；考《水浒传》，得李玄伯；考《镜花缘》，得孙佳讯君，这都是抛砖引玉，使我十分高兴。”

12月14日 作《新年的好梦》（载1929年元旦天津《大公报》）和《说难》（未公开发表）。

1929年 39岁

是年 仍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1月10日 发表语言音韵学重要论文《入声考》（《新月》1卷11号）。1月16日又作《〈入声考〉后记》。

1月19日 赴北平参加协和医院董事会会议，并探望梁启超病情。晚抵北平时，梁氏已逝世。

1月20日 与丁文江、任叔永、陈寅恪等赴广慧寺参加梁启超大殓。

1月25日 重到北京大学，心绪激动，作诗《三年不见他——十八年一月重到北大》。第一段云：“三年不见他，就自信能把他忘了。今天又看见他，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3月25日 作《平论》周刊发刊辞。《平论》是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一班朋友酝酿多时的一个新刊物，此时决定正式出版，胡适任主编。但此刊物最终仍是胎死腹中。

4月10日 在《新月》2卷2号上发表政论《人权与约法》，严词抨击国民党政府“保障人权”的虚伪，掀开了“《新月》人权舆论运动”的第一页。

6月10日 在《新月》2卷4号上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此文被认为是向国民党发动舆论进攻的，遭到国民党文宣系统与党务系统猛烈回击与围剿。本月《新月》即遭查

禁。

7月20日 作《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再次向国民党的无宪法的“训政”发动批判。此文载10月再版的《新月》2卷4号。

8月24日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常委会议决，呈请中央党的执委咨文国府，令教育部将胡适撤职惩办。——罪名是对国民党的党义、政策和总理学说进行恶毒攻击。

9月 发表《〈水浒传〉新考》（《小说月报》20卷9期）。

10月4日 教育部长蒋梦麟奉命下达对胡适的“警告”令。胡适校改了“警告”令上的几个错别字，原件封还，拒绝接受。

11月29日 作《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再次发表批评国民党的言论，强调“从新文化运动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甚至说：“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12月13日 作《〈人权论集〉序》，再次强调“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人权论集》（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合著）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在《新月》的“人权舆论运动”中胡适还写了三篇重要的政论文字：《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从思想上看中国问题》，均未发表。

是年 主要文学论文有《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闺秀艺文略〉序》、《贺双卿考》、《〈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主要

诗歌有《小词〈好事近〉》、《高梦旦先生六十岁生日》、《和丹翁捧圣诗》、《题金陵大学四十年纪念册》等。

1930年 40岁

是年 5月前仍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又兼文史学系主任。

1月29日 作《荷泽大师神会传》，收入《神会和尚遗集》。

2月1日 作《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载《燕京大学月刊》6卷3期）。

2月5日 国民党查禁《新月》第2卷6—7号合刊。

2月—3月间 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讲演《从新文艺观察今日中国的思潮》，认为今日中国的思潮，“从左到右，都是皮毛的，看不出真正的思想”。具体表现为：一，用笼统抽象的名辞包揽一切；二，盲从，不思考；三，成见太深。

3月2日 作集《楚辞》联：“吾方高驰而不顾，夫孰异道而相安。”——表白了自己在国民党高压下的态度与立场。

4月1日 作《陆贾〈新语〉考》（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期）。3月开始，胡适陆续撰写《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各章。

4月10日 作《〈神会和尚遗集〉序》——《神会和尚遗集》本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4月13日 作《我们走那条路？》——这是胡适与朋友们准备写关于“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一系列专题研究的一个引论。文中胡适论述了中国真正的仇敌、真正的革命对象应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鬼”——提出了著名的“五

鬼闹中华”论。

4月16日—30日 撰成《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重要一章《淮南王书》。此章后由新月书店出版单行本。

5月3日 国民党查禁新月书店出版的《人权论集》一书。

5月19日 辞去中国公学校长职，由马君武继任。

5月28日 在北上的海轮“奉天”号上作《汤尔和译〈到田间去〉的序》，重申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的意见，呼吁“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作工具，然后回到田间去，张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

8月 作《司马迁辩护资本主义》（载1931年3月《经济学季刊》2卷1期。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改题《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9月 《胡适文存》三集出版（亚东图书馆）。扉页上题签：“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11月 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胡适出面调解。私下里他多次表示对“中公”的失望。

11月27日 写完《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选》的“序”。《胡适文选》12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11月28日 举家离沪迁回北平。30日抵北平卜居后门内米粮库四号。——胡适1927年5月17日迁居上海，至今日离开上海、搬回北平，约住三年半。其间有三次回到北京，1929年1月，1930年6月和1930年10月。——最后一次是

为回到北京大学执教与寻租新居而专门北上的。

12月6日 出席中研院史语所欢迎会。傅斯年致欢迎词，胡适答辞称：“生平抱三个志愿：一，提倡新文学；二，提倡思想改革；三，提倡整理国故。此三事皆可以“提倡有心，实行无力”八个字作我的定论。

12月10日 出席北京大学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北大代理校长陈大齐，哲学系主任张真如参加。胡适答谢辞云：“我们当前的问题是社会、国家、人生、思想，我们应该注重活的问题，不该专研究过去历史上死的问题。古代的成功或失败，仅是我们的指导和教训，我们应该领导社会思想，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学日刊》1930年12月10日）

是年 《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七章）由中国公学印行，1931年新月书店正式出版。今年主要诗歌有《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祝马君武先生五十生日》、《送唐瑛女士扇子》、《题龚含真先生画册》等。

1931年 41岁

是年 任北京大学教授。

1月15日 致信陈布雷，为《新月》的人权舆论辩护，强调“《新月》同人志在提倡这种个人签名负责的言论自由”，“此类负责的言论无论在何文明国家之中皆宜任其自由发表，不可加以压迫”。

1月24日 读陈梦家、闻一多、徐志摩选来的诗稿，大为叹赏，认为新诗已经完全成熟。

1月25日 与闻一多深谈，“深爱其人”（《日记》）。

1月—2月 在美国《论坛》月刊1—2月号发表英文自传

稿《我的信仰》。

2月9日 作《评〈梦家诗集〉》，强调“深感觉新诗的发展很有希望，远非我们提倡新诗的人在十三四年前所能预料。”

2月10日 新学期开始在北京大学上课，讲《中古思想史》。今年年初蒋梦麟任北京大学校长。

2月23日 作《论〈诗经〉答刘太白》和《跋〈知非集〉钞本》两文。

2月25日 复信闻一多、梁实秋，有意牵头设计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工程。

3月17日 作《与钱穆先生论〈老子〉问题书》（载1932年5月《清华周刊》37卷9—10期合刊）。

5月4日 作《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本年由中研院史语所印行。

5月8日 为《大公报》出满一万期作文《后生可畏》志贺。指出《大公报》的信誉靠它的“确实的消息”和“负责任的评论”。

8月6日至17日 应丁文江之邀，带儿子祖望到秦皇岛北戴河度假。

9月5日 作《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载《新月》4卷1号）。

9月14日 北京大学新学年开学。校长蒋梦麟商量要胡适出任文学院院长，胡适不曾答应。后在蒋氏的一再请求之下，于1932年2月15日开始接任文学院院长，并兼任中文系主任。

11月19日 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胡适甚为痛惜。12

月初连续写了《追悼志摩》、《狮子》、《寄志摩谈新诗》(续完)等诗文,寄托哀思。

12月13日 作《〈醒世姻缘传〉考证》及《后记一》。

12月30日 在北大中文系讲演《中国文学的过去与来路》(载1932年1月5日天津《大公报》)。

本年 《中国文学史选例(古代)》和《中国中古思想史提要(十二讲)》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

本年主要诗歌有《题陆小曼画山水》、《和丁文江》、《恭颂赤脚大仙》、《夜坐》、《答和在君》、《题唐景崧先生遗墨》、《十月九夜在西山》等。

1932年 42岁

2月起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4月4日 致信辞谢蒋梦麟要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请求。(蒋本人拟抛开北大去当教育部长)信中严正表态:“如果你丢开北大,或者政府发表我长北大,我只好连那‘玩票’式的院长职务也一并辞去。”

5月22日 《独立评论》创刊,胡适任主编。主要同人有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任叔永、傅斯年、陶希圣、杨振声、陈衡哲等。创刊号上刊有胡适的《〈独立评论〉引言》和两篇政论《上海战事的结束》、《宪政问题》。

6月2日 受聘为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该会会员国际声誉很高,中国会员受聘是首次。

6月13日 作《论对日外交方针》,共九条(载《独立评论》第5号)。

6月24日 作《所谓教育的“法西斯蒂化”》(载《独立评

论》第8号)。

7月10日 作《论学潮》(载《独立评论》第9号)。

7月24日 作《〈东京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此《书目提要》为孙楷第所撰,本年内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印行。

8月7日 发表《领袖人才的来源》(《独立评论》12号)。

9月5日 作《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载《独立评论》17号)。

9月7日 作《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载《独立评论》17号)。

9月11日 作《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载《独立评论》18号)。

10月4日 作《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载《独立评论》21号)。

10月15日 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立即设法营救。30日在北大讲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重申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

10月25日 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国问题的一个诊察》,继续宣扬“五鬼闹中华”的理论观念,强调自身反省与努力。

11月21日 作《统一的路》(载《独立评论》28号)。

11月25日—12月7日 离北平南行。11月28日上午参观武汉大学,下午游东湖,晚在汉口蒋介石寓所内晤蒋,并共进晚餐。这是胡适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次日又应邀在蒋宅晚饭,席间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12月2日第三次应邀到蒋宅共进晚餐——开始与蒋氏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11月 又兼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

12月1日 在武汉大学讲演两场，一为《谈谈中国政治思想》，二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12月4日 在长沙中山堂讲演《我们应走的路》，中心思想是：“为己而后可以为人，求学而后可以救国。”——号召走个人奋斗和学术救国的路。

1933年 43岁

是年 仍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1月1日 改定《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载1933年北京大学《哲学论丛》第一集)。

1月30日 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胡适任执委会主席。31日与分会会员杨杏佛、成平参观北平三监狱。

2月 因一份控诉北平军分会监狱酷刑虐待监犯材料的真伪与民权保障同盟总部发生矛盾，冲突深化，最后“自由出会”——脱离“同盟”。其间(19日)胡适在《独立评论》38号上发表《民权的保障》，全面阐释了自己对“民权保障”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强调其法律的性质，而否定其政治的性质。

4月8日 复信汪精卫，辞谢汪氏请求，拒绝出任教育部长。信中说：“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在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并表示自己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5月15日 作《〈独立评论〉一周年》(载《独立评论》51号)。

6月7日 作《〈西洋现代史〉序》。

6月13日 到南京监狱看望陈独秀。

6月18日 由上海乘“日本皇后号”海轮赴美。转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

7月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演《中国文化的趋势》(六讲)和关于儒教的讲演(三讲)。

9月 《四十自述》(上册)出版(亚东图书馆)。本书分“序幕”《我的母亲的订婚》和正文五章:一,九年的家乡教育;二,从拜神到无神;三,在上海(一);四,在上海(二);五,我怎样到外国去。——先后在《新月》上发表过。

胡适译的《短篇小说》第二集出版(亚东图书馆)。

10月25日 自加拿大回到上海。29日返北平。

12月3日 作《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1934年1月《东方杂志》31卷1期)。本文评述文学革命的缘起与演进的历史,胡适自认为可以作为《四十自述》的一章。

是年 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政论主要有《国民参政会应该如何组织》(34号)、《国联调解的前途》(36号)、《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39号)、《全国震惊之后》(41号)、《日本人应该醒醒了》(42号)、《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44号)、《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45号)、《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46号)、《从农村经济谈到无为的政治》(49号)、《制宪不如守法》(50号)、《保全华北的重要》(52—53号合刊)、《建国问题引论》(77号)、《国际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78号)、《福建的大变局》(79号)、《建国与专制》(81号)、《再论建国与专制》(82号)等。

1934年 44岁

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1月2日 游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李大钊上年安葬，葬后不久夫人赵氏也死了，合葬，俱无碑碣。胡适拟请蒋梦麟补立一碑。

1月7日 据日记载，胡适回北平五年来，每周星期日上午九点至十二点，为公开见客时间，无论什么客都见。“有时候一个早晨见二三十个客”，有时，“一天五十多位客人”。他自称为“胡适之做礼拜”，乐此不疲。

同日 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发表《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

2月2日 到南京出席中基会第八次常会。

2月10日 再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陈独秀想要写自传，正在设法联系疏通出版。“我劝他放手写去，不必先求早出版。若此时即为出版计，写的必不得不委曲求全，反失真相。不如不作出版计，放手写去，为后人留一真迹。他颇以为然。”（《日记》）

2月14日 建议“大学之中国文学系当兼顾到三方面：历史的、欣赏与批评的、创作的”。（《日记》）

2月24日 《日记》载：“我以为研究中国法律史当注意四个方面：一，法典的演进；二，法律思想的演变；三，司法制度的沿革；四，‘刑名’幕友的职业的发生与演变。”

3月13日 致信沈从文，商请他出面为何家槐洗雪“抄袭”的冤情。又致信吴奔星，说他指责何家槐偷他的作品理由不充分，不清楚。

4月18日 写信给钱玄同，说：“我常觉得吴敬梓也是

颜、李学信徒；《儒林外史》是颜、李学的一部宣传品。”——胡适一直留意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清代反理学的思想史线索。

6月3日 在《独立评论》103号上发表《信心与反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我们的信心应该望在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下什么种，出多少力。”——“反省”即是“闭门思过”，胡适告诫，不要陶醉在“光辉万丈”的五千年精神文明之中而不思进取，不肯反省，不愿努力。此文发表后引起批评与争论，此后胡适又在《独立评论》的105号与107号连续发表《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继续发挥他的坚持信心，勇于反省的思想观念。

7月1日 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载《学文月刊》第1卷第3期），这是胡适改写《西游记》的一段寓意甚深的小说文字。

7月8日 在《独立评论》108号上发表《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

7月15日 在《独立评论》109号上发表《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8月17日 作《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载《国闻周报》11卷34期）。

8月 发表《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的“碑文”（《学文月刊》1卷4期）。“碑文”是应傅作义将军之请而作的，5月5日撰成；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写，6月写讫。11月初，墓碑刻成，并举行了揭幕典礼。

9月9日 在《独立评论》117号上发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宣称：“这二十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

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有成功的。”

9月17日 作《“九一八”的第三周年纪念告全国的青年》和《整整三年了》两文。主旨是,在这个惨痛的纪念日,我们应该作深刻诚恳的反省,而不是忙那些空虚烂熟的“纪念典礼”。反省的要义是认清我们必须补救缺陷,认清我们必须赶做工作,努力做,拚命做。“奇耻在前,大难在后,我们唯一的生路是努力,努力,努力!”

10月9日 在燕京大学讲演《究竟在这二十三年里做了些什么》,作文《双十节的感想》。——后者发表于《独立评论》122号;前者写定后题《悲观声浪里的乐观》,刊《独立评论》123号。

12月9日 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向政府提出关于明确保护公民言论、结社自由的五条建议。呼吁“领袖诸公应该早日停止一切‘统制文化’的迷梦”。——此文又在《独立评论》131号转载。

12月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中国禅学之发展》(四讲):一,印度禅;二,中国禅宗的起源;三,中国禅宗的发展和演变;四,中国禅学的方法。

12月 《说儒》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形式出版单行本。——这是胡适研究孔子学说宗旨与学派渊源的重要论文,长约四万六千余字。此文吸收融合了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文章的一些见解。关于孔子,胡适认为他的主要历史贡献有两项:一,把殷商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为“仁以为己任”的“儒”;二,把柔懦退逊的“儒”改造为刚毅进取

的“儒”。

是年 由胡适与唐肇黄合译的《哲学的改造》(杜威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胡适关于抗日外交方面的文章有《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一个民族的自杀——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今日的危机》、《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国际危机的逼近》等。关于国内政治改革、民主宪政方面的重要文章有《武力统一论》、《政治统一的途径》、《“旧瓶不能装新酒”吗?》、《再论无为的政治》、《建设与无为》、《今日可做的建设事业》、《论〈宪法初稿〉》、《政治终一的意义》、《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等。关于讨论学术文化问题的文章还有《〈辞通〉序》、《〈坛经〉考之二》、《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写在徐梅女士的文章后面》、《大众语在那儿?》、《跋北平图书馆藏〈王韬手稿〉七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等。

1935年 45岁

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1月1日 从上海坐船去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与的名誉博士学位,并游览讲学,考察教育文化,传播新文化思想。他自称是“开辟殖民地”,“不脱通天教主的味儿”。(《致傅斯年函》1934.12.20)

1月4日 抵香港。开始参观,游览,讲演,日程排满。

1月6日 在香港华侨教育会讲演《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赞美香港的教育水准,批评广东的复古倾向,引起很大反响。

1月7日 出席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授与仪式。这是胡适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头衔的第一个。8日晚离港乘船赴穗。9日晨抵广州。

1月9日—11日 由于广东军政当局的敌视,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被迫取消了胡适的讲演安排——胡适只得在广州作低调的参观游览。11日中午乘坐飞机离开广州,下午抵达广西梧州。

1月12日 在梧州中山纪念堂讲演《中国的再生时期》。13日至25日,继续在广西游览、讲演,讲演题目有《治学的方法》、《个人主义与团体主义》、《元祐党籍碑的教训》等。

1月26日 由香港北返上海,再经南京返北平。关于这次南游,胡适写了总题《南游杂忆》的四篇文章(一香港,二广州,三广西,四广西的印象),先后刊载在《独立评论》上,同年10月上海国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2月17日 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发表《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的政治信仰》。——这个“共同的政治信仰”,胡适认为就是“逐渐走向民主政治的尝试与练习”。

3月17日 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对正在展开的“中国文化本位”问题的论争表态。论争一方为何炳松、陶希圣等十教授,他们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引起学界的许多批评,批评一方以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为最激烈。胡适表态道:“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但是他也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

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

3月31日 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栏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正面批驳十教授的宣言，系统地论述他的中西文化观。主旨是：“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的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

4月14日 在《独立评论》146号上发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5月5日 在《独立评论》149号上发表《纪念“五四”》；5月12日《独立评论》150号上又发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重申“五四”运动的本质意义即是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只有思想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才能真正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5月27日 作《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指出滥用名词代替思想的弊病造成“懒惰、笼统的思想习惯”和“铿锵空洞的八股文章”（载《独立评论》153号）。

6月3日 在《独立评论》154号上发表《略答陶希圣先生》，进一步批评乱用抽象名词的思想习惯。

6月12日 致信陶希圣，谈中国文化教育问题。要点有三：一，“我们教人信仰一个思想，必须先自己确信仰它，然后说来有力，说来动听。若自己不能信仰，而但为教育手段计，

不能不说违心之言，自弃其信仰而求人信仰他自己本来不信仰的东西，我不信这个方法是可以收效的。”二，“只有讲真话，可使这个民族独立自主。”三，“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

6月20日 致信王世杰，指出：“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

6月27日 又致信王世杰，希望他在担任主导外交政策的岗位上努力去促成那场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我们必须准备三四年的苦战，必须咬定牙根”，“必须打三年的败仗，不惜牺牲（工商业中心作战场），必须步步战，必须虽步步败而仍步步战；必须虽处处败而处处战，从不顾一切的苦痛与毁灭中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6月30日 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大公报》“星期论文”），提出：“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议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两个口号其实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7月3日—7日 携儿子思杜与任叔永夫妇在平绥铁路局长陪同下，沿平绥路旅行。之后写成《平绥路旅行小记》发表在《独立评论》162号上。

8月11日 在《独立评论》163号上发表《政制改革的大路》，对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作了全面的阐述。此文与《独立

评论》171号上的《从一党到无党的政治》是胡适本年最重要的两篇政论文字。

9月3日 写定《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这是胡适关于新文学运动理论建设的宏观总结。《大系》的“建设理论集”（第一集）本年10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9月4日 南下，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

9月7日 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11月30日 致信日本学者室伏高信（载《独立评论》180号）。明确指出“凡对于我们最少侵略野心的，凡不妨害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凡侵略我们的，凡阻害我们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对于室伏高信忧虑东方文化遗产的失坠，胡适答复道，中日两国目前值得忧虑的不是东方文化的“失坠”，而是“在拥护东方遗产的大旗之下，做出自相残害的丑戏来”。胡适又明确表白：“我个人决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化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缺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胡适曾表示赞成学生的爱国行动。日本驻北平的武官高桥向北平市长秦德纯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的，主谋的人是蒋梦麟与胡适。——过了几天（12日）胡适即对学生运动感到失望。“12.16”前后发表《为学生运动进一言》、《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反对学生罢课。但要求北平军政当局“做出几件可以安人心的事来，最要的是拿办殷汝耕，取消冀

东自治”。

12月10日 得知丁文江在湖南衡州中煤气并发脑病，急忙联络抢救，遥控指挥。

12月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是年 关于抗日外交方面的文章主要有《中日提携，答客问》、《天不纳闷，都有些伤心》、《敬告日本国民》、《国联的抬头》、《再论国联的抬头》、《华北问题》、《冀察时局的收拾》、《我们要求外交公开》等。

1936年 46岁

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1月1日 在北平承华园为千家驹、杨黎音证婚。

1月5日 丁文江抢救无效，死于长沙。胡适极为悲痛，说“在君是最爱我的一个朋友”，“在君之死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一大损失”。先后作《哭丁在君》、《丁文江这个人》等诗文表示哀悼。

1月9日 致周作人函，重申“多事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的人生哲学。介绍：“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我身为蓍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2月5日 作《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申明所谓“胡适之体”的三条标准：一，说话要明白清楚。二，用材料要有剪裁。三，意境要平实。

4月1日 作《行己有耻与悔过自新序》，重申“忏悔”、

“反省”、“努力自新”的知耻奋发哲学。

4月7日 作《颜李学派的程廷祚》长文，全面介绍颜、李学派重要骨干程廷祚的思想学术。6月又发表《北京大学新印程廷祚〈青溪全集〉序》（6月4日，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

5月10日 作《〈独立评论〉的四周年》，对四年来《独立评论》的健康发展与高格调、高品位表示赞赏与欣慰。

5月31日 对平津局势心怀悲观，醉吐后作《敬告宋哲元》，晓以大义，切盼他站稳民族立场、稳住平津大局。

6月9日 致电李宗仁、白崇禧等，谴责两广事变。称：“今日无论甚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11日又作《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再次正告“两广的领袖诸公”：必须悬崖勒马。

6月23日 致信罗尔纲，批评他所作《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说“这种文章作不得”，须“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29日又致信两札并与他设计《湘军志》的构架。

7月8日 离北平赴上海。14日从上海出发登轮赴美国，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

7月16日 从神户到东京，道中望见富士山，感触良多。21日追念作诗云：“雾鬓云裾绝代姿，也能妖艳也能奇。忽然全被云遮了，待到云开是几时？”

7月17日 在日本东京停留。日记中发感慨道：“大概各国风气所尚，各有其特别之点。英国则第一流人才入政治；美国则第一流人才入工商；日本则第一流人才入军部，其大学教授与文人，皆是凡才也。”

8月15日 出席美国约瑟弥岱召开的第六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29日会议闭幕,被选为该会副主席。

9月16日—18日 出席哈佛大学三百周年庆祝纪念会,讲演《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贷的专题研究》。与会期间接受哈佛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0月30日 致函吴健雄,勉励她“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希望吴“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扩大,使见解高明”。

11月26日 在太平洋返国的船上作《高梦旦先生小传》(载《东方杂志》34卷1号)。

12月1日 回到上海。

12月2日 《独立评论》遭北平军政当局查封,9日始撤走警察。

12月10日 回到北平。11日在北京大学讲演《太平洋国际之认识与感想》,敬叹外国大学历史之悠久,深感国内大学教育的落后。强调欧美今日之进化,渊源于其大学之独立,近代科学发明,领袖人才辈出,均为大学所造就。

12月12日 西安事变爆发。13日胡适即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8日又写成《张学良的叛国》(载《大公报》12月20日),指责张学良逼

蒋抗日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13 日日记又称“这祸真闯得不小，汉卿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到如今还不曾成熟，就为小人所误”。

12 月 14 日 致苏雪林信，批评她攻击鲁迅及左派文艺的“旧文字”和“恶腔调”应该深戒，并劝她放开胸襟。“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俪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 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胡适还提议，鲁迅已死，“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是年 抗日外交方面的主要文章有《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东京的兵变》、《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告日本国民》、《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国联还可以抬头》等。

是年 主要诗歌还有《无心肝的月亮》、《扔了？》、《燕》、《无题》等。

1937 年 47 岁

是年 7 月之前仍在北京大学任教。

1 月 1 日 作《新年的几个期望》，载 1 月 3 日天津《大公报》。期望国民党政府在新的一年里“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蒋介石本人“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完成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

1 月 11 日 读了孟森的文章：论证戴震校殿本《水经注》偷窃了赵一清《水经注释》的成果，伪称从《永乐大典》辑出，十分相信。日记中指责戴震“作伪实可恶”。19 日又写信给魏建功，认为“东原作伪似无可疑”，又说：“世人可欺于一时，终不可欺于永久也。”但六年后（1943 年）他开始改变了对此案的看法，并倾全力重勘此案，为戴震“辩诬白谤”。

1 月 17 日 为汤用彤校阅《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本，极表赞赏，认为汤用彤与陈寅恪两位是当今治史功夫最勤又最有成绩的。22 日日记又称陈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标点尤懒，不足为法”。

4 月 18 日 《独立评论》解禁复刊。胡适在复刊的第 230 号上发表关于抗日与国际新形势的政论《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预言日本称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即将终结。

同日 在天津《大公报》“星期社论”栏发表《读经平议》。

4 月 25 日 参加清华大学二十六周年纪念，讲演《中国近代考证学的来历》。

5 月 30 日 作《再谈谈宪政》（载《独立评论》236 号）。

7 月 2 日 作《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载 7 月 4 日《大

公报》“星期论文”栏),继续推进民主宪政的舆论。

7月5日 正式决定参加国民党中央筹划召集的“庐山谈话会”。

7月7日 芦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抗战进入新阶段。

7月9日 离北平南下,11日到庐山。当日下午蒋介石邀请茶话。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人士,胡适代表致词。11日江冬秀带全家也撤到天津。至11月18日才离天津赴上海。

7月28日 下庐山。从九江乘飞机飞南京。

7月31日 赴蒋介石邀谈,蒋告“已决对日作战”。8月6日,再赴蒋邀谈,希望蒋不断海外交路线,在大战决战前,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以便赢得时间,充足战备。

8月17日 参加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胡适为16人会员之一。

8月19日 汪精卫告知,中枢拟开释陈独秀。

9月7日 再次应邀与蒋介石晤谈。蒋决定派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去欧美,作抗日宣传与外交联络的工作,争取国际同情与援助。

9月8日 离开南京,与儿子祖望同往武汉。

9月11日 到武汉。13日飞香港。

9月20日 自香港起飞,经菲律宾马尼拉、关岛、威克岛、中途岛、檀香山,26日抵旧金山。

9月29日 参加公民俱乐部午餐会,讲演《中国能打赢吗?》

10月1日 在旧金山哥伦比亚电台发表广播演说《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10月8日 到华盛顿，拜晤中国驻美大使王正廷。

10月20日 与王正廷大使同去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晤谈中，他希望罗斯福“果断放弃妥协思想，用明快的眼光来判断是非”。（吴相湘《抗战期间两“过河卒子”——胡适与陈光甫》）

是年 主要文学论文有《再谈关汉卿的年代——与冯沅君女士书》、《读曲小记》、《全国歌谣调查的建议》、《〈缀白裘〉序》等；主要哲学论文有《述陆贾的思想》、《颜习斋哲学及其与程朱陆王之异同》等；主要诗歌有《为傅作义将军先父纪念堂题小诗》、《新年的山歌》、《题陈援庵所藏程瑶田题程与陶画的雪塑弥勒》、《为高梦旦先生周年忌日而作》、《早行》等。

1938年 48岁

1月—9月 以非官方身份在美国和欧洲继续作抗日的宣传讲演，争取国际道义上的同情与援助。

6月12日 访杜威。杜威告诉他正计划出三部书《社会科学的哲学基础》、《我们时代的知识历史》和《实验逻辑文集》。

6月 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会员。

7月20日 在法国得到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大使的电报。日记称：“此电使我十分为难。”25日又得国民政府电，27日复得蒋电，均催请允任驻美大使职务。

7月27日 复电蒋介石，答应担任驻美大使。电文曰：“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唯自审廿余年闲懒已

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8月4日 想起周作人仍留在已陷落的北平城里，作一诗寄周（《寄给在北平的一个朋友》），婉劝他早早离平南下，勉其“智者识得重与轻”，“飘萧一杖天南行”。——周作人得此诗后，仍不肯离开北平，答诗称谢，表示家口拖累，走不脱。诗笺末还钤印“冷暖自知”章，以明心志。

8月21日 在伦敦中华协会讲演《英美法苏和我们的抗战》，强调中国的抗战固然亟需国际的援助与支持，但我们自己必须咬牙苦撑，不断壮大抗日的力量。

8月24日 好友徐新六从香港飞内地，途中飞机被日军击落而遇难，心情悲痛之余又觉孤凄寂寞。9月8日作《追哭徐新六》诗。10月16日又作《抄新六遗书三篇题此诗》，寄托哀思。

9月17日 国民政府宣布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引起国内外很大反响，舆论界大多持欢迎态度。当日日记中称：“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10月5日 到华盛顿莅职。6日，到馆视事，住进“双橡园”大使官邸。7日拜谒美国务卿。27日向美总统递交国书，正式开展官方外交活动。——这之前，21日广州沦陷，25日武汉沦陷，中国抗战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10月31日 蒋介石宣告《告全国军民书》，表示坚持抗战到底。11月2日晋见罗斯福总统，向他诵读蒋介石的宣告。

12月4日 在纽约律师俱乐部讲演《北美独立战争与中

国抗日战争》，呼吁美国由己及人，伸出手来支援苦撑苦斗中的中国。讲演之后，心脏病猝发，入医院住七十七日。

12月15日 由胡适与陈光甫联手办成的“中美桐油贷款”签字。18日蒋介石致电表彰。

12月17日 西南联大原北大同人及学生十九人联名致信为胡适祝寿。信中说：“在滇的同人们都愿你发挥无碍的辩才，申展折冲樽俎的身手，做一番旋转乾坤的伟业，寿国寿民兼以自寿……最后，我们希望你在转移国运之后，功成身退，同我们一起再回咱们老家去。”

是年 主要诗歌还有《从纽约省会奥尔巴尼回纽约市》、《水调歌头》、《孤单》、《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四十七岁生日》。

1939年 49岁

是年 仍在驻美大使任上。

1月21日 致电陈布雷转蒋介石，报告美国之远东政策，大致有三个实行方向：“一为经济助我，二为对日经济制裁之各种方式，三为大增军备以威胁日本。三者皆足以激怒日本，使其发狂；亦皆是以促日本之觉悟猛省。敌若猛省回头，远东问题可有和平解决之望。敌若更发狂，则太平洋国际大战终难幸免。”（《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

2月20日 病愈出院。开始活动阻止美国国会修正“中立法”案。

4月19日 谒见美总统罗斯福，表示中国对美“中立法”案修正的意见。

6月6日 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7月22日 美国“中立法”修正案终告搁置。美国对远东局势干预的能力提升。

8月18日 长子祖望与徐新六的儿子徐大椿到美国，从国内带出来稿件两箱（日记、文稿、诗稿、杂件）和铁花的文册日记十六册。不久，送祖望入康乃尔大学，送大椿入赫维福大学。

9月21日 致函江冬秀，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10月6日 主持匹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

12月29日 应美国历史学会邀请，讲演《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文化冲突的比较研究》。

是年 《藏晖室札记》（四册）由亚东图书馆出版。1947年改名《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

是年 主要的抗日外交讲演有《中国抗战的展望》、《我们还要作战下去》、《国际大家庭》、《中国目前的情势》等。

1940年 50岁

仍在驻美大使任上。

2月 在《中国杂志》16卷1期上发表《我们仍在战斗》（英文）。

3月5日 在佛罗里达州的罗林斯国际关系研究所讲演《远东和世界将来的和平》。

5月4日 蒋介石电贺“滇锡借款”成功——这是胡适与陈光甫促成的第二次重要借款，4月24日正式签约。

8月14日 傅斯年致信，报告中研院补选院长的经过。

自蔡元培3月初病逝香港后，中研院的学界名人都盼望胡适能回国继任院长。考虑到驻美大使岗位的重要，最后当局还是选择由朱家骅代理。——朱家骅代理了十八年，直到1958年胡适才继任这个职位。

10月12日 致电陈布雷转蒋介石，强调“苦撑待变”四字宗旨。所谓“变”者，主要期望于日美之间的太平洋海战中日本的覆灭。

10月20日 参加杜威80岁生日酒会，撰祝寿论文《工具主义的政治哲学》。

11月1日 出席美国医学助华会游艺大会，讲演《伟大的同情心》。

11月28日 在纽约市参议会发表演讲《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种国际秩序》。

12月17日 虚岁五十大寿。汤用彤、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从云南昆明来信祝贺寿诞。故乡安徽绩溪上庄村人为胡适五十大寿隆重上匾“持节宣威”，同时将上庄村改名“适之村”。

1941年 51岁

仍在驻美大使任上。

1月20日 出席罗斯福第三次连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

3月12日 在伊利诺斯大学讲演《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

5月 次子思杜到美国留学，进印第安纳大学的海勿浮学院学历史。

6月 在普渡大学毕业典礼上讲演《智识的准备》，提议

每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都应当有一个或两个或更多足以引起兴趣和好奇心的疑难问题，藉以激起他的注意、研究、探讨或实验的心思”。

7月 在密歇根大学讲演《民主与极权的冲突》。

9月24日 在芝加哥大学五十年校庆纪念会上讲演《东西方思想的交流》。

11月27日 与美国务卿赫尔会谈，美政府决定取消日本提出的“临时妥协方案”——日本特派专使来栖和大使野村的阴谋最后破产，日美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12月7日 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8日美日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胡适急电重庆报告，宣称：“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12月14日 在华盛顿发表对时局谈话，指出，苏联不久将与中、美、英三国联盟，共同对抗日本——日本败亡已经决定。

12月19日 在美中协会的欢迎宴会上讲演《我们的敌人》。

是年 还有政论(英文)《中国革命的灵魂》、《新的世界秩序来临》等。

1942年 52岁

1月—8月 仍任驻美大使。

1月19日 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讲演《介绍中国——老朋友，新盟友》。

5月4日 在华盛顿向中国国内发表《五四广播词》，这是胡适五年来第一次用国语演说，心情非常高兴。他深信，

“这次大战的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国”。他还表示,“我们不但要从多年抗战里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文明,我们还得尽我们的能力,帮助全人类维持全世界的和平公道,增进全世界的繁荣,提高全世界的共同文化”。

7月7日 在华盛顿向国内广播讲演《抗战五周年纪念》。

8月15日 得到政府中枢免其大使职务的电报。回电称:“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

9月8日 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准驻美大使辞职,以魏道明继任。

9月18日 交卸大使职务毕,即离开华盛顿,卜居纽约东81街104号。

是月 发表英文的《中国思想史纲要》,将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一,纪元前一千年的上古时期;二,中古佛教道教时期;三,近世期(十世纪始)。10月《亚细亚杂志》42卷10期刊出中文全译。

是年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由国内实业印书馆編集出版。

是年 主要政论、讲演还有《中国作为一个作战的盟邦》、《太平洋区域的公正和平》、《我们的共同战斗》、《中国抗战也是要保卫一种文化方式》、《中国在目前世界斗争里的地位》、《论战后新世界之建设》、《中国的战斗力量与战斗信心》、《同盟国战争与和平的目的》、《展望》、《亚洲与广泛的世界秩序》、《赢得与保持和平》、《太平洋的战争与和平》、《太平洋区域永久和平的必要因素——一个中国人的看法》等。这是胡适在

美国的最后一批抗日、反法西斯的讲演和文字——他在驻美大使任上赴美国各地讲演约四百次左右。

1943年 53岁

2月28日 写成《〈易林〉断归崔篆的判决书——考证学方法论举例》。这是他卸大使任后第一篇重要学术论文。

5月30日 写信给王重民，谈治学的方法与训练。——王重民是胡适在国内的学生孙楷第介绍引荐的——此后胡适与王重民有大量的通信，探讨《水经注》案与其他学术论题。

10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讲《中国历史文化》六次。

11月8日 复信王重民。由王重民一篇谈《水经注》的文章引起对“赵戴”《水经注》一案重勘的兴致，信中表示很想搜集此案全部材料，重加审理。当日日记中也称：“私心总觉此案情节太离奇，而王国维、孟森诸公攻击戴震太过，颇有志重审此案。”

是年 较重要的学术文章有《曹魏外官的“任子”制》、《曹魏创立的校事制》、《孙吴的校事制》、《两汉人临文不讳考》、《读陈垣〈史讳举例〉论汉讳诸条》、《海外读书笔记》、《戴震对江永的始终敬礼》、《〈清代名人传略〉序》、《〈封神演义〉的作者——陆醒》等。

1944年 54岁

1月6日 致信王重民，请他托孙楷第在北平代为收买《水经注》旧本，并雇人钞文津阁本赵一清的《水经注释》。

3月13日 开始撰写《全校〈水经注〉辨伪》，作为重新审勘《水经注》全赵戴三家公案的第一步工作。此文改定后约三、四万字。但后来胡适宣布他的这篇长文的三个主要观点

都“不成立”。

7月17日 作《戴东原、赵东潜疑案的考证》(载1945年9月《人文科学学报》3卷1期),开始勘查“戴赵”公案,并着手撰写另一篇重要长文《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此文至1949年1月才最后改定。

11月6日 应聘为哈佛大学讲八个月的《中国思想史》,今日开讲。

11月29日 辞谢康乃尔大学约聘1946—1947年度的“梅辛杰讲座”。

12月13日 受国内朋友请托,写信给美国陆军部长和财政部长,谋求美国军援。

12月17日 与张伯苓等21人发表联名宣言,要求盟国修改战略布署,采取有效军事行动,在中国战场打击敌人。

1945年 55岁

3月27日 国民政府发表中国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名单(11名),胡适为代表之一。1942年9月初,胡适曾在华盛顿作题名为《联合国》(The United Nations)的讲演,为“联合国”从理论上匡定了形式格局与大政方针。

4月25日 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会议制定《联合国宪章》,因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的条文,胡适拒绝在“宪章”上签字,认为此条文有违“国家不分大小,政治上一律平等”的既定理念。

是月 江冬秀从上海回绩溪上庄故里。

8月24日 发电报给毛泽东(请王世杰转)。电文称:“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

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又称:“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9月3日 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政府已决定由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返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6日任命正式发表。北大同仁及学界朋友,皆鼓舞欢欣,纷纷致电,盼早日归国就职。13日,蒋介石致电:“北大复员事宜亟待筹洽商,望兄早日回国主持校务,并图良晤。”

9月10日 饶毓泰致信,荐举张文裕、李四光、钱学森等一批理工科杰出人才,请胡适考虑聘为北大教授。10月8日又致两信,谈聘任事。10月14日复信饶毓泰,拟聘钱学森为北大工学院院长,并请饶再物色约聘工学院及物理系人才。前此,罗常培也致信,推荐一批文科人才,如吴晓铃、张政烺、任继愈等,并希望北大能保持文史研究的传统。

11月1日—16日 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出席伦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参与制定该组织的宪章,但辞谢了该组织“总干事”的职务。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有《海外读笔记》(续)、《记但明伦道光壬寅刻的〈聊斋志异新评〉》、《跋于文襄手札影印本》、《跋赵一清〈水经注释〉钞刻本四种》、《考范缜发表〈神灭论〉在梁天监六年》等。

1946年 56岁

3月 被推为“国民大会”代表。

4月24日 罗常培致信,希望胡适回国后,恢复北大蔡元培的自由主义色彩,希望胡适自己仍保持超然、自由、无为而无不为的精神。之前,周鲠生、饶毓泰等也致信,对北大复员后的校务多有建议。

5月4日 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到职,宣布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

6月5日 由纽约启程坐船回国。这次滞留美国共八年八个月零十天(1937年9月26日—1946年6月5日)。下午三点半开船时忍不住念着:“别了,美国,别了,纽约。”开船后,即大吐三次。

7月4日 船泊上海吴淞口外,“九年不见祖国的落日明霞了”。(《日记》)

7月5日 抵上海码头,吴国桢市长招待,住进百老汇大厦。夜半才见到江冬秀,夫妻团聚。——祖望3月已先期回国;思杜仍在美国。

7月20日 出席上海各大学校长及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为之举办的欢迎茶会,讲话中预言“我们要再吃五年或者十年苦”,但应保持乐观,“咬紧牙关,尽力挽救和改善目前的局面”。自己则“预备回来做一个教书匠”。(上海《申报》7月21日)

7月29日 偕长子祖望飞回北平,李宗仁到机场迎接。

7月 当选协和医学院董事长。

8月3日 收到孙楷第为他购买的15种《水经注》。由于他一到上海,就向记者宣布这几年来都在重勘《水经注》案,一个月后,至9月3日又收集到近20种《水经注》。

9月20日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并为傅斯年卸除“代理”校长举办茶会，高度评价傅氏为北大恢复工作作的贡献。

10月10日 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强调独立而不盲从的思想精神，特别发挥宋吕祖谦的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10月19日 与陈垣、钱端升一起飞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会议。30日飞回北平。

11月10日 蒋介石电催出席“国民大会”。11日飞南京。

11月15日 出席“国民大会”开幕典礼，为主席团成员。会议期间，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名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

11月19日 在南京接见记者时表示，中国需要民主，需要民主的训练和大批政治人才。又表示他之所以参加“国大”，只是盼望“中国能向民主宪政之途多走一步”，这是他多年来为之努力奔命的。但他自己决不组党。

12月30日 飞回北平。接见记者，先否认他将出任行政院长或教育部长之说，又谈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己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又说：“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上海《申报》12月31日）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有《论赵一清的〈水经注释〉稿本的最后状态》、《跋戴震自定〈水经注〉的“附考”——戴氏未见全赵两家〈水经注〉的证据》、《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文史〉的

引子》等。

1947年 57岁

是年 仍任北京大学校长。

1月21日 储安平致信,请胡适担任《观察》杂志的撰稿人。信中表示“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

2月6日 复信傅斯年,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的忙,很愿意帮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又说:“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消’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郭沫若当国,所以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此后为接受不接受“国府委员”的职衔,胡适与国民党中央展开了一次为时久长、反复交锋的拉锯战。为国民党政府的组阁事,胡适在信中也表示:“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的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这是国民党训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国民党岂可不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All-Star)的政府来给世人与国人看

看吗？国民党要做广告，这是最好的广告机会。”

2月22日 又写信给王世杰。再次表示：“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并表态：“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

3月13日 蒋介石邀谈，请吃饭；18日又约谈，一定要胡适参加政府，允任“国府委员”衔。——胡适一再推辞。

5月3日 出席北大学生为纪念“五四”而举行的历史晚会，讲演《五四后新思潮运动的意义》。4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

8月 写信给陈诚、白崇禧，建议在北京大学集中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学者（开列了钱三强、吴健雄、吴大猷、张文裕等九人），专心研究世界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家军事国防之用。

9月6日 向记者透露，曾在南京向蒋介石提出发展高等教育的十年计划，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五校为第一批重点。18日将此意图撰成《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发表在《大公报》（9月28日）上。

10月15日—17日 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四次会议，拟定院士选举规程及第一届院士候选人名单。

10月21日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请吃饭。席间司徒雷登说，中国政府一二个月后就得崩塌。胡适认为，这位大使“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

12月16日 蒋介石又约吃饭，劝请胡适再去美国做大使。胡适表示不能答应。

12月18日 从南京回到上海。19日飞北平。连续两日频繁犯心绞痛。

是年 发表重要政论有《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青年人的苦闷》、《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等。主要学术文章除了有关《水经注》的考证类之外,还有《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考试与教育》、《〈胡适留学日记〉重印自序》、《谈绝句的一封信》、《跋北京大学藏的〈戴东原文〉一册》、《谈谈中国思想史》等。

1948年 58岁

仍任北京大学校长。

1月14日 李宗仁致信,劝胡适加入总统的候选人参加竞选。“参加的候选人除蒋主席外,以学问声望论,先生不但应该当仁不让,而且是义不容辞的”。

3月21日 到上海,24日开过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后又到南京。25日参加中研院评议会。

3月27日 中研院评议会五次投票选出中研院81名首批院士。胡适当选。

3月29日 参加“国民大会”。

3月30日 王世杰传达蒋介石本人的意见,“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日记》)

3月31日 胡适仍认为自己“真没有自信心”。动摇后

又倾向于接受这个“伟大的意思”。(《日记》)

4月1日 见王世杰,决定不接受总统候选人的安排。“昨天是责任心逼我接受,今天还是责任心逼我取消昨日的接受”。(《日记》)

4月4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的“临时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未点胡适名,但开列的五个条件均为胡适而设)会开了六个小时多,“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也不赞成蒋君的话”。(《日记》)

4月5日 王世杰正式向胡适表达蒋介石的“歉意”。——总统候选人的事总算打消,胡适在日记中说:“我的事到今天下午才算‘得救了’。”8日夜应邀赴蒋宅吃饭,蒋再次表示歉意,说,他的这个建议是考虑了长久的,不幸党内没通过。他希望胡适组党,胡适则希望国民党分作两三个政党,各拿出政纲互相竞争。

8月30日 次子思杜开始到北平图书馆上班。他是两个月前从美国回国的。

9月4日 在北平电台广播《自由主义》。

9月24日 出席中研院第一届院士会议,发表讲话。

9月29日 应邀到总统官邸吃饭,席间向蒋指出:“病根在作风,在人才不能尽其长。”

10月4日 在武汉大学讲演《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5日在武昌讲演《自由主义与中国》。

10月19日 访老朋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20日作讲演。下午到上海。22日回到北平。日记中叹道:“此次出外三十六天,真有沧桑之感。”

11月22日 陶希圣奉蒋介石命，来北平劝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长。胡适表示“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但他对“人才内阁”还是有过思考的。郑天挺还曾拟定过一个内阁名单。——胡适没接受这个使命，但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

12月15日 蒋介石派专机来北平，将胡适夫妇、陈寅恪夫妇等接到南京。

12月17日 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纪念会。胡适讲话时，泣不成声，声称“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是日，蒋介石夫妇特为胡适作寿，在总统官邸备酒席，破格示敬。

是年 胡适的主要文章有《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赫尔回忆录〉序》、《民主与反民主观念体系的冲突》、《试考〈水经注〉写成的年岁》、《孟森先生审判〈水经注〉案的错误》、《〈师门辱教记〉序》、《自由主义是什么》、《记赵一清的〈水经注〉的第一次写定本》、《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等。

1949年 59岁

1月8日 应邀赴总统官邸晚餐。蒋介石劝胡适去美国，并不是要他去当大使，或负其他什么使命，如争取美援等。只是要他出去看看。——此时蒋介石也在替胡适思考后路了。

1月10日 为重勘赵戴《水经注》公案的重要文章《戴震未见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十组证据》写《补记》，完成最后修改。

1月21日 送江冬秀与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同去台湾。1月31日得到自己赴美护照签证。

3月23日 到台湾安顿江冬秀。访王世杰。

3月27日 在台北中山堂作讲演《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3月29日回上海。

3月 与邓广铭、黎锦熙合编的《齐白石年谱》出版。

4月6日 自上海登轮(克里夫兰总统号)赴美。在船上写成两文:《〈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与书信〉序言》,此两文标志着胡适在政治上并在著述中持公开的反共反苏立场。——2月23日胡适在上海读到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时,曾表示“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

4月9日 船泊日本时,访晤吴文藻、谢冰心夫妇。

4月21日 抵达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表示在道义上支持、拥护蒋介石。

4月27日 到纽约,仍寓东81街104号——他1942年至1946年曾居住此处。

6月12日 逃广州的国民政府新任行政院长阎锡山任命胡适为外交部长,胡适坚辞。

6月19日 读到陈垣致胡适的“公开信”(载5月11日《人民日报》)。——为这封信的真伪困扰了一周。在日记中表示了对陈垣的鄙视与厌嫌。

7月26日 通知国民党驻美大使馆,取消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中国的抗议。

10月1日 长子祖望与曾淑昭在曼谷结婚。

11月20日 《自由中国》杂志在台北创刊，胡适任该刊“发行人”。

12月13日 去医院看望李宗仁。时李宗仁怀疑患胃癌，正在纽约住院检查。

12月17日 五十八周岁生日。——冬秀、祖望与儿媳曾淑昭从曼谷发来贺寿电报。

1950年 60岁

1月9日 写成《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载《自由中国》2卷3期。

1月24日 圣约翰大学新校长约聘胡适为该校教授，年薪一万二千元，未答允。

5月14日 普林斯顿大学聘请胡适为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应聘签约两年(1950—1952)。

5月30日 江冬秀离香港飞旧金山。在旧金山玩了十天，6月9日飞到纽约。——胡适夫妇开始了近八年的团聚生活。

9月22日 香港《大公报》发表胡思杜公开署名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掀开了中国大陆批判胡适的序幕。

10月 在美国《外交季刊》10月号上发表反共反苏长文《斯大林雄图下的中国》。

11月1日 翁文灏致信，信中赞美斯大林而贬损蒋介石，胡适感到“十分诧异”。

12月4日 在加州大学发表讲演《中国思想与文化的存在价值——在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哪些东西是不会为共产主义所摧毁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思想文化政策。

12月20日 傅斯年(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猝发脑溢血逝世,胡适深为悲哀。21日发唁电给俞大綵,又发电致毛子水,表示了对傅斯年后事的关注。傅氏逝世后,台湾方面曾考虑请胡适回来当台大校长。胡适致信婉辞,又力荐钱思亮继任。

是年 重要学术文章有《〈朱子语类〉的历史》、《赵一清与全祖望辨别〈水经注〉的通则》等。

1951年 61岁

2月24日 江冬秀收到从香港转来江泽涵发自北京的来信,信的内容为劝“姐姐”、“姐夫”回归。

3月9日 胡适老友朱经农因心脏病猝死。

4月2日 出席美国哲学会年会,讲演《十年来中美关系急趋恶化的原委》。(载《自由中国》5卷5期)

5月31日 写信给蒋介石,劝他多读中共出版的书,“知己知彼”,“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及“先辞去国民党总裁”的事。(《日记》)

7月28日 收到《台湾丛书》第三种出版品《台湾记录两种》。——这是胡适父亲胡传的遗稿,胡适看到它的出版,感到“总算完了我一部分的心愿”。后又试图把“稟启”三卷依年月日编到“胡传日记”里去,至九月已编成两卷。

8月11日 写信给《自由中国》社负责人雷震,提出辞去“发行人”的头衔。原因是《自由中国》在政治压力下不敢表现出自始至终的言论自由。此举一面对雷震的软弱表示不满;一面又对台湾军事机关对言论自由的干涉表示抗议。

9月7日 写信给臧启芳,批评潘夏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的“索隐”文章。

9月22日 写信给陈立夫，吊慰陈果夫的死，称陈果夫“是近十年来最受毁谤的一个人，我很盼望他留有日记或其他传记资料，将来能得学者整理编辑出来”。

12月17日 作“生日决议案”，想在有生之年还清全部文债：第一是《中国思想史》，第二是《白话文学史》，第三是审判《水经注》的案子，第四是还想为国民党政权用嘴、动笔、跑腿，做点力所能及的“道义支持”的事，但绝不担任公职。

1952年 62岁

2月24日 作《〈绝句一百首〉的后记》，为“一日选诗一首”作个小结。

6月1日 杜威病逝，他生于1859年10月20日。

8月30日 英牛津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客座教授（“史巴丁讲座”）一职空缺，拟选聘胡适，未允。

9月 作《初选〈尝试后集〉序》。

11月19日 抵台访问。名义是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之邀，来台讲学。11月16日离纽约，经西雅图、东京到台北。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五六百人的热烈欢迎。

11月26日 出席《自由中国》杂志社创办三周年纪念茶会，讲话中强调言论的自由与责任。

12月1日 在台湾大学讲演《治学方法》第一讲“引言”；5日第二讲“方法的自觉”；6日第三讲“方法与材料”。——同日又在台北市编辑人协会的欢迎会上讲演《新闻独立与言论自由》。

12月3日、8日 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

12月9日 在台湾“监察院”欢迎会上讲演《考试与监

察》。

12月10日 作《〈傅孟真先生遗著〉序》，载《国立台湾大学校刊》第194期，收入台大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20日又在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讲演《傅孟真先生的思想与事业》。

12月11日 作讲演《今日的世界》和《选科与择业》。

12月14日 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讲演《联合国的理想与实际》，连载于15、16日《中央日报》。

12月19日 在台湾大学文学院讲《〈水经注〉考》。

12月27日 作讲演《工程师的人生观》和《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有《朱子论死生与鬼神》、《考朱子答廖子晦最后一书的年份》、《朱子论禅家的方法》、《谢山双韭山房〈水经注〉序目》、《六祖〈坛经〉原作〈檀经〉考》等。

1953年 63岁

1月3日 在新竹讲演《三百年来世界文化的趋势与中国应采取的方向》。

1月5日 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座谈会上讲演《五十年来美国》。

1月11日 出席蔡元培诞辰86周年纪念会，讲演《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1月12日 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演《传记文学》。

1月17日 离台返美。这次访台共六十日。胡适在台讲学的内容，由《自由中国》杂志社编辑成《胡适言论集》甲、乙两编，交华国出版社出版。甲编为学术讲演，乙编为时政

讲演。

7月4日 为远东图书公司计划出版的《胡适文存》四集合印本写序。——《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被编为《胡适文存》的第四集。——远东版的《胡适文存》在篇目上作了较大的删削。

10月30日 胡适老友吴稚晖因肾结石在台北病死。11月24日胡适作《追念吴稚晖先生》，发挥吴氏“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处世精神，也称赞他在反共问题上最有“远见”。

1954年 64岁

2月11日 离纽约，18日飞抵台北。——此次访台专为出席“国民大会”的第二次会议。到台后即声明：“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做诤友，不愿居官。”

2月19日 在“国大”第二次会议上，担任临时主席，致开幕辞，强调“国大”的合法性和国民党的法统，又讲维持的艰难与意义。

2月26日 为台北版《四十自述》写序，并将《逼上梁山》一文编入此书。

3月7日 台湾的“中国历史学会”成立，被推为主席。

3月9日、21日、31日 蒋介石宴请约谈。

3月12日 在台湾大学讲演《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看法》。主旨为：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史，四大事件是关键：一，老子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政治抗议的出现；二，孔、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的流行；三，极权政治的崛起；四，无为政治的实践。

3月17日 在“联合国中国同志会”讲演《美国的民主制

度》，强调美国民主制度第一点是政权的转移依靠大多数人民的自由投票来决定，第二点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着重指出：“对人民自由的保障，宁可失之于周全。”

3月25日 在“国大”会议上，代表大会向蒋介石送“总统当选证书”。——22日，24日“总统”、“副总统”选出。

4月5日 离台返美。这次访台，“在台北共四十六天半”。（《日记》）

4月13日、14日 出席哥伦比亚大学建校200周年纪念会，讲演《古代亚洲的权威与自由的冲突》。

6月13日 出席耶鲁大学举办的“容闳毕业100周年纪念会”，讲演《容闳毕业一百年后》。

9月3日 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载《自由中国》12卷7期）

11月13日 致洪业信，说：“十年来我重审《水经注》一案，虽然有几分‘为人辩冤白谤’的动机，其实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严格的方法上的训练。”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还有《〈明清名贤百家书札真迹〉序》、《跋〈清代学人书札诗笺〉十二册》、《谈英语教育问题》、《〈水经注〉里的南朝年号》、《说史》、《〈大明实录〉的版本与卷数》。

1955年 65岁

1月3日 致信沈怡，谈国内“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信中说：“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

1月25日 致信张爱玲,称赞她的小说《秧歌》是“近年来最好的小说”。

3月19日、20日 在纽约召集中研院留居国外的院士谈话会。

3月29日 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放准雷震访美。——去年年底雷震因《自由中国》屡犯时忌,被开除了国民党党籍。

10月 美国 LOOK 杂志发表世界 100 位最重要人物名单,中国人中有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适等人。——“介绍辞”称赞胡适“是中国学者,伟大教师”,“他发明了一种简化了的中国语言”。

1956年 66岁

3月12日 长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脱稿(12万字),此文对丁文江一生行迹、思想、学问、道德作了相当全面的记述。全文11月由《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刊出。

6月2日 出席纽约白马文艺社集会,讲《新文学、新诗及新文字》。

9月1日 到麦迪逊城曼多他湖中国学生夏令营讲《大宇宙中谈博爱》。

10月21日 作《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作寿》,在《中央日报》与《自由中国》15卷9期同时登载。

12月 中研院史语所出版《庆祝胡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是年 曾撰写《论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成。

1957年 67岁

1月10日 结束在加州大学的讲学聘约。30日(丙申除夕)飞回纽约。

1月 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多处猛烈攻击胡适的思想言论。

2月4日 出席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三位科学家的欢迎会,并热情致辞。

2月17日 胃溃疡大出血,18日大吐血,昏迷终日,送医院,割去十分之六的胃。至3月11日才出院。

3月16日 曹聚仁来信劝胡适“最好能回北京看看,可以巡行全国”,他表示自己可以陪同。

3月24日 收到思杜发自唐山的平信(邮路走了五十天),这是七年来思杜给父母的第一封信。

8月30日 写信给雷震,劝他“切不可轻信流言,说胡适之可以出来领导一个反对党”。

9月21日 思杜因被定为“右派分子”(时在唐山铁道学院任副教授)思想不通而悬梁自杀。

11月4日 经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到任前,由史语所所长李济代理。10月22日原中研院代理院长朱家骅辞职。

1958年 68岁

1月10日 作《〈中国古代哲学史〉台北版自记》。

2月9日 作《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

4月2日 离纽约。8日飞抵台北。祖望夫妇、孙子胡复等五百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江冬秀仍住纽约。

4月10日 出席中研院院长就职典礼,发表演说,称中研院是许多位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蒋介石出席了就职典礼并讲了话。典礼完毕,便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在次日(11日)的院士会议上,选出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蒋廷黻等14名新院士。

5月4日 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讲演《中国的文艺复兴与运动》。

5月27日 在《自由中国》杂志社讲演《从争取言论自由谈到反对党》,又为《自由中国》杂志争取自由民主的舆论运动和雷震的组党活动加了一把火。

6月5日 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大学的生活》。

6月21日 飞回纽约。

10月11日、12日 召集在美中研院院士谈话会,研究讨论工作计划。

11月5日 飞抵台北,正式住进南港新建的院长住宅。

是年 重要讲演与文章还有《历史科学的方法》、《谈谈大学》、《〈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自序》、《〈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序》、《〈施植之先生早年回忆录〉序》、《新校定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关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史料》、《〈师门五年记〉后记》、《九年来的国际形势》等。

1959年 69岁

是年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月7日 在国际学会对侨生讲演《略谈人生观》。

2月1日 中研院与“教育部”举行联合会议,通过“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组织章程”,即日成立该委员会,推举胡

适为主席，梅贻琦为副主席。

2月24日 在中研院史语所讲演《假历史与真历史——用四百年〈水经注〉的研究史作说明的例子》。

3月12日 作《容忍与自由》（载《自由中国》20卷6期）。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7月1日 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士会议，选举出新院士袁家骝、杨联陞等9人。

7月9日 接受夏威夷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博士学位——这是他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最后一个。

11月9日 作《记美国医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纳先生》。（载《自由中国》21卷10期）

11月15日 与张群谈“宪法”与“总统”连任问题。请张转告蒋介石，盼望他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能违背“宪法”，更不能修改“宪法”。“为千秋万世盛名打算”，在“国大”开会前，公开表示不谋求第三任“总统”。而国民党人如别有主张，也应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劝进电报’方式。”胡适认为蒋介石本人能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则“声望更高，领袖地位更高”。（《日记》）

12月27日 在台湾图书馆学会年会上讲《找书的快乐》。

是年 主要文章与讲演还有《纪念林肯的新意义》、《〈朱子语类〉的历史》、《王梵志的道情诗》、《注〈汉书〉的薛瓌》、《〈陈伯庄卅年存稿〉序》、《记郭象的自然主义》、《论初盛唐还

没有雕版书》、《跋金门新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圻志〉》、《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吕氏春秋〉可是二十六篇被割裂成一百六十篇的》、《〈虚云和尚年谱〉的讨论》、《三勘〈虚云和尚年谱〉》、《美国如何成为世界学府》、《中国教育的史料》、《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等。

1960年 70岁

是年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2月5日 在《自由中国》22卷3期上发表《国事十问》，声明宗旨是“消除执政当局和舆论的隔阂，为了促进国民党当局能面对现实，采纳舆论，奋起改革，以扭转目前的困局”。

2月9日 在史语所讲演《禅宗史的真历史与假历史》。

2月11日 在国际学舍爱迪生纪念会上讲演《终身做科学实验的爱迪生》。同日，又作《〈全唐文〉里的禅宗假史料》。

4月16日 作《读程天放先生的〈美国论〉后记》。（载4月26日《中央日报》的“学人”副刊162期）

5月4日 在台湾北京大学校友会上讲演《五四运动的意义》。翌日，又向台湾广播电台记者发表《五四运动是青年的爱国运动》的谈话。

6月5日 在台湾师范大学14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教师的模范》。强调教师“至少要有两方面的理想：人格方面，是要爱自由和爱独立，比生命还重要。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另一方面是知识，就是要爱真理，也要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才能卖田卖地而去买书，求真理，求知识，在知识上要够资格为人师表。”

6月18日 在台南成功大学毕业典礼上讲演《一个防身

药方的三味药》，这“三味药”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有了这“三味药”，一个大学毕业生才能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才能离开学校而仍旧在追求知识与真理上大有作为。

是日 参加欢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宴会，并与艾氏在圆山饭店晤谈。

7月9日 飞美国西雅图。10日参加在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讲演《中国的传统与将来》。

9月4日 雷震因“涉嫌叛乱”的罪名被台湾当局逮捕。胡适当即拍电报给“副总统”陈诚为雷震案辩护，指责台湾当局此举“恐将腾笑世界”。要求将雷案由军法交司法审判，一切侦查及审判皆予公开。——雷案发生后，胡适在美国公开表态，《自由中国》杂志十年来一直是台湾言论自由的象征，现在抓雷震等于自砸招牌。胡适决定10月18日回台湾，直接为雷案说情。

10月8日 台湾“警总”军事法庭对雷案作出匆匆判决：雷震被判十年徒刑。胡适的呼吁显然没有发生作用。而且当局赶在胡适回台之前断然解决雷震和《自由中国》问题。胡适感到十分失望，身心遭受打击巨大，健康迅速恶化。

10月18日 离美返台。过东京时停留休息，毛子水特飞东京详说“雷案”始末。22日抵达台北。

11月18日 见蒋介石。谈起“雷案”，蒋介石强调“雷震背后有匪谍，政府不能不办他。”胡适责问：“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

11月19日、20日 分别给高阳、苏雪林写信讨论《红楼

梦》问题。——此后胡适关于“《红》学”问题又连续写了好几封信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11月23日 得知雷案复判未获减刑，在日记中表示悲叹：“大失望，大失望，还有什么话可说呢？”24日日记又写下：“我忍不住要叹气了。”再后来到1961年7月26日，胡适只能亲自抄写了南宋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送狱中，祝贺雷震六十五岁生日，表示了心底里对雷震争言论自由的敬仰与劝勉。

12月17日 蒋介石专门为胡适的70虚岁寿诞隆重送来亲笔写的寿匾，陈诚也送来“宝砚陈墨”。21日又邀请胡适至“士林官邸”为他操办祝寿会，端上专门准备的寿桃、寿面、寿酒，蒋氏夫妇还亲自祝酒贺寿。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还有《〈五灯会元〉的三个版本系统》、《王荆公的有为主义》、《〈詹天佑先生年谱〉序》、《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南宋以后的五山十刹与日本的五山十刹》、《京师大学堂开办的日期》、《陆醒的年岁》等。

1961年 71岁

是年 仍任中研院院长。

1月4日 出席中研院团拜会，讲话中引清初顾炎武诗句“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以自勉勉人。

1月10日 在美军军官眷属俱乐部讲演《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

1月15日 写长信给日本学者柳田圣山，谈禅宗史问题。

1月29日 主持“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第五次会议，致开幕辞《长期科学发展的重任与远路》。

2月25日 心脏病复发,入住台大医院。4月22日出院。

5月18日 作《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这是胡适晚年最重要的一篇“《红》学”文章,约一万五千字,文章特别指出这个“甲戌本”在40年来的“《红》学”研究史上曾发生过的划时代的功绩。此文载1961年6月1日台北《作品》杂志2卷6期。

7月6日 李敖为庆贺胡适七十大寿,编了《胡适先生著作编年目录》卡片盒寄胡适。

8月22日 收到陈诚邀请出席并指导“阳明山谈话会”的信,表示愿意赴会。

8月25日 出席“阳明山谈话会”。因身体虚弱,听完陈诚报告后即离去。

8月28日 致信李孤帆,表示对李氏选印《独秀文存》的事,“颇不热心”。原因有三:“第一,我自己就没有心力来写‘介绍陈独秀的思想’的文字,因为那就需要我重读他的全部文字,而现在绝对无法搜集他的全部文字。第二,因为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很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第三,我觉得你也不是理想的‘马二先生’(《儒林外史》里的选家),而这个时候也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0册)

8月28日、29日 作《〈朱子语略〉二十卷》,收入《胡适手稿》第九集。

8月29日 写完《伦敦大英博物馆藏的十一本〈阎罗王授经记〉》(下),收入《胡适手稿》第八集。

是月 在《自由中国评论》第11卷8期上发表《泰戈尔在中国》(英文)。

10月8日 参观故宫博物院与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运美展览的预展。

10月10日 致信苏雪林,指出“‘正义的火气’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强调“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毁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10月18日 江冬秀抵台团聚。30日,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眷属在蔡元培馆举行“欢迎茶会”。

11月6日 应美国国际开发署之邀,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这是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的发言。大旨为:“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很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

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这篇大约 20 分钟的讲演引起了港台两地激烈的论争，胡适又受到了东方文明捍卫者的强烈批评与攻击，又一次成为围剿的靶子。

11 月 26 日 因心脏病又住进台大医院。

12 月 16 日 蒋经国代表蒋介石来医院看望胡适。17 日在医院病房内过了一个热闹的生日。长子祖望一家从美国发来贺寿电报。江冬秀则在福州路 26 号临时宅居（台大招待所）举行祝寿宴会，毛子水、杨亮功等四十余人参加。

12 月 30 日 在医院内做结婚四十四周年纪念。与王世杰、朱家骅谈自己退休的事。

是年 主要学术文章还有《〈金石录〉里的禅宗传法史料》、《〈豆棚闲话〉笔记》、《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影印乾隆壬子年木活字版百二十回〈红楼梦〉序》、《跋〈红楼梦书录〉》、《跋毛子水藏的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红楼梦〉的小字本》、《康熙朝的杭州织造》、《再记五山十刹》、《影印〈续藏经〉缘起》、《〈淮南王书〉影印本序》、《〈七修类稿〉里的六祖》、《十殿阎王》等。

1962 年 72 岁

1 月 10 日 出院，规定“七项注意”。暂住福州路 26 号疗养。

1 月 18 日 致信王世杰、孔德成，商议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珍贵史料、孤本、善本书，应多留一二份显微胶卷，以便保存与利用。

2 月 12 日 得吴健雄信，告诉她与袁家骝将来台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但特别强调，他们此行主要目的是看望胡

老师。

2月14日 出席第四次教育会议开幕式。

2月17日 写信给陈诚,报告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已定于2月24日在南港举行。邀请他尽可能前来与大家见面。

2月19日 致信夏涛声,说:“昨夜读了《民主潮》十二卷三、四期的韵笙的《论思想或观念的僵窒和简化》,我很佩服作者的细心和苦心。这是近年来很少见的一篇用功构思,用气力作文造句,全篇没有一句草率句子的大文字!请你告诉我这位韵笙先生是谁,我很想见见他,很想向他表示我的诚心佩服。”

2月20日 到台大医院检查身体,血压、心脏均正常。顺便探望了住院的老朋友梅贻琦。同日,又复信金作明,讨论《红楼梦》问题。——这是胡适生前最后的一篇文章,载胡适逝世后的4月1日《作品》3卷4期,题为《〈红楼梦〉问题的最后一信》。

2月24日 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任之恭、梅贻琦等七名新院士。傍晚五时,在蔡元培馆主持欢迎新院士的酒会,并致辞。六时半在酒会散席时,心脏病猝发而逝世。享年七十二岁。

胡 明 编撰

